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系

碩士論文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誰取代了侍從主義？

政治分歧與選制變遷下雲林縣政治連結的持續與變遷

What Has Replaced Clientelism? The Continuity and  
Change of Political Linkage in Yunlin County under  
Political Cleavage and Electoral Institution Change

盧信宏

Lu Hsin-Hung

指導教授：張佑宗 博士

Advisor: Chang Yu-Tzung, Ph.D.

中華民國 100 年 6 月

June, 2011

## 謝辭

當論文寫作來到最後，我不斷地深刻體會到在這第一份以嚴謹的格式寫作，並且盡可能地以足夠的證據來捍衛論證的研究論文中，其實整體的關懷來自於我的外省人身份與人生經驗。而直到三年前因為陳雲林來台事件而興起的一場靜坐活動與後續的思辨中，我才終於開始真正地思考「身份」與其背後複雜的問題對於我、我身邊的許多人，以及我們所經驗的許多政治現象所可能造成的影響。

在生命經驗中，就如同家族裡的許多人一樣，我感受到外省人身份之下的不安。而不知道是家庭教育、生命經驗甚或是這個身份的關係，我在感受不安的同時，也與身旁的社會保持著某種疏離的情緒。然而，研究所的生命歷程給了我截然不同的經驗與新的視野。2008年初，透過參與 TEDS 的面訪調查計畫親身拜訪雲林鄉村中的不同家庭，我才真正感受到我與周邊社會的聯繫。透過圍繞在問卷周邊的對談，我不僅看到不同的生命經驗，也學會體會不同身份與背景的人的感受，這終於解放了身份帶來的疏離感。而到了 2008 年年底，陳雲林來台所引發的一連串事件又將這樣的感同身受，轉化成行動的熱情。在靜坐活動中，我和參與的同學開始批判現行的法律制度、檢視公共政策並反省過去的威權體制，也開始帶著外省人身份中留下的些許執迷，反省活動過程中令人沮喪的藍綠問題。我開始感受到國族與藍綠分歧對集體行動造成的困境，具有共同目標的人可能在這個議題之下分歧甚至對立。因此我開始思考台灣社會如何可能真正地處理這個問題，並且讓同樣深刻影響台灣社會的其他問題能夠在民主政治中被妥善地面對與解決。而當我在 2010 年開始進行關於雲林地方政治的研究計畫之後，我發現類似的停滯也同樣出現在地方政治之中。當中央與地方政權不斷輪替，但卻沒有出現新的治理模式，而是持續類似的政治連結關係。我因此開始思索全國性的政治分歧，是否也同樣影響了地方政治的運作，這是這本論文試圖建構的論述。

我必須感謝過程中引領過我的每一個人。張佑宗老師給我進入這些研究計畫的機會，是這些故事得以開啟的大門，陶儀芬老師與口委游清鑫老師、王金壽老師提供了這本論文最後如此呈現的重要意見。身在美國的奕婷、宗漢、佳怡、凱萍，東亞研究室的恭安、珮如、維琪、頌恩、Mark、雅惠、宛蓉、柯達、俊穎、淑媚、譽文、千珩、嘉麟、為之、敬濤、佳賢、其睿和彪哥都不斷給我幫助與鼓勵，振嘉學長更是重要的推手。維婷和含及是靜坐活動和後續討論會中的核心人物，小波、小菇、大神、手一些、佳欣與大哥則是過程中最好的益友。佳旻在這些過程中不斷和我對話，是她打破了我的執迷而引領我成長。最後，我要感謝我的家人願意給我時間與資源，他們的教養、鼓勵和寬容滋養了我的一生。特別是我的爺爺張建楚，他在生命的最後十年一直想把他的生命故事寫成書。假如這本論文最後還有那麼一點點貢獻，我願把這獻給他的在天之靈。

## 中文摘要

派系政治一直是台灣地方政治的重要特色，而侍從主義下的特殊利益交換關係則是構成其中政治人物之間、政治人物與選民之間政治連結的基礎。然而，以特殊利益交換為基礎的政治連結卻對民主政治下的課責關係有不良的影響。選民可能只在乎政治人物給予的特殊利益，而不在乎政治人物推動的公共政策內容。而雲林縣在 2005 年之後，不僅民進黨的影響力大幅擴張，原本的國民黨派系也不斷地內鬥、分裂。這是否代表雲林縣的地方政治連結正在改變，侍從主義是否會被政黨在全國經營的形象與標籤取代？而雲林縣當前的政治連結型態為何？我們又該如何解釋特定連結模式的出現與運作呢？

過去的研究大多處理威權時期的侍從主義現象，並且將之理解為威權政府的動員與控制，或是來自地方社會既有的社會形態影響。然而，這些研究沒有繼續說明民主化之後的變化。而現代化解釋與制度變項，也無法解釋我在雲林縣取得的訪談資料。雲林縣的資料說明，國民黨政治人物雖然受到政黨、新的選舉制度以及社會變遷的影響，但仍然試圖透過建構派系組織、樁腳網絡，以特殊利益交換來取得選票。而民進黨雖然主要採取以政黨標籤的方式連結選民，但同時也分配特殊利益給支持者，並且直接利用特殊利益吸引沒有政黨意識的選民。而兩黨共同的特色，是都缺乏足以取代特殊利益分配的另一種資源分配方式，因此都繼續分配特殊利益，並維繫了一定程度的侍從主義連結策略。本文認為，這個政治連結現象來自台灣特殊的政治分歧。由於台灣以國族與族群情感為基礎的政治分歧缺乏資源分配的內涵，同時也阻礙其他社會分歧形成政治分歧的目標。因此，在雲林兩黨的政治人物都缺乏足以取代特殊利益分配的策略，只能繼續延續侍從主義的連結型態。

**關鍵字：**派系、侍從主義、地方政治、政黨政治、政治分歧

## Abstract

Factional politics is one of the features in Taiwan local politics. The exchange of particular interest under clientelism constitutes the political linkage between politician-politician and politician-voter in the factional politics. However, political linkage based on the exchange of particular interest has negative effects on democratic accountability. Voters may be more interested in the particular interest offered by the politician rather than the contents of his platform. Since 2005, the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DPP) has enlarged its electoral base in Yunlin County, while factions within the Kuomintang (KMT) fought against each other and dissolved. Does this represent a changing political linkage in Yunlin County? Will clientelism be replaced by party image and label managed by political parties on national scale? What are the linkages between voters and politicians in Yunlin County, and how could we explain the emergence and operation of such linkages?

Previous researches have mostly dealt with the phenomenon of clientelism during an authoritarian period, and understood it as the mobilization and control by the authoritarian regime or as the product of social context in local society. But these researches have not illustrated the change after democratization. The modernization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can not explain the interview data that I collected in Yunlin County. The data shows that although KMT politicians was affected by the party, new electoral institution, and social change, they still attempted to construct factional organization, broker network, and gain votes by offering particular interests. DPP politicians, mainly adopted their party label to gain voter support. At the same time, they also distributed particular interests to their supporters, and even tried to gain the support of non-partisan voters through the distribution of particular interests. The similar feature between these two parties is that they both lack an alternative model for resource distribution, which can replace the distribution of particular interests. Therefore, both parties continue to offer particular interests and maintain a certain degree of clientelistic linkage strategy. In this research, I propose that such phenomenon of political linkages is caused by the special political cleavage in Taiwan. Since the political cleavage in Taiwan is constituted with nationalism and ethnicism, which lack the connotation of resources distribution, and also impede other social cleavage to become the stake of political struggle. Politicians of both parties in Yunlin do not have strategies that can replace the distribution of particular interests, thus they can only continue to rely on clientelistic linkage.

# 目錄

口試委員審定書	I
謝辭	
V 中文摘要	
V 英文摘要	
V	
<b>第一章 緒論</b>	<b>1</b>
壹、 前言：研究背景	1
貳、 問題意識：雲林縣糾結的侍從主義與政黨連結	3
一、 兩種政治連結與雲林縣的政治現況	3
二、 雲林縣個案：政黨競爭與侍從主義共舞	4
三、 尋找可能的解釋：我的研究問題	6
參、 基本概念與主要文獻評述	7
肆、 核心論證與研究發現	11
伍、 研究限制	14
陸、 章節介紹	15
<b>第二章 文獻、理論與研究設計</b>	<b>17</b>
壹、 文獻檢閱	17
一、 派系組織與侍從主義連結	18
二、 誰取代了侍從主義？族群認同與選舉制度的影響	26
三、 如何取代？台灣族群政治分歧的侷限與侍從主義的持續	32

貳、 本文的理論主張	36
參、 研究設計	42
<b>第三章 雲林縣的地方政治變遷</b>	<b>47</b>
壹、 雲林縣與侍從主義政治的成形	48
貳、 民主化後的地方政治演變（2001 年以前）	49
一、 國民黨的林派、蘇派與張派	49
二、 國民黨的許派與廖派	53
三、 民進黨的地方勢力	56
參、 雲林縣地方政治現況	58
一、 獨大的張派與民進黨的擴張（2000-2005）	59
二、 2005 年之後：民進黨縣長的分配困境與張派的分裂	62
三、 2009 年之後：張派的分裂與民進黨基層的擴大	65
肆、 小結：侍從主義政治的變遷或持續？	68
<b>第四章 資料分析：並存與共生的政治連結</b>	<b>69</b>
壹、 選民面向：上升的政黨認同與不穩定的投票行為	70
一、 穩定上升中的政黨偏好	71
二、 不穩定的投票行為	75
貳、 新瓶與舊酒：政黨競爭與不變的國民黨派系	77
一、 新瓶子：制度改革與政黨競爭對政治人物的影響	78
二、 侍從主義連結：國民黨派系、樁腳、網絡與特殊利益交換	84
三、 在同樣的邏輯之下：變遷的社會與新網絡的建構	87
四、 小結	88

參、	認同連結中共生的特殊利益分配與共存的侍從連結	90
一、	民進黨「政黨認同連結」的內涵	90
二、	政黨認同連結下「共生」的利益分配：樁腳的不同面貌	91
三、	與認同連結「並存」的侍從主義連結	96
肆、	本章小結	100
<b>第五章</b>	<b>結論</b>	<b>103</b>
壹、	政黨競爭、制度變遷與雲林縣的政治連結	104
貳、	台灣的族群認同政治：比較的觀點與可能的發展	106
<b>參考文獻</b>		<b>109</b>
<b>附錄一</b>	<b>TEDS 縣長選舉調查政黨偏好題組</b>	<b>117</b>
<b>附錄二</b>	<b>TEDS 縣長面訪調查投票選擇題組</b>	<b>121</b>

## 圖目錄

圖 1-1	雲林縣 1997 年後歷屆選舉藍綠陣營得票率	5
圖 1-2	研究架構圖	11
圖 2-1	綱領式政黨體系形成架構圖	28
圖 2-2	「等級」與「分立」族群體系分類示意圖	34
圖 2-3	民主政體中的政治連結模式	38
圖 3-1	雲林縣林派主要成員與演變圖	52
圖 3-2	雲林縣許派關係圖	54
圖 3-3	雲林縣廖派關係圖	55
圖 3-4	2009 年立委補選中的「青埔宮」文宣	66



## 表目錄

表 2-1	政治連結類型特徵分類表	41
表 2-2	雲林縣受訪政治菁英資料與代號對照表	45
表 3-1	雲林縣各屆縣長列表	50
表 3-2	1990-2000 年雲林縣各主要選舉民進黨得票率	59
表 4-1	2005、2009 年雲林政黨偏好對照表	72
表 4-2	2009 年立委補選與縣長選舉電訪政黨偏好對照表	72
表 4-3	雲林縣選民政黨偏好穩定程度的五種類型	73
表 4-4	政黨偏好與族群認同的交叉分析	74
表 4-5	各類政黨偏好選民投票給綠營候選人百分比 (2009M)	75
表 4-6	各類政黨偏好選民投票給綠營候選人百分比 (2009L BE&M-T)	76
表 4-7	雲林縣 2000-2009 年職業人口資料	83

# 第一章 緒論

## 壹、 前言：研究背景

對於第三波民主化下的新興民主國家來說，民主體制是否能夠鞏固、民主治理品質是否能夠提昇是相當重要的課題。許多針對拉丁美洲的研究指出，政黨以及政黨體系的制度化對於新興民主國家的政治穩定、民主鞏固，以及治理成果都有顯著的影響（Mainwaring & Scully, 1995、2008）。在制度化的過程中，政黨的整體形象標籤（label）和政黨的政策綱領（platform）漸漸取代個別政治人物的個人魅力或是地方性的利益，成為政治人物和選民之間課責關係的基礎。而由於政黨的政策綱領相當明確且具有穩定性，因此產生的課責機制可以有效地促進民主治理的品質（Mainwaring & Scully, 2008: 119-121；Kitschelt & Wilkinson, 2007）。

然而，在台灣的政治現況中，政治人物以零碎的特殊利益和選民進行交換以維繫政治支持，並透過層層侍從主義關係建立派系組織來壟斷地方政治的現象，一直是難以擺脫的重要問題。即便是在使得兩大政黨對決更為明顯的單一選區相對多數決制度之下，縣長與立法委員候選人也可能更傾向選擇以個人情誼、個人化的特殊利益，來組織樁腳以及社會網絡以進行侍從主義式（clientelistic）的交換。而在這種侍從主義式的「政治人物與選民連結（politician-citizen linkage）」中，政治菁英和公民之間的課責關係是建立在個人的特殊需求與私人關係之上。在這個情況下，選民對政治人物的課責將視這些不特定的私人交易是否達成而定。因此，政治課責的內容變得極度不明確，民主政治的結果變得難以預測，並且可能因為必須大量分配特殊利益，而產生貪汙等種種不可欲的政治後果（Kitschelt & Wilkinson, 2007）。

台灣這種以侍從主義交換與派系組織壟斷的地方政治型態，一直被學者們認為是受到威權政體的刻意操作與地方社會特質等兩方面因素的影響。而在民主化

之後，隨著既有的政治型態開始受到挑戰，學者們開始討論地方派系與侍從主義的衰退與轉型。許多研究認為，在經濟水準提高、都市化與教育的發展下，派系賴以操作侍從交換關係的社會網絡會逐漸消逝。選民將捨棄侍從主義的特殊利益交換，而傾向追求具有普遍性利益的政策黨綱（黃德福，1994；Kitschelt & Wilkinson, 2007）。此外，制度環境的變化使得政治機會空間大幅擴大，反對黨的興起使得政治競爭更為激烈，原本在威權體系中以寡佔的經濟利益和政治機會而建立的派系組織也因此更難以維繫（王金壽，2004、2007）。2008年後立委選舉採用的 SMD（single member district）選制，則更有利形成兩大黨之間的競爭，兩黨之間的政治分歧與政策主張對於政治人物與選民的政治抉擇也將更為重要（Lin, 2006；盛杏媛，2008a）。個人化的侍從主義會逐漸被政黨在全國建立起的政治分歧所取代（蔡佳泓、王鼎銘、林超琦，2008）。政治人物和選民之間的連結關係，也將從原本的侍從主義連結，走向以政黨的黨綱和政策為核心來吸引選民的政治連結模式。

然而，侍從主義下特殊利益—選票交換的政治連結會在社會現代化與全國性的政黨政治下自動消失嗎？在不同政黨政治脈絡下，結果是否會有所不同？為什麼？多數研究雖然認為在政治與社會轉型下，政黨之間以普遍性的政策綱領競爭的新政治模式會取代侍從主義政治，但不僅忽略了對連結轉型過程的分析，更未探索其中另一個重要變因：「政黨競爭中不同政治分歧特質」的影響。因此，在本文中，我從問題的另一個角度切入，並且希望能在雲林縣的特殊個案中獲得解答。這個問題的核心在於探索侍從主義的政治連結如何可能被取代？而不同的政治分歧下所出現的不同的替代連結又有什麼不同的影響？

在現代化理論和制度論提供的解釋之外，本文重新思考政黨競爭過程中政治分歧產生的重大影響。並試圖以雲林縣的政治人物和選民作為個案，探索台灣特有的政治分歧與當前的制度變遷對於政治人物和選民之間連結關係的不同影響。

## 貳、 問題意識：雲林縣糾結的侍從主義與政黨連結

### 一、 兩種政治連結與雲林縣的政治現況

依照 Kitschelt 與 Wilkinson (2007) 所提出的「政治人物—公民連結 (politician-citizen linkage)」概念，在政治人物和選民之間建立的不同連結中，往往伴隨著不同的選票交換關係和課責機制。在政黨綱領式連結 (programmatic linkage) 下，政治人物以具有普遍性的政策或政策綱領來交換選民的支持，政治人物並不清楚選民的位置與交易的可信度，選民也只能就政黨的政策和過去的政策可信度 (credibility) 來進行選擇。因此，在這個連結關係下，政黨必須在組織內部進行投資，塑造出一致的政策與具有普遍性利益的政策綱領 (program)，並強調代表政黨整體形象的政黨標籤 (party label) 來訴諸於選民。選民則針對政黨與政治人物提出的政策與實踐結果來決定下次的投票選擇，因此相當明確而穩定。對民主治理來說，也就更具有可欲的課責性 (accountability)。

然而，直到 2008 年新選制下的立委選舉中，雲林縣的地方政治仍然深受地方派系的影響。派系所依賴的，是政治人物以個別或小型團體選民所期待的特殊利益與其交換選票，而和選民建立起的「侍從主義連結 (clientelistic linkage)」。

Kitschelt 與 Wilkinson (ibid.) 認為，在侍從主義連結之下，政治人物和選民 (或是團體) 的聯繫建立在個別的特殊利益交換上，選民是以這些不特定利益的輸送與否來做為政治課責的目標。為了確保交易成功，政治人物會企圖透過社會網絡和監督的組織，來掌握交易的可信度。而透過不斷地上下交換關係所連結起來的金字塔形組織，即稱之為派系 (faction) (Landé, 1977)。

在雲林縣，國民黨中的張派即便失去縣長職位，但仍然保持了派系的動員網絡。不過，雲林縣作為個案研究的特殊之處，並不只是派系組織和侍從主義的影響力仍持續存在。而是長期政黨競爭的結果，已經對於雲林縣的選民和各項選舉

結果產生了巨大的改變。在 2004 年之後，民進黨在單一選區制度背景下的總統與縣長選舉中，得票開始大幅超越國民黨。本文第四章的調查資料也顯示，不同的政黨和支持者在主要的政治分歧上已各自據有特定的位置。這顯示政黨間在全國層次的政治歧異與競爭，已經在相當程度上改變了雲林縣選民投票抉擇的動機。而單一選區制度更凸顯了兩大黨之間的競爭，有利於全國性政治分歧的影響（Bosco, 1994）。因此，當前的雲林縣可能同時存在著政黨綱領式連結和侍從主義連結，複雜的連結樣態與不同連結間的互動，讓雲林縣成為相當有意義的個案。

## 二、雲林縣個案：政黨競爭與侍從主義共舞

在雲林縣，整體的政黨版圖在 2004 年後出現很大的變化。下圖 1-1 是 1997 年後雲林縣的選舉結果彙整為藍、綠陣營後的長條圖表格。我們可以看到，儘管在 2000 年以前，幾乎所有選舉都是由國民黨和地方派系所掌握，但是在 2004 年的總統選舉之後，雲林縣卻成為民進黨在總統大選中穩定的支持版圖。2005 年的縣長選舉，代表民進黨的蘇治芬甚至取得了過去一直由國民黨掌握的縣長職位，並且還在 2009 年取得連任。而 2008 年在 SMD 選制下的立委選舉，加上台聯黨籍尹玲瑛的得票後，整體得票也接近總統選舉。不同層次間得票結果<sup>1</sup>的接近程度，是政治連結轉向政黨綱領為核心的重要指標（Dalton, 2007; Mainwaring & Scully, 1995: 9）。蕭怡靖與黃紀（2010）的研究也顯示，全國性的政策以及政黨認同已經是 2009 年雲林縣長選舉中的重要因素。這似乎意味著雲林縣政治人物與選民之間，已經建立起以政黨標籤為主的政治連結關係。

---

<sup>1</sup> 對於 Mainwaring 與 Scully 來說，總統選舉與立法選舉的差異說明政黨穿透社會的程度（how deeply parties penetrate society）。假如政黨是影響選民投票的關鍵，那麼兩者間的差異會比較小，因為選民是投給同一個政黨標籤而非不同的個別候選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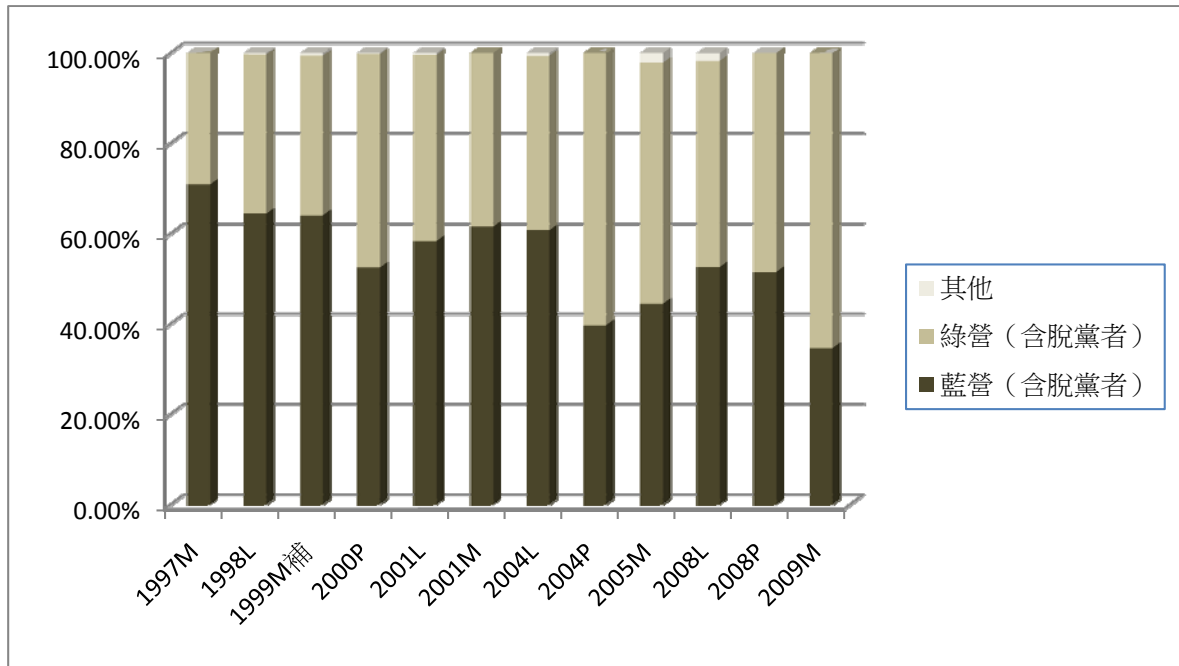


圖 1-1 雲林縣 1997 年後歷屆選舉藍綠陣營<sup>2</sup>得票率

資料來源：中選會網站

然而，派系與侍從主義在這個版圖變遷的過程中仍然具有影響力。圖 1-1 中可以發現，即便在 2004 年總統大選和 2005 年縣長選舉中，民進黨候選人取得了 60.32% 與 53.37% 的選票。但是在 2008 年首次運用新的 SMD 選制後的立委選舉中，國民黨又在兩位張派候選人參選下，取得 52.59% 的得票，這甚至比總統大選時馬英九得到的 48.47% 更多。在王良新（2005：163-167）獲得的資料中甚至認為，2005 年的縣長選舉中，民進黨候選人蘇治芬的勝選是因為國民黨張派為了牽制敵對派系，而不惜暗中幫民進黨候選人動員所致<sup>3</sup>。而 2009 年立委補選和縣長選舉中，國民黨候選人的失利，也可以被歸因於張派的內部分裂（陳嘉宏、曾蕙蘋、許素惠，2009；段鴻裕，2009）。

<sup>2</sup> 為了簡化資料之間的對比，因此上述資料中對於「藍營（含脫黨者）」的判斷係根據蘇俊豪 2004 年論文中的資料做判定，而被歸入「綠營（含脫黨者）」的參選人除了具有黨籍身分參選者外，還包含 1995 年的蘇洪月嬌、高孟定在 1998 年以「民主聯盟」身分參選，以及 2000 年後以台灣團結聯盟參選者的得票。而在 2001 年的選舉中，蘇俊豪的論文指出高孟定的得票係來自張榮味的支持。因此即便高孟定選後即加入民進黨，圖表中還是將他高達 10% 的得票納入藍營加以計算。

<sup>3</sup> 這在我的訪談過程中也得到再次確認。兩位水利會幹部在訪談中都曾經提到，他們在該次選舉中因為派系指示，而要求自己的樁腳和好友投票給蘇治芬。

儘管侍從主義可能受到社會現代化程度的影響，但雲林縣的民進黨政治人物卻依賴政黨的族群認同號召來連結選民。但即便如此，民進黨的主要人物間也出現「政治山頭」，透過樁腳網絡來鞏固選票（蘇俊豪，2004）。甚至運用縣長資源積極爭取國民黨派系政治人物，培養基層實力（王良新，2005；段鴻裕、蔡維斌，2010；陳信利，2010a）。在這些資料中又可看到，即便在日漸高漲的政黨競爭中，雲林縣各政黨的地方政治人物仍然試圖培養縝密的樁腳組織，甚至運用特殊利益和選民連結以交換選票。這些矛盾的資訊讓我開始思索，雲林縣的政治人物和選民之間的連結現況究竟為何？我又該如何解讀這樣的政治現象？

### 三、尋找可能的解釋：我的研究問題

過去探討地方派系和侍從主義的研究大多運用制度因素（選舉制度、政治機會結構與政治經濟結構變遷等等），以及現代化因素（年齡、教育程度、都市化程度等等）企圖解釋派系組織與侍從主義的政治模式可能的變遷，以及對選舉結果的影響，並往往更為關注國民黨內部存在的侍從主義現象。而雲林縣雖然沒有高度的現代化發展，但是全國的政黨競爭卻讓雲林縣的政治版圖與選民在政治分歧上的立場出現顯著的變化，而制度的變遷更可能強化這個趨勢。因此，我嘗試運用新的視角與不同的變因來解釋雲林縣的政治現象。本文將研究關注的焦點放置於「探索與解釋雲林縣政治連結的現況」上，試圖瞭解雲林縣的縣長與立委政治人物在凸顯兩黨競爭的制度環境，與重要性不斷提昇的兩黨競爭中，他們吸引選民的連結策略為何並解釋其成因。而為了彌補過去對於民進黨政治人物和選民連結策略的相關研究較為不足的問題，我也特別針對民進黨的政治人物與樁腳進行研究。

在政治人物和選民的連結關係中，政黨間在主要政治分歧上的競爭是政黨以政黨標籤連結選民的關鍵。而政治分歧不僅可以形成政黨和政治人物被選民所認

識的「標籤」，也可能形塑出具備普遍性利益的政策，而透過普遍性利益交換來換取選票支持，成為「政黨綱領式」的連結關係。但是，不同特質的政治分歧是否能產出同樣的政治後果呢？在拉丁美洲，正走向制度化的政黨體系是建立在長期的政治經濟結構所造成的階級分歧，以及經濟政策對立的基礎上（Hagopian, 2009；Kitschelt, 2010）。而在台灣，國族認同與兩岸政策上的歧異是當前兩大黨（或兩大陣營）競爭的主軸，而且往往被認為缺乏具體的政策綱領而成為全括式（catch all）的政黨（Hu & Chu, 1992；Yang, 2007）。那麼，這個缺乏「政策綱領」的政治分歧，會對台灣政治人物和選民之間連結的建立，以及既有的派系與侍從主義連結產生什麼樣的影響呢？

在這樣的發想下，我將主要的研究變項放在「政治分歧」的影響上。我的研究問題是：雲林縣在既有的政治分歧與新的制度框架影響下，究竟如何影響了雲林縣的侍從主義連結？而在當前又形成了什麼樣的政治連結關係？在這樣的政治連結基礎之上，政治人物和選民，以及政治人物彼此之間會如何進行互動？在以下的段落中，我會先透過簡要的文獻檢閱說明我的主要論證。在之後幾章，則會詳細地說明整個研究的理論脈絡，以及提供佐證的資料。

## 參、 基本概念與主要文獻評述

在擷取了 Kitschelt 與 Wilkinson（2007）以及 Wu（1987）的看法下，本文將侍從主義視為一種「政治人物以特殊利益交換選民支持」的政治模式。在需求面，選民需求的是僅屬於個人或小團體的「特殊利益」；在供給面，政治人物則以個人化的特殊利益提供他鎖定的特定選民，並以此交換政治支持（選票）。而不是透過具有普遍性的公共政策，來吸引廣泛的選民（而非鎖定特定人或團體）進行交換。而為了確保這個未受正式制度保障的交換可以達成，政治人物必須訴

諸於傳統價值（諸如道義或有債必償等等），或是透過社會網絡進行監督（Wu, 1987; Kitschelt & Wilkinson, 2007; Landé, 1977）來維繫交易的進行。而派系（faction）則是依循著侍從主義的特殊利益交換關係，以垂直連結的方式所建立的動員組織<sup>4</sup>。

在上述侍從主義的特質下，學者們通常從選民的需求面與政治人物的供給面來思考侍從主義政治連結的變遷。首先，在需求面，選民在侍從主義下要求的是屬於個人或小型團體的特殊利益，但特殊利益交換以及因此而產生的課責關係，使得政治人物不必在普遍性的公共政策上回應選民，並且容易產生貪汙的問題。因此，當經濟開始發展，人民開始離開既有的社會網絡，出現了更廣泛的利益需要，而教育程度與所得的提升，也使得選民不再那麼需要個別特殊利益的供給，轉而需求普遍性的政策帶來的利益而導致連結關係變遷（Wu, *ibid.*；黃德福，1994；Kitschelt & Wilkinson, *ibid.*）。這些「現代化」因素因此成為重要的解釋變項。

而另一方面，在供給面，現代化因素也使得政治人物用以監督交易目標的社會網絡與傳統價值逐漸消逝，這也使得政治人物必須捨棄侍從主義策略。此外，政黨競爭的激化以及制度因素對於政治人物連結策略的影響也是重要的研究變項。政黨在全國層次的競爭在不斷重複的選舉中，可能對選民形成一定的政黨標籤，形成政黨認同而取代侍從主義的利益交換（Dalton, 2007）。當政黨競爭越趨激烈，兩黨之間必須開始競逐中間選民。在侍從主義的連結策略下，其所花費的成本將遠高出採用政策的方式。貪汙也可能成為顯著的議題，使得政治人物必須改變連結策略（Kitschelt & Wilkinson, *ibid.*）。制度的效果會使得政黨競爭的影響更為顯著，特別是在台灣既有的 SNTV 選制下，強化黨內候選人的競爭，因此不利於政黨競爭。但是在新的 SMD 選舉制度下，制度的誘因會促使政治人物、選民甚至政治獻金朝向選區內唯一有可能獲勝的兩位候選人，因此更容易形

---

<sup>4</sup> 詳細請參考第二章第一部分的論述。

成兩大黨的政黨體系，政黨標籤的影響力也會越加突出（Carey & Shugart, 1995; Hsieh, 2009）。在供給面與需求面的影響下，侍從主義的連結方式會轉向以政黨標籤，以及政黨標籤所代表的政黨綱領與政策的競爭。

然而，上述這些變因往往提供的是選民或政治人物「捨棄侍從主義的誘因」，但是新連結策略出現的原因，與「取代」侍從連結的過程，卻很少獲得充分的說明。本文認為，政治人物和選民之間交換關係的轉換，仍必須透過政黨在供給面的政治分歧競爭以及因此所形塑的具體政策綱領來改造既有的連結模式，才可能形成具有「特定政策內涵」的「政黨綱領式連結（party programmatic linkage）」，在政黨提供新的普遍利益分配模式下，取代以特殊利益交換政治支持的侍從主義。在拉丁美洲，Hagopian（2009）和 Kitschelt（2010）的研究就發現，拉丁美洲之所以能在 2000 年之後快速轉向更為制度化、以政黨綱領連結選民的政黨體系，是因為重分配的議題主導了政黨競爭的發展，使得選民依循這個政治目標進行選擇，因此使得政治人物必須以政黨綱領連結選民。

但在台灣，主導著政黨競爭的認同政治分歧雖然也使得選民的態度趨向兩極，但是台灣特有的政治分歧特質卻使得政黨綱領連結很難出現。衍生出台灣當前政治分歧樣貌的，是威權時期由於「一個中國」的政治安排而產生的「族群認同分歧」，並與其後產生的國家統獨（國族）與政黨認同高度相關。

而根據 Horowitz（1985: 21-32）的研究，社會中的族群間關係，可以區分成「等級族群體系（ranked groups）」與「分立族群體系（unranked groups）」。這兩者之間的關鍵差異在於：在「等級族群體系」中，族群之間存在著明顯的等級區隔，B 族群在各個領域都屈從於 A 族群之下；而在「分立族群體系」下，不同的族群之間沒有明確的上下從屬關係，A 群體在某一領域可能比 B 群體更為優勢，但是 B 群體在社會的另一領域中，可能比 A 群體具有地位與優勢。由於 A、B 兩群體可能各有其不同的菁英，因此也會彼此競爭與流動，不會產生自我設限與強化族群分野的制度和習俗。但是，當族群認同的歧異在民主化後成為政治分歧的主軸，先前不同的族群關係也造成不同的政治後果。

在等級化的族群體系中，族群的分界也就幾乎等同於階級的差異，因此產生的抗爭也和階級類似，常常訴諸於社會革命的形式，對社會結構做出劇烈的挑戰與調整。相反地，在分立式的族群體系裡，由於彼此擁有各自的菁英階級，因此族群之間的抗爭更像是「主權國家間的外交」，彼此的政治菁英都希望把對方排除在外，獨自掌握權力，而非進行激烈的社會改革以改變既有的分配體系，因此常常形成較為保守的政治模式。

而在台灣，在 1980 年代後躍上政治舞台，並且衍生出當前的國族、兩岸政策等政治分歧內涵的「族群認同分歧」，正是建立在「分立族群體系」的族群關係之下。儘管當時在政治場域仍然大部分被「外省人」所佔據，但是外省人並非都具有更優越的地位。台灣人（在定義上包含閩南與客家人）在經濟上也並不自認為弱勢者，甚至這個分歧也並未大幅影響兩個族群在社會中的交往（吳乃德，2002）。因此台灣的族群關係並非 Yang（2007）所認為的是「等級式的關係」，而是分立族群體系。

在這個情況下，包含了族群、國家統獨等內涵的「認同分歧」不僅取代了民主政治改革分歧。甚至，由於其源自族群認同分歧在分立族群體系下的跨階級、分歧的特性，因此也使得其他分歧難以出現。因此，在分配性政策上，當主要的政治分歧妨礙分配性議題成為主要議題，政黨競爭也就難以產出具有區辨特性的普遍性政策來號召選民。而只能透過國族與族群認同的情感，建立具有心理聯繫而不具利益分配內涵的「政黨認同連結」；或是社會中普遍已達成共識、沒有意見分歧，只能透過比較「誰做的更好」來競爭的共識型議題（valence issue）來競爭。同時，在缺乏替代的分配策略下，也只能在進行情感連結的同時延續既有的特殊利益分配。而甚至，當選民對於政黨的分歧不感興趣時，以特殊利益交換的方式來吸引選民的侍從主義就成為主要的連結策略。

## 肆、 核心論證與研究發現

本文主要探討的問題是：雲林縣立委與縣長層級的地方政治菁英在族群政治分歧與選舉制度變遷之下，他們和選民之間的連結關係會產生出何種政治連結樣態，而既有的侍從主義連結與派系組織又會因此發生什麼樣的變化？根據我在文獻檢閱中提出的看法，我將可能影響地方侍從主義連結的族群政治分歧作為主要變項，而將選舉制度作為中介變項。在下圖 1-2 中呈現出本文論證的主要架構。首先，既有的政治分歧的強化來自於政黨之間的激烈競爭。當政黨之間的得票越來越接近，以及採用偏向於兩黨的 SMD 選舉制度時，都會強化政黨依循著政治分歧展開競爭的傾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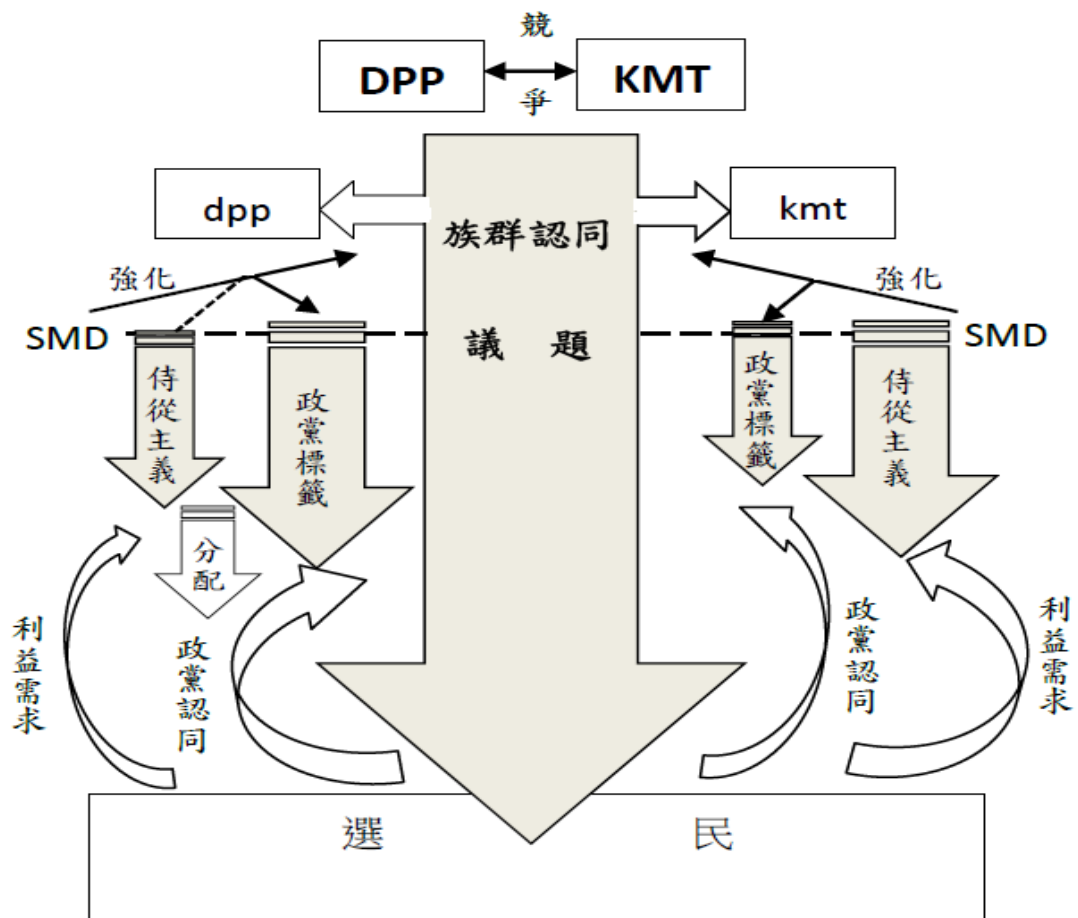


圖 1-2 研究架構圖

兩黨在政治分歧競爭上的強化分別對政治菁英和選民產生效果：在選民層面，政治分歧的出現使得選民更重視候選人是否表現出特定的分歧；而在菁英層面，選民的重視使得政治人物更願意服從政黨領袖提出的策略，並且更願意使用政黨所代表的政治分歧來吸引選民。兩者的循環與持續會進而強化這個連結關係，並且形成穩定的政黨認同。而 SMD 選制由於削弱了 SNTV 制度下的黨內競爭，因此也會強化這個循環，這會使得侍從主義連結越來越不具重要性。但是當我們解讀雲林縣個案的資料時，得出的結果卻並非如此。

在台灣的族群認同政治分歧中，政黨和選民建立的是屬於心理情感層面的「政黨認同連結」，因此並不具備利益分配的內涵。而且，由於台灣族群認同分歧跨越其他社會分歧的特質，使得政黨難以形塑出具有位置性的普遍性利益分配政策綱領。因此，可能的結果是：不具區辨特質的共識性議題（valence issue）下產生的政策，或是以不具普遍性的特殊利益分配，作為主要的情感連結下的利益分配方式，來和以認同上建立的情感連結「共生」於政治人物和選民的連結之中，以彌補政黨認同連結只在情感上交換而缺乏資源分配模式的不足。

而在 SMD 的制度框架下，政治人物也必須回應不具政黨認同的中間選民的期待。因此，政治人物很有可能是強調本身的執行能力、清廉等共識性議題。或是直接透過侍從主義，以特殊利益交換選民的選票，而使得侍從主義連結與政黨認同連結「並存」於政治人物的連結策略中。最後，政黨認同的情感連結雖然可能改變政治人物和選民之間既有的侍從關係。但是當政治人物必須供應特殊利益給選民時，政治人物之間也會因為對於特殊利益的與需求而容易產生侍從關係，甚至可能進一步垂直連結成山頭或派系的金字塔型組織。政治人物對於特殊利益的需求，也可能使得普遍利益的政策以及政黨的集體行動更難以形成，對民主治理有不良的影響。

在雲林縣最新的調查資料中顯示，雖然具有政黨偏好的受訪者不斷增加，並且在主要政治分歧的上態度也趨向兩極化（民進黨趨向認同台灣人而國民黨回應

「都是」者減少、回應「台灣人」與「中國人」的比例增加)。但是調查資料也顯示國民黨的偏好者在認同分歧上缺乏特定的位置,而且雖然兩黨支持者的投票穩定度都會在不同的候選人出現時有明顯的變化,但是國民黨支持者跑票的幅度是更大的。在對照菁英訪談資料後,我發現國民黨派系政治人物雖然感受到在政黨競爭與制度變革下,在提名和選舉的議題上受到政黨影響,但是派系和侍從主義網絡的經營仍然是他們爭取勝選的關鍵。而且,即便現代化因素正在改變雲林縣的選民,但是派系仍發展出不同的組織與策略,以適應社會現代化的發展。遲緩的現代化發展和國民黨與其選民在認同分歧上較為模糊的態度,或許是造成派系與侍從連結策略持續發揮影響力的重要因素。

然而,現代化和制度變遷卻很難繼續說明民進黨和選民之間的連結。在民進黨政治人物的訪談中,我發現儘管以認同與共識性議題(例如清廉、勤政、民主與人權)為主的「理念」宣揚,已經是民進黨與選民連結的主要策略,並且也使得政治人物和樁腳與選民之間發展出以政治理念與議題為主的交換關係,但是情感上的認同並無法滿足選民和樁腳對「利益分配」的需求。在缺乏具體的分配性政策下,民進黨政治人物仍然是透過大量的選民服務和地方建設來滿足政黨支持者,因此使得「政黨認同連結」與特殊利益分配「共生」。同時,為了在 SMD 選制下勝選,民進黨政治人物更必須透過特殊利益交換競逐不具政黨傾向的中間樁腳與選民,因此使得侍從主義與政黨認同連結「並存」。而在政治人物之間,也因為特殊利益的需求,在資源分配者與需求者之間產生新的侍從關係。

這些資料顯示,即便在日益激烈的政黨競爭與選至改革之下,雲林縣選民和政治人物之間的政治連結關係仍然並未完全脫離侍從主義的利益交換,以及以特殊利益為主的政治分配模式。這也導致政治人物之間仍然產生侍從主義的連結關係,政治課責關係也很難走向更明確、更有效率的政治模式。而重要的原因之一,便是兩大黨在政治競爭中仍然依循著情感導向的認同分歧來連結選民。

## 伍、研究限制

本文的研究主要在於探討政治人物在制度變遷與政黨競爭下，在供給面（supply side）上如何選擇連結選民的策略，並且試圖透過台灣政治分歧的缺陷來論證地方政治人物的連結策略選擇。然而，這個研究取向不僅刻意忽略了需求面的因素，在方法上也很難釐清供給面上眾多因素的影響，這讓我論證的主要變因：族群認同分歧特質的解釋力顯得薄弱。

在需求面，現代化因素一直是研究者用來解釋侍從主義連結發展的重要因素。而儘管「現代化」概念的內涵以及實證上的影響曾受到學者的懷疑（高永光，2001），但是本文的案例選擇並無法規避這個重要變因的影響。因此，當雲林縣仍然具有大量的農業人口以及人口老化之下，我雖然能夠透過兩大政黨之間的差異來說明政治分歧對於當前政治連結的重要影響力，但仍很難在研究中釐清選民在需求面對於特殊利益的需求對雲林縣政治人物採取的分配策略的具體影響。其次，在政治菁英的供給面，我也忽略了地方政府和立委可自由支配的資源的因素。許多研究顯示，當政治人物可利用於自由分配的公共資源越多，他也就越可能採取侍從主義的連結策略（Chandra, 2007; Kitschelt & Wilkinson, *ibid.*）。

此外，資料分析的能力是本文在寫作過程中的一大問題。對於量化資料的統計操作一直是我難以克服的困難，因此難以使用難得的 TEDS 調查資料獲取更多研究成果，也無法和質性訪談資料做更完整的契合。最後，訪談過程的瑕疵以及欠缺部分關鍵的訪談對象的問題也是研究中重要的限制因素。我對於某些問題的執著以及態度，往往影響受訪者的發言，這是在訪談過程中不斷自我反省的課題。而許多受訪者時間有限，難以讓我不斷約訪。幾位重要的約訪對象，尤其是國民黨許派的重要樁腳以及蘇治芬縣長，也因為時間與突發事件，因此無法提供寶貴的意見。這些問題都讓本文所能提供的資料，以及整體論證的可信度受到相當大的限制。

## 陸、章節介紹

在本章當中，我已經說明了這個研究的研究背景與研究問題，並且將我對主要文獻的看法與本文的核心論證做簡要的敘述。在下一章，我會開始將相關的文獻與理論討論做細緻的回顧，透過比對不同作者的理論觀點與實證發現，試圖尋找可能提供說明的理論資源。在第三章中，我將對雲林縣地方政治的歷史做簡單的介紹，尤其是 2005 年後到 2009 年立委選舉補選與縣長選舉期間的主要發展趨勢。這些內容可以讓我們更容易將報章雜誌上所看到的雲林縣的現狀，與第四章所呈現的調查資料，以及地方政治菁英們在質性訪談中所談內容的相連結。

在第四章，我將開始把取得的資料做出分析和論述，並且將質性資料和調查資料的結果相互補充。在資料呈現的過程中，我們將可以看到，侍從主義的政治連結模式不僅在國民黨較不顯著的分歧立場下延續。即便在民進黨政治人物和選民之間，也並未被新的連結所完全取代。當民進黨的選民和樁腳對於民進黨「政治理念」展現認同的同時，他們的利益需求與政治人物的供給仍是特殊化的。而為了滿足選民的利益需求，政治人物之間更是持續著利益—政治支持的侍從主義交換關係。新的選舉制度儘管強化了政黨形象的重要性，但也並沒有改變原本的政治模式，甚至由於必須取得過半的選票，而強化民進黨政治人物以利益交換吸納中間選民的誘因，並因而又再強化了政治人物之間的侍從關係。

在雲林縣的地方政治中，兩大政黨都採取了或多或少的侍從主義策略來吸引自己的選民。極化的族群認同分歧和 SMD 選制雖然確保了在心理上認同於政黨立場的支持者選票，但卻沒有改變政治菁英採取侍從主義交換以強化政治實力的誘因，也無法取代選民對於特殊利益的需求。在最後一章當中，我會綜合性地總結上述的資料與論證，並且討論可以進一步進行的研究議題。



## 第二章 文獻、理論與研究設計

### 壹、文獻檢閱

本文企圖以雲林縣的個案，在實證上說明政治人物與選民之間的政治連結現況。特別是雲林縣的侍從主義連結，在族群政治分歧與 SMD 選舉制度的框架下，可能會產生如何的變化。這個主題在過去是台灣派系政治的研究問題，因此文獻分析的開始會先討論台灣地方派系與侍從主義發展的特質，重點在於整理相關研究文獻中對於派系與侍從主義特質的論述，特別是在這些特質之下，侍從主義與派系組織可能如何演變的理論觀點。

在第一部分中，我將主要介紹 Kitschelt 與 Wilkinson (2007) 與 Wu (1987) 等學者對於侍從主義的看法。他們將侍從主義視作一種特殊利益交換的模式：公民索求屬於個人或小團體的特殊利益，而政治人物以此交換他的政治支持，並且透過不斷的垂直分配利益，形成金字塔狀的派系組織。然而，他們對於侍從主義變遷所稟持的社會經濟現代化論點在分析上卻有其盲點。現代化因素，譬如教育、職業與經濟發展，認為的連結方式變化關鍵因素是選民在需求面的改變，以及政治人物在供給面的相對變化。但是這忽略了分配特質的政治連結轉型，應該有另一個政治連結關係產生，並且取代侍從主義的關鍵過程。且這個過程並非在現代化中自動發生，而是必須有政黨之間對政治分歧的競爭來產出新的「政策綱領」與選民連結。在當前的研究中，研究拉丁美洲的學者，如 Kitschelt (2010) 與 Hagopian (2009) 都已經指出經濟資源分配與階級分歧的問題，是在拉丁美洲造成了政黨競爭走向「綱領式政黨體系 (programmatic party system)」轉型的主要原因。但在台灣的相關研究中，卻缺乏對於台灣特有的政治分歧的討論。

因此，在第三部分，我將呈現本文主要的理論依據。在台灣，以族群與國族認同為主的政治分歧不僅在民主化後快速地取代了民主改革的分歧，同時也成為

唯一能被民眾分辨出的政治分歧（王宏忠，2010）。而由於其政治分歧特質切割了其他的社會分歧，並消解了和分配有關的階級分歧，因此儘管當前的政黨競爭雖然越趨激烈，但以情感為主的認同分歧卻難以提出一套得以取代侍從主義利益交換功能的利益代理與分配的政策。從這個觀點出發，在第四部分我會提出本文的理論觀點。我認為：侍從主義的連結不會在當前的政治分歧下被取代。縣長和立委層級的政治人物和選民之間的連結關係，或者持續著侍從主義政治下以利益交換的政治連結，又或者以缺乏具體的分配政策作為核心的「政黨認同連結」維繫選民支持，但同時在利益分配上則仍然持續以特殊利益的方式進行。無論如何，這都不是 Kitschelt 與 Wilkinson 所提出的「政黨政策綱領的連結」模式，甚至可能更接近侍從主義的特徵。

## 一、派系組織與侍從主義連結

在台灣，對於派系政治的討論主要針對兩個面向的問題做探討：首先，學者們試圖解答派系政治在威權時期如何維繫了威權統治的基礎，而派系在民主化過程中又如何影響民主化的發展（Wu, 1987；朱雲漢，1992；陳明通，2001；若林正丈，2009）。其次，相關討論延伸出民主化之後，派系政治將如何發展的問題。而其中之一傾向於討論侍從主義如何在新的民主化政權中產生變遷（王振寰，1996；丁仁方，1999）；而多數的學者，則傾向探討派系組織的存續、派系內部的組織變遷，以及派系的選舉影響力是否能持續存續的問題（黃德福，1994；趙永茂，2002；王金壽 2004、2007）。這些相關研究都企圖論述侍從主義在民主化之後的演變，然而他們對於派系與侍從主義的基本論點不僅莫衷一是，也並未提出完整的解釋觀點來說明民主化與侍從主義的變化。因此，在第一部分，我將把討論鎖定在兩個面向：首先，台灣的派系與侍從主義的核心特質為何？其次，侍從主義政治型態在民主化之後會怎麼演變？為什麼？

### (一) 侍從主義與派系的特質：特殊利益交換與微弱的課責關係

台灣對於地方派系與侍從主義的討論通常認為派系與侍從主義的起源來自威權國家的影響與操弄，以及地方社會中既有的社會制度與人際關係網絡的發展。而在民主化之後，對於派系發展的論述也相繼提出以現代化因素，以及制度變遷因素作為主要的解釋變項。

Wu (1987) 在其博士論文中，率先探討了台灣的地方派系和威權政體之間的關係。雖然他的研究目標在於探討國民黨的威權政治體制，如何利用侍從主義和地方派系在其作為外來政權的基礎上，繼續維繫政權的動員能力，但是他對於侍從主義的某部分特質的看法在本文中非常具有意義。他認為，侍從主義在國民黨的威權體制下，是政權妥善利用的一種利益中介(*interest intermediation*)形式。在這種利益中介的模式中，利益的表達是以個人化的特殊利益（而非集體、和所有成員共享的普遍利益）進行，並且利用垂直的連結關係進行組織形式的利益表達 (*ibid.*: 26-28)。

這種將侍從主義與派系視做「以特殊利益表達而垂直結合成的組織」的論點，基本上源自於 Landé (1977) 對於侍從關係和派系的看法，但是 Landé 並未將其納入政治體系當中視為一種「利益表達與匯集」的特殊中介形式。不過，為了詳細說明侍從主義的內涵，以下我先簡介 Landé 的看法。

Landé 認為，「侍從主義 (*clientelism*)」是一種建立在不對等的資源與權力基礎上的「二元直接關係 (*dyadic direct relation*)」。個體之間是以權力、經濟上較優越的「恩庇者 (*patron*)」，與較弱的「侍從者 (*client*)」兩個人為基礎，且是基於彼此私有的、非關於群體和普遍性制度的「直接 (*direct*)」關係<sup>5</sup>

---

<sup>5</sup>「直接 (*direct*)」關係的意思是這種關係並非基於職務、制度或是特定群體的因素產生，而是兩人之間的私自關係。因此，假如在某一群體中，兩人的去留與榮辱是直接關連，而非來自群體或制度的因素，那麼兩者之間就存在著二元的「直接」關係。

構成最小單元。彼此提供另一方無法或很難取得的象徵或實質好處，以及對於必要時協助的保證。Landé 認為，這樣的直接關係之所以會建立，通常是因為正式制度無法滿足某些需求，因而產生依附在正式制度下的附加物<sup>6</sup>（*addendum*）。派系則是這個垂直二元直接關係不斷向上連結，所形成的非正式（*non-corporate*）組織<sup>7</sup>（*ibid.*: xiv- xxxiii）。

Landé 對於派系的主張也是本文對派系的基本看法。但侍從主義的定義內涵則還需要進一步的界定。而在 Wu 的看法中，與其說侍從主義是因為正式制度的不足而產生，不如說是國民黨政權積極操作的結果。

Wu 認為，威權政府一方面利用特務和司法體系威脅，另一方面則透過選舉侍從主義（*electoral clientelism*），在以「區域性（地方性的）的寡佔經濟」（朱雲漢，1992）<sup>8</sup>為基礎的恩惠分配下，讓地方政治人物利用個人的各種血、親緣等關係連結地方人際網絡和傳統文化價值來確保侍從關係的穩定，以建立起政治人物和選民之間的侍從關係。這造成的效果是：首先，即便在中央政權是封閉的情況下，侍從主義動員維繫了中央政治菁英的地位。侍從主義的政治體系幫助沒有地方基礎的外來威權政權，在缺乏意識型態動員能力，並且把階級團體為基礎的統合組織<sup>9</sup>「去動員化（*demobilized*）」之下，仍然能透過利益交換來維繫動員群眾支持的能力（*ibid.*: 17-20）。而另一方面，由於侍從主義以個人之間的雙元結合為基礎，因此這個動員方式產生的組織缺少水平的連結，成員之間也只存

---

<sup>6</sup> 但在陳明通（2001）的作品中，則把這個觀點充分納入。他認為台灣的侍從主義也和國民黨政府在大陸時期的派系有所關連，而大陸時期和台灣初納入國民政府管轄時的派系，則確實有彌補政治制度的內涵。

<sup>7</sup> 由於派系是由二元直接連結形成的，因此「非正式組織」的特色也在於這個「組織」缺乏正是組織所擁有的特色：共同的成員身分、財產和組織的長期目標，只有短期互助利益可以形成短暫的目標。陳明通（2001）也認為，派系目標的產生來自金字塔頂端的恩庇主（*patron*）所分配的利益。當恩庇主得利而能夠有利於其他成員時，就能產生集體目標。

<sup>8</sup> 朱雲漢（1992：141-152）在〈寡佔經濟與威權政治體制〉一文中，說明了威權體制中中央菁英和地方政治菁英隔離的基礎，以及中央菁英對於地方菁英以威權強制力與侍從、壟斷的經濟利益為主的支配方式。分配給地方菁英的物質利益基本上是以「區域性（地方性的）的寡佔經濟」為基礎，包括銀行、各式合作社，與濃漁會或客運公司等等。其次則是以政府公部門掌握的各類銀行行庫的貸款，以及公共預算、政策、建設的分配。這樣的分配不僅讓「公共財私有化」，並且讓地方派系的恩庇主得以運用這些資源，「換取民眾對特殊政治關係的依賴」以取得政治支持。

<sup>9</sup> 例如農會與工會。

在對於恩庇主的特殊利益要求而沒有共同的利益，因此導致低度的課責效果，對於威權政府的壓力也就因此降低（*ibid.*: 31-33）。

假如不考量不同威權政體對於理論的影響，那麼 Wu 對於侍從主義在「利益分配」與導致的「課責關係」上的看法，與 Kitschelt 與 Wilkinson（2007: 6-23）的論點相當接近。他們認為，在侍從主義連結（*clientelistic linkage*）模式之下，作為委託人的選民和作為代理人的政治人物之間，存在著以可辨認的個人或是小團體為主要對象的「特殊利益（*particular good*）<sup>10</sup>—選票」交換關係。政治人物「只」將利益分送給「特定、可辨認」的個人或團體，並且也需要監督機制來確保這個不被法律保障的交易會順利進行。而相對於「特殊利益」交換，「普遍利益（*public goods*）」指的是對於一般普遍大眾都有影響的政策利益，且政治人物無法、也不會針對特定受益者做回饋的要求。兩者之間的關鍵差異，在於政治人物是否嘗試去辨認受益者，且企圖要求他做出選票上的回饋。在侍從主義中，選民也可能對政治人物進行課責。但是課責的目標是彼此交易的特殊利益，而非普遍性的政策。因此就如同 Wu 所論證的，Kitschelt（2000:851-2）也認為，在侍從主義下，政治人物更能夠自由的選擇政策，而免於受到選民課責。

Kitschelt 雖然並未將侍從主義以「利益代表與匯集」的中介模式來看待，但是這個特殊利益的「連結關係」也涵蓋了政黨、政治人物與選民之間的利益需求與利益分配。而在這幾個學者的看法影響下，本文所使用的「侍從主義」包含了以下幾個特質：首先，他是一種政治支持（選票）和利益之間的交換關係。其次，交換的「利益」的內容是一種個別選民要求的「特殊利益（*particular interest*）」，而非由有利於不特定大眾的「普遍利益」。第三，在交易的過程中，利益的分配者希望能辨識、掌握利益的接受者，以確保交易的進行。這三個特色，將成為本文對於侍從主義的基本界定與後續討論的重點。

---

<sup>10</sup> 在 Kitschelt 與 Wilkinson 的論述中，比較常出現的字眼應該是「私人利益（*private good*）」。但因為「特殊（*particular*）」也被他所使用，且其他文獻中更常出現，因此本文中都用「特殊利益」來稱說侍從主義的交換內容。

## （二）侍從主義的變遷

### 1、現代化理論觀點

在上述對於侍從主義特質的說明下，侍從主義可以大致被界定為：「政治人物以特定選民所需求的特殊利益，進行選票與利益之間交易的一種政治連結關係」。而由於這樣的交易並不受到正式制度保障，因此必須建立監督的組織，常常是透過社會網絡與傳統價值來進行與確保交換。因此 Wu（1987: 358-363）認為，現代化變遷中社會網絡與價值的變化是侍從主義走向民主政治的重要關鍵。Kitschelt 與 Wilkinson 也同樣將現代化因素作為侍從主義連結走向「政黨綱領式連結（programmatically party linkage）」的關鍵變因，但他對此的論述更為完整。

他們認為，由於侍從雙方的交易並非同時發生，也缺乏正式制度加以保障，選民或政客都可能在過程中反悔，因此侍從交易通常必須在既有的社會基礎上建立龐大的掮客（broker<sup>11</sup>）組織，以及監督懲罰機制來進行防止搭便車的行為。且由於選民和政治人物之間存在的是自願性的交換關係，因此當供給與需求雙方出現變動，譬如政治人物無法繼續提供特殊利益，或是選民難以繼續滿足於特殊利益而需求更多集體的普遍利益時，侍從主義連結就可能發生變動，進而轉向以政策綱領的交換關係（programmatically exchange relations）。Kitschelt & Wilkinson（2007: 23-46）認為，經濟發展與政黨競爭程度是影響連結形式的最大因素，而國家的政治經濟結構作為中介變項。族群動員的因素則因為族群所提供的社群網絡，而可能作為一個獨立的影響因素。

經濟發展的影響可以從供給與需求兩個層面來看待。在需求面，經濟的發展產生兩個效果：首先，經濟發展促使人民財富提昇，則公民對於侍從利益的需求降低。而另一方面，公民在市場與社會的規模擴大之下，離開了地方性的網絡。階級、部門或職業的社會連結會在新的大規模市場中產生，並且促使選民需求普

---

<sup>11</sup> 即是台灣派系政治脈絡下所謂的「樁腳」。

遍性的集體財（collective goods）。教育程度的提高，則促使選民更能認清與主張自己在集體財方面的需求，因此使得需求面出現變化。而在供給面，政治人物在面對日趨複雜、難以收買與高流動性的選民時，付出的成本會大幅提高而促使政治人物必須思考策略的移轉。其次，在發展程度提高之下，政黨競爭的激烈化也會造成連結關係的變化。但「競爭」的程度很難定義，Kitschelt & Wilkinson（ibid.: 28-33）將競爭的情況定義為：「公民與政治人物有為了政黨爭取邊際支持者（supporters at the margin）的強烈動機」<sup>12</sup>。當競爭程度逐漸上升，政治人物會優先瞄準那些需要比較少的成本的選民。而當競爭到一個階段，政治人物會開始鎖定較不確定的選民。此時，假如是在採用侍從交換連結策略的情況下，政治人物追逐邊際選民的成本會快速上升，但成果卻只些微提昇；而假如是在綱領連結策略下，成本的上升則比較緩和。因此，競爭程度在經濟發展的前提下，可以作為「催化劑」的角色來改變政治連結。此外，政治對於經濟的控制是侍從主義連結很重要的助力。1980年代以來的經濟自由化、全球化發展，使得統合主義的市場結構必須轉型，許多由國家主導出口替代策略的國家也面對經濟危機，因此紛紛開始改採自由化的政策，降低經濟政治化的程度。這促使勞工和企業在需求面上不再仰賴政治侍從連結來取得資源，而侍從恩惠的成本也開始上升，因此可能會轉換既有的侍從連結。

他們認為上述這三個因素的互動會影響連結關係，族群衝突的因素在提供了更穩固的社會網絡和身分辨識的前提下，也會使得侍從主義較為容易被採用。但對於他們來說，主要的影響因素是經濟發展程度以及政治競爭的程度。當發展程度與競爭程度兩者都高的情況下，會促使政黨走向政黨綱領式的連結；當發展較低，而競爭升高時，則較可能會讓政治人物尋求干預經濟以建立侍從關係，而經濟政治化的結果甚至可能再進一步降低競爭，甚至走向寡頭發展。

---

<sup>12</sup> 這個情況可能是：首先，對於選民來說，選前的情況相當接近，難以得知誰會執政。其次，有一定數量的中立（uncommitted）選民，足以左右原有的平衡。最後，這個選舉必須相當重要，足以改變整體政策與資源分配。因此，「競爭」這個概念的核心是「（被）替代的可能性」，政黨體系的破碎程度並無法反應這個概念、中間選民的量也不重要，重點是是否關鍵到足以翻轉重要的選舉。

在 Kitschelt 與 Wilkinson 的論述中，侍從主義連結變遷的主要因素是經濟發展下，選民的會結構與本身的需求變遷的結果。Wu (1987: 358-363) 同樣也發現到侍從關係缺乏正式制度得以保障交易的問題，認為威權國家必須透過強制力或是文化與傳統價值來維繫交易的穩定性。因此，國民黨威權侍從體制的衰退會是來自經濟的發展以及社會轉型因素的影響。假如恩庇主提供的利益可以透過其他管道取得，而傳統價值逐漸式微，那麼立基於傳統社會網絡而建立的侍從體系的效力就會大幅降低。

兩者的對於侍從主義的特質與可能的變遷因素的看法相當類似，他們都認為侍從主義變遷的根本關鍵在於經濟與價值層面的變化。而許多實證研究也確實在後來的資料中得到這種現代化論點的驗證，譬如黃德福 (1994) 對 1992 年的立委選舉結果中，地方派系當選比例的研究即顯示，假如以「高中以上教育人口」、「非農業就業人口」、「新生代人口」以及「人口流動率」等四個社會與經濟的現代化指標，以及民進黨得票率佔國民黨得票比率代表政黨競爭程度指標來觀察地方選舉。他發現，現代化程度越高的地區派系的影響力越低，而政黨競爭的程度則幾乎沒有影響。這表示現代化因素在當時已經是派系與侍從主義連結影響力變遷的重要變項。此外，在趙永茂和黃瓊文 (2000) 對於雲林縣水林鄉的研究中，透過對於派系成員的深度訪談發現，雲林地方派系內部的關係已經因為社會與經濟環境的變化而出現質變。由於政治與經濟的多元化，派系與國民黨之間以及派系內部成員互動的自主性都開始提高。而在政治人物與選民之間，以往透過「人情」與「關係」為主的動員模式，則逐漸轉向以經濟利益為主的動員模式，這些都說明社會經濟結構是一個重要的變項。

## 2、制度論觀點

在另一方面，許多研究也接續探討民主化後（甚至應該說 1980 年代黨外出現後）的多黨競爭，以及制度變遷導致的政治機會變動對於派系政治的影響。在過去的研究資料中，政黨競爭與制度結構變遷對於侍從主義連結產生的影響發生

在派系組織的變動上：王金壽（2004、2007）在其論文中認為，在 SNTV 的選舉制度下，派系面對的是內部菁英間的競爭。而政治機會的增加，尤其是民進黨的出現以及 1992 年後中央及選舉的全面開放，導致派系內部的政治菁英之間出現突如其來且領導人難以解決的競爭壓力，因此相互爭奪底層的樁腳與政黨的鐵票。這使得既有的，以穩定的金字塔結構出現的派系開始瓦解，但取而代之的則是以政治人物以其個人交情或能力，建立的小型金字塔結構—「政治山頭」（王業立、蔡春木，2004）。

### （三）現代化論與制度論的缺陷：誰取代？

然而，上述關於侍從主義變遷的論述存在兩個並未觸及的盲點：首先，傳統型派系結構的消失並不意味侍從主義的消失。派系分裂後的政治山頭仍然依賴著侍從主義的連結，來進行政治菁英間的結盟、樁腳組織的佈建，以及政治人物、樁腳與選民之間以利益交換建立的連結，並且依舊呈現出金字塔型的組織樣貌。丁仁方（1999）的研究也發現，在民主化之後，侍從主義並沒有出現根本的轉型，也沒有被新的利益中介方式所取代，而僅僅是發展的更為多元、納入更多的分配對象，但是既有的垂直連結關係和分配模式並沒有太大變化。在王振寰（1996：172-255）的三個案例研究中也發現，無論是在現代化的台中市、經歷社會運動的豐原市，或是長期由民進黨執政的高雄縣之中，侍從主義連結仍然以不同的形式維繫<sup>13</sup>。而這樣的發展該如何系統性地解釋？

其次，更為重要的是，儘管現代化論認為侍從主義的轉型將形成以「政黨」甚至「政策綱領」為主的連結形式。但是現代化社會中，民主政治發展的道路並不單一。特別是在 Wu 和 Kitchelt 的論述當中，侍從主義都是作為一種個人索求

---

<sup>13</sup> 在王振寰研究的豐原市與高雄縣中，即便在反對黨執政下，派系菁英、樁腳與選民之間以利益交換為主的連結關係仍然維繫著。而值得爭論的例子是台中市，因為在他所呈現的資料中，派系在市長與立委選舉中已經不再推派人選，只維持在小選區（省議員和市議員）選舉中的影響力。但王振寰強調的是：即便派系不再現身於高層次選舉，但是透過都會開發的利益，派系菁英與非派系菁英之間仍然維繫著利益的結盟。

的特殊利益分配來與選票交換的模式。選民以個人或小規模的團體為基礎，向個別政治人物以選票為代價，請求有利於特定個人或團體的「特殊利益」，而政治人物則以特殊利益回饋來取得政治支持。相對的，在 Kitchelt 定義的「政黨綱領式連結」中，政治人物和選民之間是以普遍性的政策相連結，政治人物不會鎖定得到利益的特定選民，選民也不一定會因為分配到利益而投票給特定政治人物。但是在需求面上，選民的利益需求在侍從體系下是個人化的，而非具有普遍利益認識的群體。因此，在現代化論的解釋中，我們不能忽略選民的利益如何組織或被組織的過程。第二，在供給面，政治人物並不會自動產出具備普遍性利益的政策。具體政策與政黨綱領的產生，往往涉及到政治菁英間競爭以及不同政治分歧造成的影響。而政治菁英間產生的政治分歧，往往又左右了選民對議題的思考和政治行動（Zaller, 1992: 6-28; Schattschneider, 1960: 71-96）。換言之，假如現代化理論只考慮到所得、教育或都市化等指標，可能很難說明侍從主義政治連結的變遷，特別是新的政治連結如何形成的問題。

而有別於現代化理論較強調需求面的變化，本文採取看法更偏向供給面的看法，更著重於探討政治菁英如何在政治競爭中產出新的連結策略、如何以普遍性的利益取代特殊主義的利益交換，而全國層次的政治分歧又如何影響了地方政治人物。這個提問也來自台灣的政治現況：越趨激烈的政黨競爭正在改變地方的政治樣貌，而新的立委選制又助長政黨競爭的發展。因此，政黨競爭的內涵與影響成為本文關心的主要變項。在以下的文獻探討中，我希望獲得解答的另一個問題是：是什麼樣的 political 分歧得以取代侍從主義？又將如何取代侍從主義？

## 二、 誰取代了侍從主義？族群認同與選舉制度的影響

上文中已經提到，政黨體系的制度化以及綱領式競爭的出現並非僅僅來自選民在需求面的改變，也可能是來自政黨競爭在供給面所形塑出的政治分歧的影響。

Hagopian (2009) 的研究就發現，巴西的政黨競爭在 1990 年代中期之後，議員更為重視政黨紀律、換黨頻率降低，並且開始捨棄個人特質和地方性的競選策略 (parochial campaign)，並且在國會立法與政策上授與政黨領袖更多資源與權力，轉向以政黨標籤和政策綱領為主的政治競爭策略。然而，這個轉型並非來自選民需求面或是選舉制度的改變<sup>14</sup>，而是經濟改革議題的極化 (polarized) 促使政治人物相信政黨的政策綱領具有決定選舉結果的價值。同時，經濟的衰退與市場的自由化改革也縮減了國家恩惠 (patronage) 的範圍和資源基礎。因此政黨領導人變得更願意以政策宣傳，議員則更願意交付權力給政黨領袖。並且由於政策位置的變動會受到選民的課責，因此更願意留在單一政黨中。政黨開始變得一致化 (homogenized)，而選民在選舉時的回應則強化了這個正向的循環。Kitschelt (2010: 35-43) 對於拉丁美洲各國政黨體系的分析也認為，當經濟富裕程度、教育水準提高，需求面對於選擇性誘因的要求會減少，而政黨競爭的持續則讓選民對於政黨綱領的學習成為可能，但是關鍵的重點仍在於「政治目標 (Stakes of political battle)」的產生。

下圖 2-1 是 Kitschelt (ibid.: 42) 用來表示政黨綱領連結如何出現的架構圖，其中經濟的發展和持續的選舉競爭是基本的背景因素，並且是政治目標 (stake) 出現的基礎。圖中的虛線表示，經濟發展和持續的政黨競爭雖然也對綱領式政黨體系的形成有所助益，但是並非直接的因素，主要仍必須透過和政治目標的互動來造就政黨體系的轉變。在長期來看，假如資源與機會出現，且分配性的體制與制度選擇 (regime and institutional choice over fundamental distributive arrangement) 的政治目標出現成為主要動力時，政策綱領式的政治連結也就更容易出現。

---

<sup>14</sup> 在巴西的案例中，Hagopian (ibid.: 364-6) 發現在政黨政治轉型期間並沒有制度變更，而選民的態度也是在政黨競爭轉型後才開始轉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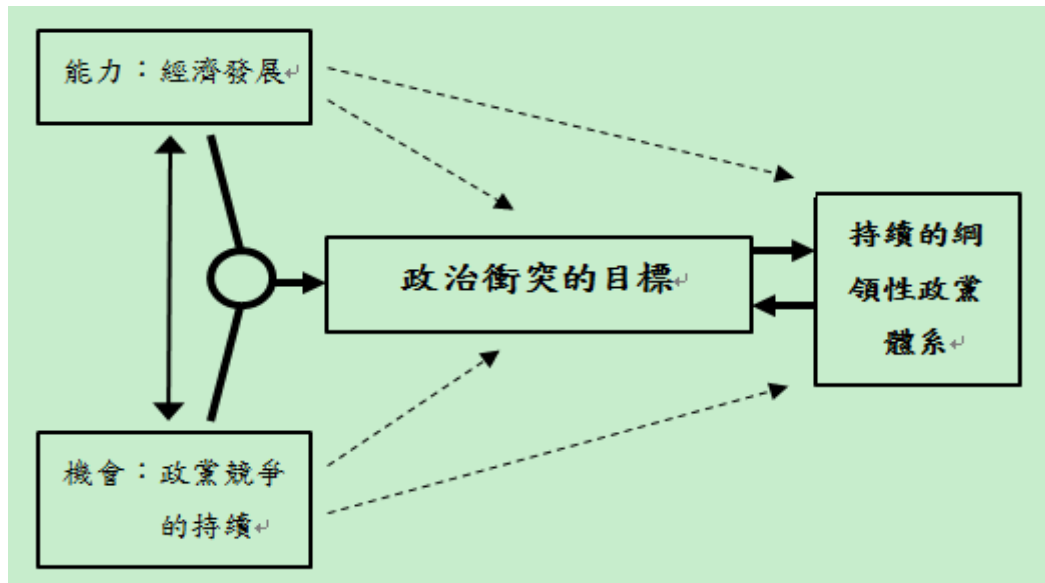


圖 2-1 綱領式政黨體系形成架構圖

資料來源：Kitschelt, 2010: 42

儘管這兩位學者的研究並沒有提及其他政治分歧的影響，但是上述拉丁美洲的經驗說明，出現具有特定政策內涵的政治分歧是政黨領袖能夠捨棄侍從主義，進而走向綱領式連結的關鍵因素。而從第一部分我們所歸結的「侍從主義特質」來看，侍從主義是一種以可辨識、監督的個人與小團體為主的特殊利益表達與匯集的機制，並且也是一種以特殊利益分配來換取選票的手段。因此，特定的政治分歧與政黨在政治競爭中形塑出的連結策略與具體政策，也必須要取代侍從主義下以「特殊利益」為主的「利益—選票交換」功能，才可能真正轉型成「政黨政策綱領式」以「普遍利益」吸引廣泛、不特定選民的政治連結模式。然而，台灣兩黨競爭的政治分歧與其產出，是否能夠取代侍從主義的利益分配功能呢？

#### (一) 台灣的統獨與族群認同分歧

在台灣，儘管經過民主化後 20 餘年的選舉競爭，兩大政黨間主要的政治分歧一直圍繞在「族群政治議題」與衍生而相互強化的「國族認同」的歧異上。

根據王甫昌（2008）的研究，台灣族群認同分歧的形成來自「黨外」在美麗島事件之後，開始更強烈的攻擊國民黨政府的民主改革步驟，以及象徵國家「道統」的中央民意代表選舉，漸漸地將政治目標移轉到國民黨所宣稱的國家合法性基礎以及背後的國家、民族的想像，開始挑戰國家定位與「本省人」及「外省人」之間族群不平等的問題。其關鍵的質疑是在於中央民意機關和政府的高級文官中，台灣人的比例長期過低、要求全面改選中央民代，因而把整個焦點移轉到了族群間不平等的問題。但比起問題的提出，對於這個政治分歧的形成來說，更為重要的是論述被一般大眾接受的「公共化」過程。王甫昌認為，這是由於國民黨內部主流派與非主流派的競爭，以及外省第二代政治菁英的參選過程中，開始將原本省籍身分各異的「外省人」也塑造成一個弱勢群體來凝聚選票，因而使得族群議題在不同陣營的競爭下，成為一個顯著的政治分歧。在之後的實證研究中，學者們發現這個政治分歧在兩黨（或藍綠兩大陣營）競爭中扮演關鍵的重要性。族群意識和涉及統、獨的「國族認同」議題不僅成為總統選舉的主軸，並且成為政黨認同的核心，甚至影響了各種公民的政治行動（陳陸輝，2000；蔡佳泓、徐永明、黃琇庭，2007；盛杏媛、鄭夙芬，2009）。

許多實證研究已經發現，這個新的政治分歧對政治菁英和選民的政治行為發揮顯著的影響力。譬如，從政治菁英的立法行為，我們可以辨別政治人物企圖用什麼立法內容來試圖和選民連結。盛杏媛（2000）對立委進行的調查發現，在2000年政黨輪替之前，國民黨立委雖然佔有絕對多數，但是卻各自以選區利益為重，偏向政黨的比例相當低，國民黨只能以物質、人事利益與黨紀來勉強約束黨籍立委。然而，人數較少、將主要目標置於立法院的民進黨團卻較能維繫集體行動。而在2000年首次政黨輪替之後，盛杏媛（2008a）的訪談發現：一方面國民黨籍立委人數在2001年選後大量減少，另一方面藍、綠兩大陣營以統獨議題為核心的對立與衝突升高，政黨之間議題競爭的極化使得政黨標籤對立委的連任產生影響，立委願意支持政黨所提出的政策，政黨領袖因此更能約束立委進行集體行動。盛杏媛以立院的記名表決資料對上述論點進行分析，發現政黨的凝聚力

<sup>15</sup>隨著屆期快速的上升，而政黨的對立<sup>16</sup>也在統計上對政黨凝聚力呈現顯著的影響力。顯示政黨之間競逐的統獨議題在政治菁英的認知上，已經對他們的選舉前途產生影響。

另一方面，在選民個體層次的投票行為研究上，許多文獻反覆驗證了政黨偏好（或政黨認同）的和選民投票抉擇之間具有顯著的相關性。而且這些研究也同時發現選民的政黨偏好和國家統獨議題、族群認同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陳陸輝（2000）的研究認為，在 1980 年代末期到 1990 年代初，激烈且持續的選舉競爭開始形塑台灣民眾的政黨認同。他利用 1992、1995、1998 年幾次在立委選後進行的調查資料發現，不同世代選民透過不同的政治經驗，建立自己與政黨之間的連結，而這個連結基礎，正是在王甫昌（ibid.）的研究中，由兩黨依統獨與族群議題所建立起的政治分歧。鄭夙芬（2009）的研究則將四次在總統選舉後進行的調查研究中「台灣人／中國人認同」及「統獨立場」兩組問題，合併成一個名為「台灣意識」的單一指標<sup>17</sup>。他發現，泛綠候選人的選民支持，大部分都來自具有高度台灣意識的民眾，且有逐漸增高的傾向；而低度台灣意識者，則顯著地支持泛藍候選人，高台灣意識者對泛藍候選人的支持比例相當的低。在這些研究中，國家統獨與族群認同不僅是解釋選民投票行為的最主要因素，而且也已經很難分辨各自的內涵。因此，在本文中，我將這個由族群差異衍生的政治分歧統稱為「認同分歧」，用來指涉台灣目前政黨間的主要政治分歧。

---

<sup>15</sup> 盛杏媛（2008：23-26）認為，政黨凝聚力可以以議員們在國會的集體行動來加以解釋，並且將其操作化以記名表決時黨內的團結程度來計算。其計算方式為：記名表決時一黨中多數立委的比例減去其他立委的比例。

<sup>16</sup> 政黨「對立」的程度也是以記名表決的資料加以操作化。其計算原則是：「國、民兩黨立委在某些議題上分持不同力場的程度」，並且是以敵對的比例來計算。假如該次選舉至少有 90% 以上的國民黨立委與 90% 以上的民進黨立委站在相對的立場，則給予 5 分，假如是 80% 則給予 4 分，假如有一黨未達則以較低者計算，假如有一黨不出席達 90% 以上，也算做集體的對立行動。依序計算，未達 50% 則給予零分。可參考，盛杏媛（2008：27）。

<sup>17</sup> 指標建構方式是分別在兩組問題上給一組分數並相加。在「台灣人／中國人認同」問題上，回答自己是「台灣人」者 2 分、「都是」1 分、「中國人」者 0 分。在「統獨」問題中，屬於「傾向獨立」者，給予 2 分、「維持現狀」者 1 分、「傾向統一」者 0 分。如此便會得到 4 種不同分數的類別 4 分和 3 分合稱為「高度台灣意識」，0 分和 1 分則稱為「低度台灣意識」，而 2 分則稱為「中度台灣意識」。

## （二）選舉制度對政黨分歧的強化

上述研究說明台灣源自族群認同差異的「認同分歧」已經成為影響選民和政治菁英政治行為的重要關鍵，因此可能取代侍從主義連結，而成為政治人物連結選民的重要策略。且在另一方面，選舉制度的變遷還可能扮演推波助瀾的效果。

相較於 SNTV 選制，2008 年後取而代之的 SMD 選舉制度確實較為不強調個人因素在選舉中的角色，但是也並不如封閉式的比例代表制更能迫使選民完全聚焦於政黨之上（Carey & Shugart, 1995）。過去在 SNTV 的選舉制度下，最受詬病的問題就是選舉制度容易引發黨內競爭，以及候選人只需鞏固特定票源即可當選的問題。而對於政治連結來說，最關鍵的影響是，這樣的制度誘因使得候選人傾向於攻擊同黨的參選人來輕易地獲取同黨的選票，而非花費更多成本攻擊他黨的政見來吸取意識型態位置更遠的選民。當制度誘因並不引導政治菁英針對敵對政黨進行競爭，這樣的制度也就不利於政黨政策綱領形成。並且，由於在大選區之下，候選人只需要取得少數選票即可當選，因此能更願意透過侍從主義的利益交換，或是極端議題的選舉方式來取得少部分人的支持，而不利於形成政黨綱領型的競爭（Grofman et al., 1999:14-16；Hsieh, 2009）。相反地，在單一的政治分歧為背景下，在 SMD 的選舉制度框架中，選民、政治菁英甚至政治獻金金主的策略選擇，都會因為不願意浪費（選票與資金）在沒有勝選希望的候選人身上，而更傾向於形成兩大黨之間的競爭（Hsieh, 2009）。盛杏媛（2008a: 17）對立法委員的訪談也發現，2008 年選舉制度的改變確實也對當時的立委們造成壓力。由於黨際的競爭取代 SNTV 下的黨內競爭，讓立委更加重視政黨的整體聲勢和政黨領袖的加持。這些研究似乎可以解釋目前雲林縣政黨版圖變遷的情況。

## （三）族群認同分歧的侷限

但是，當許多研究紛紛認為包含族群與國族歧異的認同分歧已經成為兩大政黨重要的政黨標籤，而新的選舉制度更有利於消弭個人選票，形成兩大政黨之間的競爭時，許多實證資料卻又指出這樣的影響其實相當有限。

同樣在立法委員的立法行為研究中，盛杏媛（*ibid.*:18-21）發現政黨標籤的影響力並非全面地影響立法委員。在政黨競爭的核心議題—統獨議題、政治改革議題，以及重要議程的設定權力之外，兩大政黨都願意讓立法委員適度的自由發揮餘地來滿足選區選民的需求。在該項研究中，立法院表決的資料也顯示，當法案的特質涉及利益分配（如預算案）與選區的利益分配，如社會福利議題或預算案，甚至環境保護議題等等事涉資源分配的議題時，國、民兩黨的凝聚力都不強。而 Batto（2009）的研究更顯示，選舉制度的改變確實消弭了候選人的「個人選票（personal vote）」，但是這種個人選票是屬於黨內的個人票，源自於 SNTV 選制下黨內競爭而出現在政黨的範圍內部的個人票。而相對於這類「黨內個人票（intra-party personal vote）」，沒有政黨歸屬的黨外個人選票（extra-party personal vote）並未減少。這兩項研究資料顯示，政黨之間在認同議題上的極化和新的 SMD 選舉制度對於政治人物和選民間新連結建構的影響極為有限，侍從主義的特殊利益交換仍然是政治人物的重要策略。但，為什麼會有如此矛盾而歧異的結果？

### 三、 如何取代？台灣族群政治分歧的侷限與侍從主義的持續

本文的第一個研究問題是：在雲林縣，侍從主義連結在政治分歧與新選舉制度的影響下發生什麼樣的變化？在上面的文獻回顧中，我已經說明現代化和制度因素在解釋派系變遷時的侷限，並且重新思考政治分歧的影響。而儘管認同分歧的政治已經形成台灣政黨競爭和選民政治行為的影響關鍵，但是實證資料的結果卻不支持這樣的連結形式已經完全取代了侍從連結。因此，接下來必須處理的問題是：在台灣持續近二十年的認同政治為何難以「取代」侍從主義？假如以族群

認同為基礎的認同政治分歧無法取代侍從主義連結，那麼新的認同政治連結是否與既有的連結型態並存？而這又可能形塑出什麼樣的政治結果？這些問題或許可以先從台灣族群認同分歧的獨特特質開始討論。

### （一）族群體系與社會分歧

根據 Horowitz（1985: 21-32）的研究，當政治民主化之後，族群分歧被顯的社會中的階級分歧很容易受到族群分歧的阻礙，甚至被族群分歧取代而消失。不過，這個說法還必須考慮到族群結構的差異。Horowitz 認為，在不同民主化前的族群間關係之下，民主化後的認同政治和階級之間的關係會有所不同。民主化前社會中的族群間關係，可以區分成「等級族群體系（ranked groups）」與「分立族群體系（unranked groups）」。這兩者之間的區分方式如下圖 2-2 所示，而關鍵的差異在於：在「等級族群體系」中，族群之間存在著明顯的等級區隔，B 族群在各個領域都屈從於 A 族群之下。居於從屬地位的 B 族群領袖可能是由優勢的 A 族群領袖所挑選，甚至會發展出各種用以確認不同族群間地位差異的信仰、意識型態與利益分配模式。這樣的族群關係可能是來自於被征服的背景，譬如南非、南菲律賓與南美洲；但在「分立族群體系」下，不同的族群之間沒有明確的上下從屬關係，A 群體在某一領域可能比 B 群體更為優勢，但是 B 群體在社會的另一領域中，可能比 A 群體具有優勢。由於 A、B 兩群體可能各有其不同的菁英，並且也會彼此競爭與流動，因此較不會產生自我設限與強化族群分野的制度和習俗。而這類型的族群體系多是因為他族移民，或是某一族群在特定區域中擴張而產生，譬如奈及利亞與斯里蘭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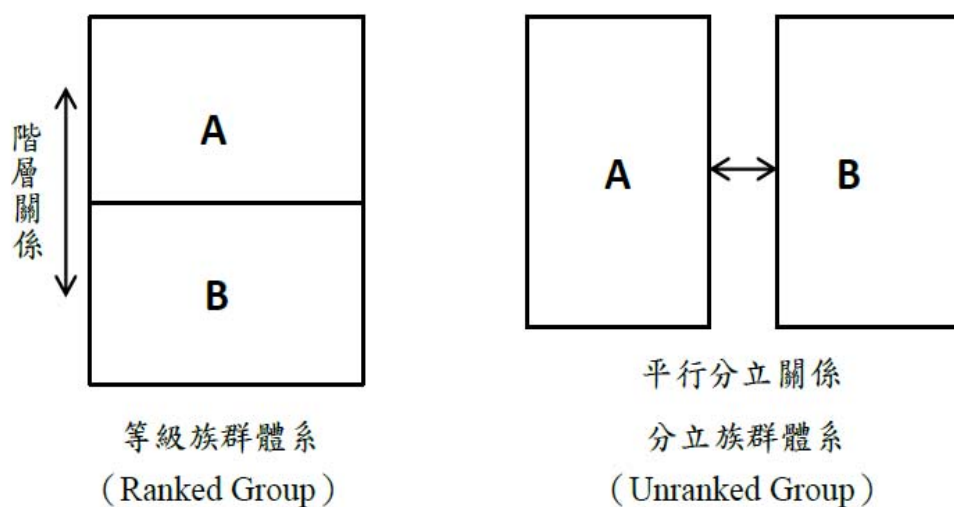


圖 2-2 「等級」與「分立」族群體系分類示意圖

資料來源：Horowitz, 1985: 22

Horowitz 認為，在等級化的族群體系中，族群的分界也就幾乎等同於階級的差異，因此他們的抗爭也和階級類似，常常訴諸於社會革命的形式，對社會結構做出劇烈的挑戰與調整。相反地，在分立的族群體系裡，由於彼此擁有各自的菁英階級，因此族群之間的抗爭更像是「主權國家間的外交」，彼此的政治菁英都希望透過選舉中的動員把對方排除在外，獨自掌握權力，而非進行激烈的社會改革以改變既有的分配體系，因此常常形成較為保守的政治模式：

“Unlike ranked groups,...It is not so much the politics of subordination that concerns them, though they are ever alert to threats of ethnic subordination, but rather the politics of inclusion and exclusion. These shadow society often speak in the idiom of nations,... When ethnic violence occurs, unranked groups usually aim not at social transformation, but at something approaching sovereign autonomy, the exclusion of parallel ethnic groups from power,... Ethnic conflict, however, impedes or obscures class conflict when ethnic groups are cross-class, as they are in unranked systems...Ethnic conflict in unranked systems usually goes hand in hand with conservative politics.”

(Horowitz, 1985: 31-32)

## （二）台灣的政治分歧：分立的族群體系與失落的分配政策

而對於台灣 80 年代後的族群認同政治模式，David Yang（2007: 509）的研究認為，台灣的族群分歧結構應該屬於「等級族群體系（ranked ethnic system）」。

由於國民黨屬於「征服型的移入政權」（conquering émigré regimes），不僅壓抑台灣本土的習俗，更將大陸的文化傳統提昇至國家文化的至高位置，並且利用教育和大眾傳播散佈這樣的等級差異，使得外省菁英凌駕於本土台灣人之上。但是，在這個前提下，台灣並沒有發展成階級政治分歧的競爭。Yang 認為，民進黨之所以沒有成為代表社會階級分歧的政黨，是因為在快速發展與流動下，台灣的階級基礎仍是以社會地位上升中的中產階級為多數，而且也必須親近具有民族意識的企業主。因此，民進黨策略性地選擇隱藏階級分歧而突出民族與統獨主義訴求，企圖利用極具彈性與包容力的民族「情感」來涵蓋階級政治中產生的「不平等」的情感，因此支持者大部分都是階級政治中，底層的勞動階級與小型自營業者。這使得兩個政黨都成為了全括性的跨階級政黨。

我認為 Yang 對台灣族群關係特質的看法是很明顯的謬誤，因為在 Horowitz 的定義中，等級族群體系的要件是「一個群體在各方面都從屬於另一個群體」。但在台灣，族群之間的權力關係卻更接近 Horowitz 例子中的馬來西亞：雙方各自在不同領域有其領導菁英存在。在政治領域，當 1987 年吳淑珍與許榮淑等人在立法院攻擊外省人在政治與專業官僚領域的絕對優勢時，也同時聲明「四十年來壟斷台灣政治權力的統治階層，僅是外省人中的絕對少數，其他 95% 以上的外省人並未分享任何利益...」（王甫昌，2008：117）。吳乃德（2002）的研究更指出，1994 年的調查資料顯示，在經濟領域中，絕大多數的本省人（含閩南與客家族群）並不認為本省人的經濟地位比外省人差，且調查資料也顯示兩個族群之間在交友與婚姻上並沒有顯著的差異。換言之，在當代的台灣社會中，並沒有顯著的族群間統屬關係。而且，在當前的政治分歧中更為重要的是中國的威脅與大中國民族認同所帶來的相互不信任，而非族群之間的隔離與壓迫（ibid.）。因

此，無論是族群間關係或是考量到族群分歧後來衍生成統獨、兩岸政策與國族認同的對立，台灣的情況應該更接近「分立族群體系」這個分類。

而根據 Horowitz 的看法，在分立族群體系中，由於族群的組成橫跨了不同的社會利益。因此當族群衝突出現時，往往就阻礙了階級政治的出現。而儘管 Yang (ibid.) 對於台灣的族群結構分類的看法是錯誤的，但他觀察到的現象仍相當準確。而且在分立族群體系的觀點下，可能更加合理與圓滿。他的研究資料說明了 1990 年代初期，民進黨的動員策略快速地抽離階級議題而轉型成一個全括性政黨 (catch-all party)<sup>18</sup>，是因為支持者群體橫跨了弱勢族群和小資產家，同時更將政黨的勝選策略目標鎖定在吸納中產階級的支持，而成為一個缺乏核心政策的政黨。這很明顯地凸顯了台灣的認同政治形成的困境：由於橫跨了不同社會利益的分歧，因此無法完全地代表任何特定的社會利益，也就缺乏具有特定立場、其政策位置具可區辨特性的具體分配性政策（也就是 position issue）。Hu & Chu (1992) 針對 90 年代初期立法委員選舉的研究也發現，兩個政黨的候選人儘管在政治改革與族群議題等政治性的主張上有明顯的差異，但在具體的政策主張則根本沒有差異。這些資料確實為 Horowitz 的理論觀點提供了佐證。

## 貳、 本文的理論主張

在這樣的觀點下，台灣當前的政治分歧具有跨階級的政治基礎。而在這個基礎之上進行的政黨競爭，由於不願失去其所訴求的群體中的部分選民支持，而在其他爭議性的政策上採取特定的立場。所以，當政治分配需要在不同的社會分

---

<sup>18</sup> Shelley Rigger (2001) 和黃德福 (1992) 也說明了民進黨作為全括性政黨的特色，但他們更傾向民進黨在政黨組織和政黨的議題策略上的困境。Rigger 認為國民黨本身就是一個全括性政黨，除了堅守中國統一目標外並沒有堅持的意識型態，因此迫使民進黨也必須採取全括性的政策。

歧中權衡，而不是一體均霑（譬如某些福利分配<sup>19</sup>）或是共識型議題（valence issue<sup>20</sup>）下的分配政策時，政黨也就難以提出一致的政策綱領來回應選民的利益需求。因此，即便政黨分歧在族群與國族認同等議題上趨於兩極，而選民也依此趨向兩極化，並且與政治人物在意識型態上相互連結、進行選票的交換。但這可能無法根本改變地方政治中，以特殊利益交換進行互動的侍從政治現象。因為，就如同 Yang 所說的：台灣的族群分歧採用的是「情感」上的連結。這跟立基於特殊利益交換的侍從主義，或是以普遍性利益交換而產生的綱領式連結都截然不同的。由於政治仍必須面對公共資源分配的問題，依賴情感交換的連結，可能需要額外的利益分配方式進行補充。

Kitschelt 將這類與「利益交換」無關的政治連結模式歸類於「非理性—心理依附式的政治連結」。在下圖 2-3 中，我呈現的是 Kitschelt（2007: 529）對於不同連結方式的分類。在左側是本文前半段主要討論的「理性」連結模式，選民和政治人物之間依據利益的計算來進行交換。而在右邊的連結模式中，選民和政治人物之間主要是依據心理層面的情感依附而產生，屬於非理性的代理與委託人關係。而在這三類的情感式連結關係中，Kitschelt 並未說明其利益分配的內涵。

---

<sup>19</sup> 當福利政策能夠有利而無害時，譬如 90 年代財政充裕時發放的老人年金，並不會產生問題。但目前的福利政策都遇到財政困難的問題。當國家重新把財源籌措的責任由國庫丟向國民（譬如健保、國民年金），就會讓政黨面臨分配政策上的困境。

<sup>20</sup> 共識性議題（valence issue）指的是政黨和社會中普遍已達成共識、沒有意見分歧，而只差別在誰能「做得更好」的議題，譬如基礎建設或是經濟議題（Stokes, 19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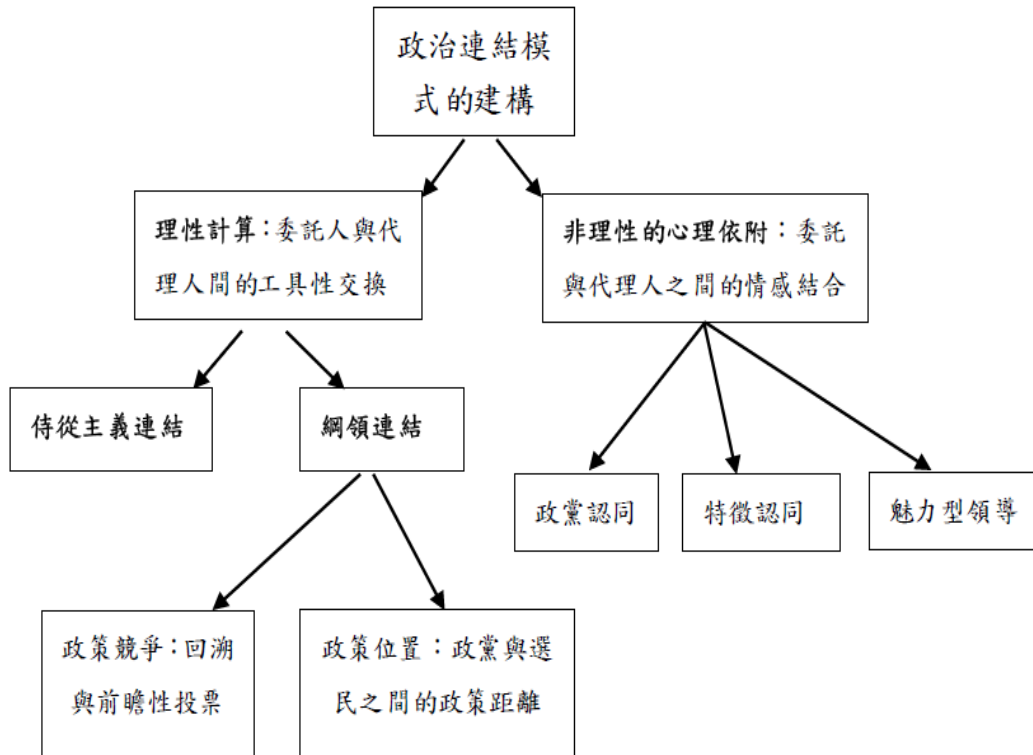


圖 2-3 民主政體中的政治連結模式

資料來源：Kitschelt, 2007: 529

我將當前政黨之間以認同情感為主的政治分歧，歸類為上述分類中的「政黨認同連結（party identification linkage）」。而儘管都指涉選民對政黨長期的「心理依附」，但這個名詞在本文中的使用和 Campbell（1980）所使用的「政黨認同」並不盡相同。這個差異主要來自台灣和美國「社會分歧」內涵的差異。本文使用的「政黨認同連結」更加強調台灣在族群認同分歧的基礎下，政黨和選民的連結主要來自族群、統獨與國族認同分歧所帶來的「心理情感」上的連結。並且，Kitschelt 所使用的「連結」更強調政治人物和選民之間的「選票（與利益或情感）交換的關係」。而之所以不將他歸類為「特徵認同」，是因為台灣族群認同的內涵依賴的並不是特定的社會特徵（譬如省籍），而是對於政治上，尤其是統一或獨立的政治信任和外交政策主張（吳乃德，2002）。因此，這和 Kitschelt 與 Wilkinson（2007）或 Chandra（2007）對於族群政治的理解都有相當大的不同。

台灣政治分歧的影響，很難從族群聚集所帶來的「社會網絡」或族群外觀等外在特徵來加以說明，而是以心理認同形成的連結關係。

然而，在缺乏利益交換內容的「政黨認同連結」中，可能會產生什麼樣的政治現象呢？立基於情感的政黨認同連結會成為單一的連結模式，還是與其他利益分配模式並存？假如產生並存的現象，那麼利益分配的關係是與政黨認同連結並列，或是作為政黨認同連結之下，與其「共生」的利益分配模式？對政黨的認同與利益分配之間是否有相互影響的關係？Kitschelt 在分類中並沒有提供進一步的說明，因此我將試圖整合目前的理論論述，提出本文在這個部分的理論主張。

我認為，由於政黨認同的連結關係缺乏利益分配的內涵，而且台灣的分歧特質又阻礙具有區辨性的普遍性分配政策形成，因此勢必需要其他利益交換模式來做為補充。而特殊利益的交換模式不僅是既存的分配制度，前文也提到 Landé (1977: xv-xviii) 對於侍從主義的看法，他將侍從主義視為一種重疊在正式制度上的附加物 (addendum)。因為制度關係無法滿足某些需求，而必須透過某種更為彈性、選擇性甚至情感性的契約才能滿足，譬如某些在 (政治與經濟) 市場上無法取得的好處。因此特殊利益交換與侍從主義很可能是「補充」的分配模式。此外，政治人物也很有可能在已經有共識的分配政策 (valence issue) 上，競逐彼此的執行能力 (Kitschelt & Wilkinson, 2007: 11)。因此，我認為，在族群認同連結阻礙位置性議題與政策的情況下，特殊利益或是共識性政策的分配方式，很可能會存在於政黨認同連結之下，作為利益分配時的補充。在此，主要的政黨認同連結與特殊利益為內容的資源分配模式是「共生」的，特殊利益的分配可以彌補政黨認同連結下利益分配的功能。

而在另一方面，由於 SMD 選制要求政治人物必須累積選區中過半的選票才能當選。因此，侍從主義和共識性政策也可能用來作為政黨認同連結失去影響力時的補充，用以連結不具政黨認同的選民。然而，由於共識性政策競逐的並不是政策內容，而是執行能力的可信度 (credibility)。因此當選民對兩大政黨都沒有信任感時，個別利益的輸送或許就會變得格外重要。政黨認同連結因此和侍從

主義連結有著「並存」的關係，在政黨認同連結所不能及的選民身上，以侍從主義的方式交換其選票。

最後，在政黨認同的心理依附式連結下，政治人物之間的關係也很有可能受到侍從主義的影響。Kitschelt 與 Wilkinson (2007: 9) 認為，在政黨綱領式的連結中，政黨領袖為了塑造一致的政策綱領並取信於選民，必須強化政黨的組織和黨紀來維繫集體行動。但假如政黨並不需要建構一致的政策綱領，只在特定的認同議題上回應選民，而放任政黨成員在分配政策上根據選區利益自由選擇 (盛杏媛, 2008a)，那麼建構更為制度化的政黨組織與黨紀的誘因就不存在。而假如政治人物又必須回應選民對於特殊利益的需求，那麼政治人物之間的關係就相當有可能成為侍從主義模式下，「特殊利益—政治支持」的交換關係。

下表 2-1 當中，我將上述的看法做簡要的歸納整理。在左側的「理性計算連結模式」中，政治人物和選民之間是以利益交換建立彼此的連結。因此，資源分配的方式和政治連結方式相對應。然而，在表右側的政黨認同連結下，台灣的政治分歧阻礙普遍性政策的產生，因此偏向使用個別分配或是以共識性政策的方式分配資源與利益。在侍從主義連結中，競逐中間選民必須花費更多資源；但在政策綱領下，政黨必須在政策上做退讓，或是強化自己執行政策的可信度以吸引更多選民支持。但在政黨認同下，政治人物可能嘗試使用特殊利益試圖吸引選民，也可能強調共識性政策的執行力以爭取選民認同，認同情感也可能會是方法之一，但是影響力應該是比較弱的。而在以特殊利益換取支持下，政治人物都會有誘因監督個別選民是否履行交換契約。但在普遍利益的分配下，政策的受惠者很難掌握，因此政治人物並不會監督選民，而是強化自己的組織和政策。而在政治人物的關係上，由於政治人物需要特殊利益進行分配，因此在侍從連結和台灣的政黨認同連結下，都很可能會出現侍從主義式的連結關係，或是較弱的黨內制度。政策綱領連結中的政治人物，則由於必須透過一致的政策實踐與集體行動來換取選民支持，因此會發展出更為制度化的政黨組織運作，政治人物之間的關係因此是更為制度化的。

在這樣的情況下，對於政治人物提出的政策，只有政策綱領連結因為選民會直接訴諸於政策實踐結果，因此具有較高的課責效果。在侍從主義下，選民只針對本身所得的特殊利益的分配與否進行課責，因此並不在乎政策的效果，課責效果因此極弱。而在政黨認同連結中，當議題牽涉到核心的族群認同議題時，會因為這是選民和政治人物交換的目標而出現相當高的課責性。但在具有普遍性的政策上，由於政策和政治連結的情感交換與資源分配的特殊利益都不相關，因此會出現較弱的課責性。

特徵\連結類型	理性計算		情感
	侍從主義	政策綱領	
主要連結方式	侍從主義	政策綱領	政黨認同
連結交換內容	特殊利益	普遍利益	族群認同情感
資源分配方式	特殊利益 個別分配	普遍性政策 (共識/位置)	特殊利益個別分配/ 普遍的共識型政策
競逐中間選民	特殊利益	政策利益退讓	特殊利益/共識型政 策利益/(認同情感)
監督選民	需要	不需要	不一定需要 (視交換內容)
政治人物關係	侍從關係	政黨組織內制 制度化關係	侍從關係/ 較弱的制度化關係
政策課責	極弱	強	較弱(視政策而定)

表 2-1 政治連結類型特徵分類表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這些看法可能有助於解釋我在文獻討論部分提出的重要的問題，並且能夠根據這些論點提出本文對雲林縣政治人物與選民連結方式的初步假設。據此，在下

一部分中，我將以這個論述為基礎，提出我對於雲林縣政治連結現況的研究設計。

## 參、 研究設計

為了驗證上述論證是否正確，在研究設計上，我首先透過「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 (TEDS)」在 2005 年縣長選舉、2009 年雲林縣第一選區立委補選，以及 2009 年縣長選舉後所進行的調查資料<sup>21</sup>中的「政黨偏好」、「族群認同」題組，來檢視雲林縣選民對於政黨競爭與主要政治分歧的態度，以觀察雲林縣選民在現代化程度不高之下是否也受到政黨政治的影響。在調查資料中顯示，對於兩大政黨有特定偏好的雲林縣選民有逐年增加的趨勢。而且他們在認同分歧上的態度越來越為明確，顯示長期的政黨競爭確實有其效果。而民進黨的選民又特別明顯地表現出在族群議題上的立場，並且表現出更穩定的投票行為。這顯示現代化因素並無法完整地解釋雲林縣出現的政治現象。而訪談資料則可以進一步針對政治人物的連結策略部分做補充，說明更完整的連結關係內涵。

在對地方政治菁英的訪談中，訪談的重點放在政黨之間主要政治分歧與相關議題，對於政治人物在平時與選舉中聯繫與動員選民時產生的效果。我企圖將這部分的資料來和選民的調查資料做對應，以檢證選民的態度變化中，政治人物是否也相應地採取了不同的連結策略。

---

<sup>21</sup> 本文使用的資料全部係採自「2005 年至 2008 年『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四年期研究規劃(I)：民國九十四年縣市長選舉大型面訪案」(TEDS2005M) (NSC 94-2420-H004-008-SSS)，與「2009 年雲林縣立委補選暨雲林縣三合一選舉電訪案」TEDS 2009L\_BE&M-T，以及「2009 年至 2012 年『選舉與民主化調查』三年期研究規劃 (I)：2009 年縣市長選舉面訪案」TEDS2009M (NSC 98-2420-H-004-011)。「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TEDS) 多年期計畫總召集人為國立政治大學黃紀教授，TEDS2005M 與 TEDS2009M 為針對 2005 年與 2009 年縣市長、縣市議員、鄉鎮市長三合一選舉執行之年度計畫，計畫主持人為黃紀教授；TEDS 2009L\_BE&M-T 為針對 2009 年雲林第二選區立委補選與雲林縣三合一選舉執行之電話訪問，計畫主持人為黃紀教授；詳細資料請參閱 TEDS 網頁：<http://www.tedsnet.org>。作者感謝上述機構及人員提供資料協助，惟本文之內容概由作者自行負責。

然而，理解政治連結內涵的重要關鍵在於政治人物和選民之間的中介人物——「樁腳」。在雲林縣，由於普遍的大眾媒體並不一定能穿透農村社會，因此多數候選人都採取了「樁腳」來進行政治動員。政治人物和樁腳之間的關係，以及樁腳和選民之間的關係成為重要的訪談內容。在菁英訪談部分，我主要的問題架構如下：

- (1) 政黨對您的選舉有所幫助嗎？政黨如何影響您經營選民？
- (2) 政黨表現和主要的政治議題在您進行動員時是否具有影響力？您如何處理這些議題？
- (3) 您如何經營選民？樁腳的維繫是重要的嗎？樁腳如何和選民接觸？

而由於民進黨選民在調查資料和訪談資料中都更受政黨的「理念」（政黨認同連結）影響，因此為了檢證我提出的主要論證：「台灣的族群分歧的影響」，民進黨政治人物的訪談資料是特別值得關注的部份。我將透過資料逐一審視在上述理論與主要論證部分提出的三個觀察面向：第一，假如選民和政治人物之間是以認同於政黨在族群議題上的立場進行交換的話，那麼他們之間是否還需要進一步的利益分配？而利益分配模式是普遍性的政策還是特殊利益？假如是普遍政策的話，那麼強調的是位置性的政策或是共識政策的執行能力？其次，第二個觀察面向注重政治人物吸引中間選民的策略為何。在政黨綱領的政治連結下，政治人物和政黨傾向於在政策上讓步。但在政黨認同連結下，政治人物的策略很有可能交替使用侍從主義、政策執行能力，或是情感認同的方式。最後，政治人物之間的關係是建立在政黨組織的制度上，還是建立在侍從主義的利益—政治支持的交換上呢？這三個面向會是第四章資料分析中觀察的重點，並且能夠佐證本文提出的主要論證。

訪談代號	黨籍	受訪者身分	受訪日期
YLN01	無	雲林農田水利會某單位 主管	2009 / 05 / 08
YLD02	民	雲林縣立法委員 (含前立委)	2009 / 05 / 08
YLN03	無	雲林地方記者	2009 / 08 / 07
YLT04	無	雲林縣立法委員 (含前立委)	2009 / 08 / 23
YLD05	民	雲林縣立法委員 (含前立委)	2009 / 08 / 24
YLK06	國	雲林縣立法委員 (含前立委)	2009 / 10 / 06
YLD07	民	雲林縣立法委員 (含前立委)	2009 / 10 / 21
YLD08	民	雲林縣縣議員 (含前議員)	2010 / 04 / 20
YLK09	國	雲林縣農會幹部	2010 / 04 / 20
YLN10	無	雲林縣縣議員 (含前議員)	2010 / 07 / 19
YLD11	民	雲林縣縣議員 (含前議員)	2010 / 07 / 19
YLD12	民	民進黨雲林縣黨部幹部 (含前黨部幹部)	2010 / 07 / 21
YLN13	無	(傾國民黨) 樁腳 民間某協會主席	2010 / 07 / 25
YLD14	民	雲林縣政府局處首長	2010 / 07 / 25
YLN15	無	派系顧問	2010 / 08 / 12
YLD16	民	雲林縣立法委員 (含前立委)	2010 / 08 / 18

YLD17	民	民進黨雲林縣黨部幹部 (含前黨部幹部)	2010 / 08 / 18
YLK18	國	雲林縣立法委員 (含前立委)	2010 / 08 / 27
YLD19	民	民進黨某鄉鎮樁腳	2010 / 08 / 30
YLK20	國	國民黨雲林縣黨部主委 (含前主委)	2010 / 09 / 02
YLK21	國	國民黨雲林縣黨部黨工 (含前黨工)	2010 / 09 / 02
YLD22	民	雲林縣政府局處首長	2010 / 09 / 02
YLD23	民	雲林縣縣議員 (含前議員)	2010 / 09 / 27

表 2-2 雲林縣受訪政治菁英資料與代號對照表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 第三章 雲林縣的地方政治變遷

在第二章中，我已經就本文的主要理論做出說明。在本文中，我要探尋的首要議題是雲林縣當前的政治連結模式，以及既有的侍從主義連結在以族群認同為基礎的政黨競爭和 SMD 選制對兩黨制的強化下，可能如何產生新的政治連結樣貌。在 2000 年以前，國民黨與地方派系是雲林縣主要的政治勢力。而在 2005 年之後，雲林縣的選民不僅在總統選舉中轉向支持民進黨，也讓蘇治芬成為民進黨的第一位縣長，立委和縣長選舉的得票率也逐漸和總統選舉接近。但在這個過程中，不僅政黨競爭是關鍵的影響因素，民進黨對地方菁英的招降納叛，以及國民黨派系之間的競爭也是重要因素。

因此，在第三章中，我寫作的目標首先是對雲林縣過去的派系發展做基本的交代，說明目前派系間競爭的背景。在第二部分，我將開始說明政黨競爭的激化，以及民進黨崛起過程中吸收地方派系政治菁英的策略。最後，2005 年蘇治芬成為縣長之後，主要的焦點在於國民黨內部競爭的激烈化，以及民進黨在掌握地方資源之後面對的策略難題。而這和本文的主軸密切相關：民進黨必須不斷擴大自己的支持基礎，以在 SMD 選制下繼續維繫選舉的成果。但是在資源的分配上，由於必須同時滿足內部與新加入的盟友的利益需求，因此也就陷入了分配上的困境。在下一章，我將透過訪談資料說明，這些利益需求與分配，仍然是瞄準於交換支持的特殊利益。因此，即便政黨競爭已經大幅改變了選舉競爭的結果，但雲林縣的地方政治仍無法擺脫侍從主義的連結模式。

## 壹、 雲林縣派系與侍從主義政治的成形

在第二章中，我們已經將「派系」定義為依據侍從主義的雙元連結關係，而在資源不對等的人之間，以垂直連結的方式建構出的金字塔型非正式組織。而在雲林縣，地方基層的鄉鎮級派系多源自於 1951 年地方自治開始進行農會、鄉鎮長選舉時，地方上以血緣、地緣網絡形成聯盟關係而彼此爭奪的情形，因此開始形成地方的鄉鎮派系雛形（蘇俊豪，2004）。這樣的背景相當類似於台中縣全縣級紅、黑兩大派系形成的背景。然而，這些鄉鎮派系的競爭並沒有很快地形成全縣的派系領導人。雲林縣的縣長選舉，也沒有建立起全縣性的侍從主義垂直結盟關係。雲林縣在全縣層級上建立的派系一直要到 1973 年，由已經在雲林縣經營已久的在地人林恒生連任兩屆縣長之後才開始發展，並且在下屆（第七屆）縣長許文志出現後，才開始出現派系間的對立。而在此之前，雲林縣掌握最多資源，最有可能形成全縣性派系的縣長職位一直受到國民黨威權政府的掌控：擔任第一、二屆縣長吳景徽在擔任縣長前曾經任五年的斗六鎮長，他雖然具有深厚的地方基礎，但在第二任之後卻因為土庫大橋弊案被判刑，並從此不再踏入政壇，斷絕了原有的人脈基礎而沒有形成派系。第三、四屆縣長林金生為嘉義新港人，曾任首屆的嘉義縣長，但在連任失利後轉任雲林縣國民黨部主委，並且在任內刻意地栽培後來成為林派大老的林恒生（丁彥致，1994）。

然而，儘管林恒生在林金生縣長的刻意培養下，歷經縣府機要秘書、縣議會議長，已經具有全縣性的人際網絡與競選縣長的實力。但在 1968 年國民黨的「派系替代」策略為了削弱地方實力，便推出了地方的黨工廖禎祥參選，再度阻斷了地方派系的形成（陳明通，2001：182）。然而，爭取提名失敗的林恆生卻在地方繼續厚植實力，不僅擔任議長也積極交往地方上重要人士。因此，在 1973 年得到國民黨提名，並且順利擔任兩屆縣長後，已經透過縣長所具有的公共資源和地方上重要人物發展出即為緊密的網絡關係。此時的主要聯盟者如擔任過水利會

代表、縣議員，並於 1973 年起擔任省議員的黃鎮岳；1977 年受林恒生支持而當選省議員的陳錫章；培養為接班人的農田水利會會長陳新登；縣農會總幹事鄭次雄等人（蘇俊豪，2004：146）。

因此，儘管在 1981 年國民黨再次使用雙派系主義的策略（若林正丈，2009：141），透過提名沒有地方勢力的黨工許文志參選企圖壓制林恒生在雲林縣的勢力。但是林恒生在縣長任內累積的資源和人脈已經足以支持派系的發展，並且在之後持續推出自己聯盟內部的參選人，和許文志縣長形成的許派、以及廖泉裕形成的廖派等等競逐縣長寶座。但此後只要每次有人能夠連任兩次縣長，那麼就能依賴縣長的資源建構起自己的人脈和聯盟。因此，此後雲林縣派系此後的特色之一，正在於沒有發展出一個穩定的全縣型地方派系（田弘茂，1989：63），而是以掌握政經大權的縣長（如此後的林派、許派、廖派、張派）或長期的立委職位為核心，發展出的人際與政經網絡而建構成雲林縣的全縣性派系組織。

## 貳、 民主化後的地方政治演變（2001 年以前）

### 一、 國民黨的林派、蘇派與張派

由於縣長職務往往代表了派系的興起，下表 3-1 列出雲林縣的縣長資料，以作為以下雲林縣地方政治概述的主要時間軸。如上所述，在擔任過八年縣長之後，以林恒生為首的林派勢力已經發展出完整的派系網絡，這個網絡當中相互串連的包括以前縣長林恒生為中心連結起的民選政治人物：省議員黃鎮岳（1972-1993 在職）、陳錫章（1977-1989 在職），立法委員蕭瑞徵（農民團體代表），國大代表林俊慧、蕭生財。以及縣內以農、漁、水利會為主的動員組織，譬如：水利會會長陳新登（1981-1990 在職）、縣農會總幹事鄭次雄等人。

然而，儘管以林恒生為首的林派因為縣長職位而形成相當大的派系網絡。但在爭取縣長職位方面，卻一直受限於國民黨的提名策略以及派系之間的競爭，直到 1997 年林派才再度培植出蘇文雄擔任縣長。在這段時間中，林派分別培養出兩位之後的派系領導人物。其中之一是出身自農會體系的前省議員與縣長蘇文雄。此外，1990 年縣議長選舉時，陳錫章支持當時較偏向許派<sup>22</sup>的張榮味，而並未支持林派內部的林明義，使得林明義倒向縣長廖泉裕，而張榮味也成為林派支持的政治人物。而在同年的水利會長選舉，張榮味則力挺林派的張輝元（1990-2010 在職），因此深化了張榮味與林派以及與張輝元的聯盟關係（蘇俊豪，2004：155）。張榮味在這個時期發展出的結盟關係，也成為之後形成獨立派系的基礎。

年度	1949	1953	1957	1961	1965	1969	1973	1977
屆次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縣長	吳景徽	吳景徽	林金生	林金生	廖禎祥	廖禎祥	林恒生	林恒生
黨籍	國民黨	國民黨	國民黨	國民黨	國民黨	國民黨	國民黨	國民黨
派系屬性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林派	林派
年度	1981	1985	1989	1993	1997	2001	2005	2009
屆次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縣長	許文志	許文志	廖泉裕	廖泉裕	蘇文雄	張榮味	蘇治芬	蘇治芬
黨籍	國民黨	國民黨	國民黨	國民黨	國民黨	國民黨	民進黨	民進黨
派系屬性	許派	許派	廖派	廖派	林派	張派	無	無

表 3-1 雲林縣各屆縣長列表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sup>22</sup> 在作者的訪談中，某位具有派系背景的前立委表示張榮味原本在北部發展，是由許文志帶回來雲林參選議員的。但是在蘇俊豪（2004：155）的資料中，張榮味被認為不具任何派系色彩。

然而，到了 1992 年第二屆立委選舉時，不僅林明義已經和廖泉裕縣長結盟參選立委。剛剛因林派支持而當選的議長張榮味與水利會長張輝元也轉向支持許派的許舒博，因而使得爭取連任的林派吳賢二因此落選。再加上 1993 年縣長選舉之後，參選的林派元老陳錫章宣布退出政壇，因此林派到了 90 年代初期，實際的影響力已經由時任省議員的蘇文雄（主要依賴農會系統）主導。此外，縣議長張榮味與水利會張輝元，並結合許派曾蔡美佐等主要是山線的勢力，也和蘇文雄相互配合，和當時的縣長廖泉裕（廖派）相抗衡（蘇俊豪，2004：159）。

但是，到了 1997 年第十三屆縣長選舉，張榮味為了爭取縣長職務，不惜脫黨和獲得國民黨與各派系支持的同派蘇文雄對決。至此，林派正式分裂為縣長蘇文雄的蘇派，以及支持張榮味的張派。在下圖 3-1 中，我利用圖表簡單地畫出雲林縣林派演變的過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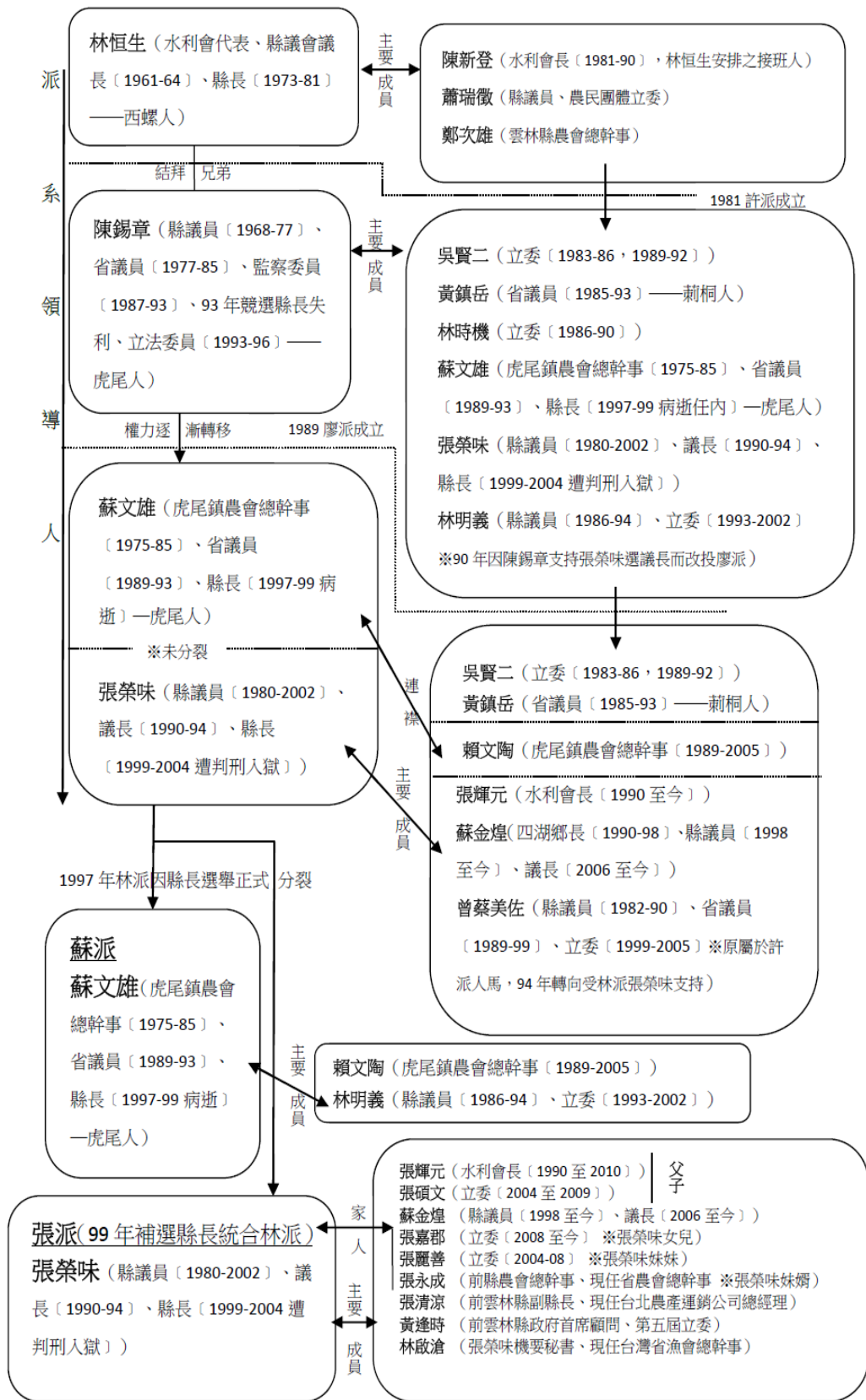


圖 3-1 雲林縣林派主要成員與演變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1997年第十三屆縣長的選舉，蘇文雄與張榮味分裂，分別投入最後的選舉。蘇文雄獲得國民黨的支持與背書，甚至取得其他許派、廖派與廖福本立委的支持。但是選舉結果張榮味只輸給蘇文雄約三千票，兩人合計取得二十四萬七千多票，而此時代表民進黨的廖大林只取得約十萬票。蘇文雄擔任縣長後，雖然也快速地吸納了其他勢力，但是卻在1999年八月因病逝於任內。這讓張榮味在挑戰縣長失敗又失去縣議長的資源後能夠重新東山再起。

在1999年底的縣長補選，張榮味就以無黨籍的身分出來參選，和國民黨徵召的縣黨部主委張正雄與民進黨林中禮競逐縣長。最後，以十三萬七千餘票擊敗民進黨的十二萬九千餘票，和國民黨的九萬六千多票，才順利當選雲林縣長。到了2001年縣長選舉，張榮味在國民黨支持下不僅以二十萬票大勝，更在立委選舉中獨力支持三位候選人當選。並且透過水利會長張輝元掌握水利會組織、妹婿張永成則為省農會總幹事(前雲林縣農會總幹事)，縣議會則有議長蘇金煌支持。因此，在1999年張榮味擔任縣長之後，雲林縣的國民黨中就形成一派超大的局面。而另一派尚存的影響勢力，則是由第九、十兩屆縣長許文志，及其子許舒博(目前仍為國民黨不分區立委)所經營的「許派」。兩派相互爭奪縣長與立委提名，以及民進黨的競爭與招降納叛的影響，成為之後雲林縣派系變遷的主軸。

## 二、國民黨的許派與廖派

上文已經提到雲林縣派系成立的關鍵在獲得縣長的職位與資源。而在台灣民主化之前，國民黨的提名與支持是當選的首要條件，其次才是派系本身的實力。因此，在1981年第九屆縣長選舉時，儘管連任兩屆的縣長推出自己培養出的候選人陳新登(當時的水利會長)準備參選。但是國民黨或許在不願讓單一派系獨大、完全掌控地方的「雙派系主義」下，提名了由黨內救國團、地方黨部出身，當時擔任省黨部書記長的許文志。並且在當時的省黨部主委宋時選、省議員廖泉

裕支持下，擊敗林恒生支持的陳新登（蘇俊豪，2004：148）。而在八年的縣長任期之內，沒有深厚地方基礎的許文志也建立起自己的勢力。在下圖 3-2 中可以看到當時許文志建立起的派系聯盟，他分別輔助廖福本與廖泉裕當選 1983 年的第五次增額立委以及 1985 年第八屆省議員。並且，也在 1989 年支持曾蔡美佐當選第九屆省議員（1989-1999）。然而，許文志本人在縣長任期結束後即進入省政府擔任建設廳長，並未繼續留在雲林縣培養自己的派系和社會網絡。因此，許派在無法繼續爭取縣長之下，也僅維持著和地方某些政治人物的友好關係，並且由許文志的兒子許舒博在連任三、四、五兩屆（1995-2005）立委以及擔任目前的不分區立委下，繼續維繫影響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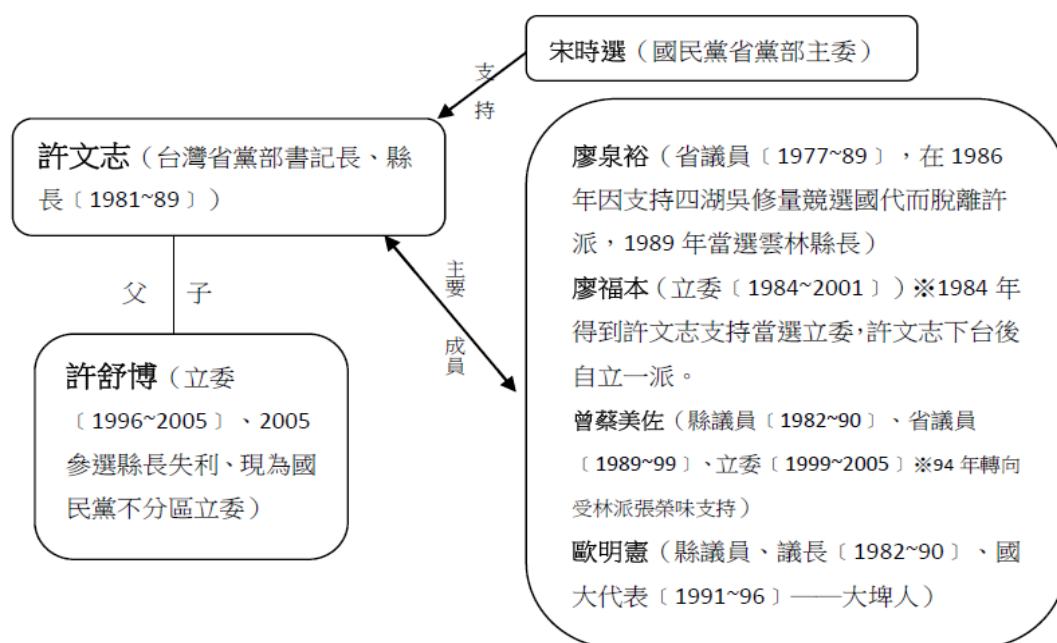


圖 3-2 雲林縣許派關係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而在許文志兩任縣長結束後，取得國民黨提名擔任縣長的是與林派領導人林恒生同樣出身於西螺鎮的廖泉裕。然而，廖泉裕在剛開始在鎮農會和鎮長選舉競選時，卻不被當時擔任縣長的林恒生所支持，因此開始在全縣各地結合地方勢力

參選，他在斗南地區與 39 位地方人士結拜被稱為「39 兄弟會」（蘇俊豪，2004：72），此外也和後來的縣長許文志結合來協助自己參選。然而，在 1989 年縣長選舉前，廖泉裕卻也因為 1986 年的國大增額選舉時強力支持四湖地區的結拜勢力吳修量（當時屬於林派）而和許派分裂。因此，到了國民黨縣長提名時，國民黨內的許派與林派都不願意支持廖泉裕。但是，廖泉裕藉著自己原本在縣內佈置的人脈，以及在提名過程中林、許兩派提名過程中的問題<sup>23</sup>，因此獲得國民黨提名當選縣長。並且憑藉著縣長的資源扶持其他選舉的候選人，成為具有相當實力的廖派。

然而，1998 年的立委選舉，由於凍省的因素導致立委名額驟然開放，因此國民黨下各派系也都面臨了內部提名競爭的問題（蘇俊豪，2004：167；王金壽，2007）。廖派的林明義因為廖泉裕支持從省議員轉戰立委的侯慧仙（1998-2001），因此尋求縣長蘇文雄支持而造成分裂。到了 2001 年立委選舉時，派系內部推選的侯慧仙不僅落選，隔年廖泉裕本人更因為竊佔罪被判刑逃亡中國大陸，並於 2008 年病逝。廖派中的勢力從此僅剩下其妻子經營的嘉禾有線電視具有影響力，較少實質的選舉運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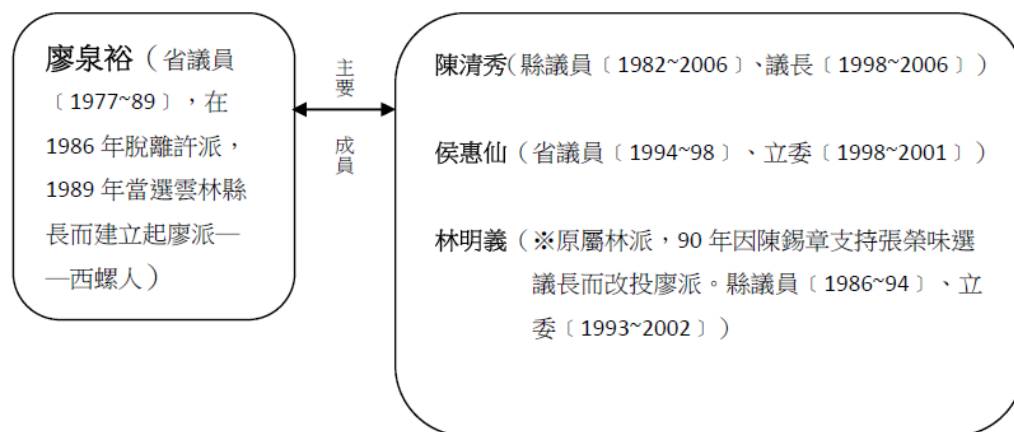


圖 3-3 雲林縣廖派關係圖

<sup>23</sup> 1989 年的縣長提名時，許文志縣長原欲提名曾任縣議員（當時已為許文志縣府主祕），且屬於林派的李學聰。然而，這個安排卻在林派內部造成爭議，而在最後關頭才由立委林時機上陣。最後，導致國民黨選擇了廖泉裕出來代表參選，並且在李登輝前總統的勸說下，由兩派共同輔選廖泉裕。

因此，到了 2000 年之後，雲林縣內的主要派系影響力只剩下以張榮味等人為首的張派，透過與水利會長張輝元長期的聯盟，以及擔任議長、縣長期間累積的侍從主義聯盟基礎，和仍擔任立委的許派許舒博成為主要的派系政治勢力。

### 三、 民進黨的地方勢力

而在民進黨方面，雲林縣的「黨外」勢力可以追溯到台灣光復初期由大陸回台發展的兩位具有「半山」<sup>24</sup>身分的政治人物，口湖鄉的李萬居以及荊桐鄉的林頂立。儘管這兩位政治人物在國民政府遷臺之後，先後遭到國民黨壓制或整肅（陳明通，1995：136），但是李萬居仍在四湖地方培養蘇東啟等人進入縣議會。其後，蘇東啟從 1953 到 1960 年連任四屆縣議員，並且在 1960 年參選縣長，甚至以十萬多票的高票敗給林金生。但是，隔年蘇東啟就因為參與「台獨叛亂」案被捕，判處無期徒刑後不再進入政壇，其妻子蘇洪月嬌則繼續參與地方政治。蘇洪月嬌先是和蘇東啟一樣參選縣議員（1964-1973），其後連任四屆省議員（1977-1993）並在 1993 年代表民進黨與廖泉裕競選縣長（以八千票落選）。而在 1995 年脫黨參選立委失敗後，將家族在北港地區培養的政治力量轉移給繼續參政的女兒蘇治洋與蘇治芬。

而除了北港的蘇家之外，在 1986 年民進黨成立之前，雲林縣地方上仍有東勢望族出身的黃麻（1964 年任東勢鄉長、1955-1977 年任縣議員，1977 與 1981 年競選縣長，與 1980、1986 年兩次參選國代失利），以及麥寮鄉出身的許哲男（1980 年當選增額立委）等人。但是，這些黨外的勢力雖然都可區分為非屬於國民黨的政治勢力，但並未整合成單一一股勢力，而是相互衝突的個別山頭（蘇

---

<sup>24</sup> 「半山」指的是台灣出身，但是曾到過大陸發展，因此和國民黨內政治人物交好的台籍菁英。

俊豪，2004：182）。並且，雲林縣黨外以傳統家族與社會網絡維繫的政治勢力，除了蘇家以外都並未能延續到解嚴之後的時期。

民進黨成立之後，在雲林縣出現的主要的政治人物有蘇氏家族的蘇洪月嬌、蘇治洋與蘇治芬，以及朱高正、廖大林、林國華父女與林樹山等人，且每個政治人物都有各自不同的競選與經營方式。朱高正是雲林縣北港鎮人，在1986年第一次的立委增額選舉中，就獨特地採用在各鄉鎮演講的方式獲得將近三萬票當選立法委員。三年後的立委選舉，他甚至取得十二萬八千餘票，是當時總票數的一半。但是在1994年改代表新黨參選省長落敗後，就不再涉入政壇（蘇俊豪，2004：185）。而廖大林則出身西螺地區，並且在1989年民進黨剛成立之時就代表民進黨參選縣長。而後雖然連續當選第二與第三屆立委（1992-1998），但在2001年參選失利後也已經淡出政壇。而林樹山在2004年當選立委後，也受限於提名而無法繼續競選連任。目前在虎尾地區經營電台和個人服務處，進行免費的法律諮詢服務等等工作。林國華出身古坑鄉，在1988年因指揮「五二〇」農民大遊行遭判刑出獄之後，連續擔任了三屆全國農權會的會長，並且在1998年起連續當選兩屆的立委，其女兒林慧如則擔任縣議員。在2004年立委選舉落選之後，林國華積極爭取同年的縣長提名，但在初選失利之後轉任農委會副主委。而在政黨輪替後，則回到古坑故鄉，目前已很少獻身政治場合。而林慧如本人也在擔任四屆縣議員之後，也回到古坑鄉連續擔任了兩屆鄉長（2004年至今），但也沒有再積極參與職務以外的政治活動。

因此，到了2005年之後，民進黨比較早期的政治人物就剩下蘇治芬具有影響力。蘇氏家族在雲林縣被稱為「蘇家班」，其經營模式較為偏向以家族的人脈發展自己的支持者網絡。因此，也屢次脫黨參選，引發黨內爭議。而在蘇洪月嬌長女蘇治洋在1998年立委選舉脫黨參選落敗，以及2002年北港鎮長選舉失利之後，家族內只剩下蘇治芬從事政治活動。蘇治芬在2001年當選立委，並且2004年在放棄連任之後積極準備縣長選舉。在國民黨內派系之間的競爭下，蘇治芬在2005年的縣長選舉，靠著當時不斷擴大的民進黨支持者，以及張派的「中立」甚至是

「暗助」，當選民進黨在雲林縣的首任縣長（王良新，2005：163-167），並且持續連任至今。

目前雲林縣的主要地方政治勢力是國民黨內部的張派、許派，以及民進黨與其縣長蘇治芬等三個主要行為者。在這三股勢力中，國民黨內部的派系積極爭取縣長的提名與勝選，以期擴張自己的勢力而相互競爭。在民進黨方面，在2000年總統大選之後，民進黨就以「招降納叛」的方式，透過吸納地方政治人物來積極地擴大自己的支持基礎。民進黨的策略在蘇治芬擔任縣長之後，由於縣長的資源而更據影響力，甚至成為2009年張派內部分裂的主要因素。然而，民進黨和蘇治芬擴大支持基礎的策略是建立在資源分配的基礎上，資源分配的問題也引起黨內的不滿。因此，在2000年之後，政黨競爭的興起，以及在這個背景之下國民黨內部的分裂和民進黨的策略運用是雲林縣政治現況發展的兩大主軸。這也是本文問題意識的來源：當政黨競爭快速地改變了地方政治版圖，不同的政治連結策略是否能取代既有的侍從主義？在下一個部分，我將透過既有的研究文獻和新聞報導，以上述兩個軸線為核心說明2000年後雲林縣的地方政治發展。

### 參、 雲林縣地方政治現況

從上文中可以看到雲林縣地方政治在 2000 年以前主要的發展趨勢。在這段時間中，雲林縣的政治演變基本上就等於是國民黨的派系演變，政黨政治並非主軸。在下表 3-2 當中，我列出 1990-2000 年立委與縣長各次選舉中，民進黨（以及民進黨脫黨參選者）在雲林縣的得票率。在表 3-2 中，可以清楚地看到 2000 年以前，民進黨在各次選舉中的得票大多在三成五以下。只有在 1993 年的縣長選舉中，因為連任的廖泉裕面對黨內其他派系內鬥的問題，使得民進黨的蘇洪月

嬌取得前所未有的 14 萬票高票。因此，在 2000 年以前，雲林縣的派系競爭幾乎是地方政治中唯一的主軸。

年度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選舉	第二屆國代	第二屆立委	第十二屆縣長	第十屆省議員	第三屆立委
得票率	23.4%	20.2% <sup>25</sup>	46.9%	26.4%	33.5%
年度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選舉	第三屆國代	第十三屆縣長	第四屆立委	縣長補選	總統大選
得票率	16.5%	29.1%	35.3%	35.3%	47.2%

表 3-2 1990-2000 年雲林縣各主要選舉民進黨得票率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然而，在 2000 年總統大選之後，隨著民進黨陳水扁在雲林縣獲取前所未有的高票當選總統後，雲林縣的地方政治在激烈的政黨競爭下出現了另一個重要的因素：政黨政治的影響。而在政黨競爭的主要背景下，兩條主要的軸線之一是民進黨積極的吸收新的政治勢力，並且擴大政治版圖；而另一條則是派系在政治資源不斷壓縮，以及民進黨的策略下，則開始出現激烈的競爭與內部分裂。

以下，我將依循雲林縣兩條主要發展的軸線進行敘述。而為了比較整全地呈現當前的發展，我將捨棄上文中將兩黨分開敘述的方式，改以混合的方式敘述。在第一部分，我把時間擺在 2005 年縣長選舉前的變化。而在第二部分，則更詳細的說明 2005 年民進黨取得縣長職務後，地方政治的演變。

## 一、獨大的張派與民進黨的擴張（2000-2005）

<sup>25</sup> 由於朱高正代表當時的社會民主黨，因此並未列入計算。

於 1999 年縣長補選中獲得勝選的張榮味，憑藉既有的人脈和縣長的資源，很快就成為雲林縣各鄉鎮派系的共主，並妥善安排縣內其他派系的支持者。主要的策略是拉攏廖派，並防堵許派勢力發展（鄭東來，2009：334；蘇俊豪，2004：173）。他在縣農會當中積極安排自己的人馬，讓原總幹事謝永輝擔任理事長，再安排自己的妹婿擔任張永成擔任總幹事。形成張派結合廖派而獨大，並且孤立了許派的情況。在 2001 年 3 月的各級農會選舉中，透過張榮味的協調成為 20 個鄉鎮農會全部同額競選的情況（蘇俊豪，2004：170）。2001 年的縣長選舉中，張榮味重新加入國民黨，並且獲得 61% 的選票，顯示張榮味在當時的影響力。

而在另一方面，民進黨在全國性選舉的得票也在 2000 年總統大選之後快速成長。在 2001 年的立委選舉中，民進黨的三位候選人總得票達 35.1%，假如加上台聯李建昇<sup>26</sup>的得票則達到 41.3%。且林國華與蘇治芬兩人都選上立委，突破以往只有一位民進黨立委的情況。因此，在 2001 年立委選舉之後，雲林縣民進黨的兩大主要政治勢力也已經形成。在雲林縣的較靠東邊的山線，主要是林國華依賴其在農民運動中建立的聲望，還有農權會組織在全縣替農民服務而形成的支持者網絡。而蘇治芬則以其家族在北港長期經營的人脈為核心，透過發展社會網絡以經營政黨以外的更多支持者。此外，在 2001 年的縣議員選舉中，民進黨的席次也從 3 席增為 7 席，顯示民進黨在雲林縣開始迅速擴張。

這麼迅速的擴張一方面是民進黨的政黨標籤取得選民的認同，但另一方面民進黨也在對地方政治菁英進行「招降納叛」的策略，積極吸收地方派系人士入黨。在 2001 年的縣長選舉前，總統陳水扁一直被認為希望張榮味能夠像陳明文一樣加入民進黨（王良新，2005：102-5）。在縣長選後到 2004 年總統大選間，民進黨也吸引了四湖鄉吳派的吳修榮、吳修量，水林鄉許派的陳憲中，以及水林鄉長陳茂順等人加入。在更多地方人士加入，以及持續的政黨競爭之下。即便縣長張榮味向媒體發下豪語要讓連宋大勝民進黨五萬票（黃國樑、王良新、段鴻裕，2003），

---

<sup>26</sup> 但李建昇本是張榮味的秘書，因此很難判定他的得票屬性。此外，他在之後即加入民進黨，但是也和蘇治芬縣長不和，在議會自組黨團之下的次級團體：維新會。

但是 2004 年的總統大選中，陳水扁在雲林縣突破上次的得票，取得了 60.32% 選票。

2004 年之後，民進黨在雲林縣雖然仍然受限於派系，但是政治上的影響力已經大幅擴大。但國民黨內，則持續面對派系之間的競爭。在 2004 年底的立委選舉，縣長張榮味由於在總統選舉中無法達成「贏五萬」的目標，因此在初選時被迫讓妹妹張麗善退出初選，以無黨籍參選。而且，在立委選舉前，時任縣長的張榮味就因為林內焚化爐弊案而成為被告，且因逃亡而遭到通緝，甚至在選前一天晚上被捕。但是，張派主要支持的兩位候選人張麗善與張碩文仍然以前二高票當選，另外一位當選的則是許派的許舒博。

在立委選舉過後，由於張榮味因議長賄選案被法院判決有罪，必須入監服刑。由於縣長的資源對於派系相當重要，因此到了 2005 年底的縣長選舉前，張派努力運作自己派系的候選人參選，而不希望把機會讓給許派的許舒博。但是黨內初選的結果，許舒博仍然擊敗代表張派的張清涼獲得提名。因此，在選舉過程中，仍然具有相當大地方影響力的張榮味成為許舒博和民進黨參選人蘇治芬積極結盟的目標（魯永明，2005）。民進黨政府派任的代理縣長李進勇派遣張派張輝元的兒子張哲慎代理林內鄉長職務，希望可以獲得水利會協助（王良新，2005：165）。而張榮味雖然表示他不願意插手選舉，但是許舒博在事後的訪談中卻篤定地認為張榮味不僅沒有支持他，反而力助蘇治芬當選（*ibid.*: 167）。由於縣長具有的資源很可能使對方擴大自己的影響力，張派在自認為能憑藉自己的實力勝選下，選擇和許派正面衝突。

不過，在另一方面，民進黨內部在初選過程中也引起了相當激烈的內鬥。在 2001 年立委選舉中失利的林國華也準備參選雲林縣長，並且在初選中和蘇治芬展開了激烈的文宣衝突。最後只好由當時的黨主席蘇貞昌協調，讓林國華入閣擔任農委會副主委才告落幕（*ibid.*: 162）。但無論如何，到了 2005 年之後，民進黨除了成功地擴大了雲林縣選民的支持外，也成功地吸納了許多地方勢力加入。

縣長職務與資源的取得也讓民進黨得以進一步擴大支持基礎。但是，面對黨內外對於資源的需求，也對縣長蘇治芬形成了分配的上的困境。

## 二、 2005 年之後：民進黨縣長的分配困境與張派的分裂

### （一）蘇治芬的招降納叛與分配困境

在 2000 年民進黨執政之後，陳水扁總統積極在各縣市展開的「招降納叛」不僅在嘉義縣獲得陳明文（林派）的響應，在雲林縣也獲得許多原本的派系菁英加入民進黨。但是，在張榮味不願意加入之下，雖然有鄉鎮級派系政治人物的加入，但仍受困於地方基層無人經營，因此在和族群認同情感較無關連的立委和縣長選舉中，難以快速地擴大政治版圖。因此，民進黨在蘇治芬取得地方執政優勢之後，開始在中央執政的優勢下，積極地吸收張派內部以及其他基層樁腳（王良新，2005：174-9）。蘇治芬在入主縣府之後，就延攬了張派主要成員張輝元的長子張哲誠進入縣府，擔任縣府主任秘書。然而，「招降納叛」的策略雖然挑動了張派內部的矛盾，但在另一方面也必須面對黨內菁英的不滿。

#### 1、張派的內部矛盾與穩固的派系網絡

張派內部主要的政治勢力之一就是 1990 年的水利會長選舉中，就和張榮味結盟的水利會長張輝元。水利會和其他動員組織，如農會或鄉鎮市公所的不同之處在於，其組織網絡廣佈整個雲林縣，甚至有部分延伸到南投與嘉義縣。其下不僅轄有五個區管理處、五十五個各式與各鄉鎮工作站，以及五百餘個工作小組的組織，且約有二十萬個會員，整體組織又是由會員直選出的會長為首的金字塔型層級結構（蘇俊豪，2004：234）。因此，透過人事任命和水路建設經費，不論是在動員能力或是其所能動用的資源上，都遠遠勝過農會與公所的影響力。所以，

當 2005 年張哲誠進入縣府擔任主祕時，就隱含了張派內部分裂的可能。一位農會背景的受訪者就認為，張榮味在當時採取的布置中，讓山線的張輝元家族太過集中，因此隱含權力衝突的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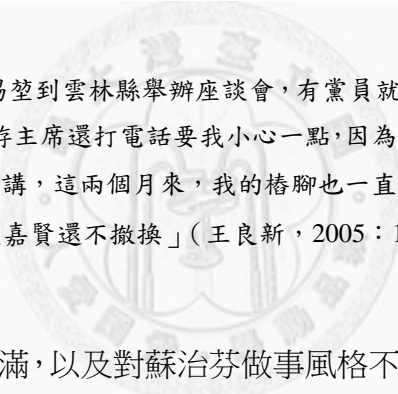
「他的布局是分山、中、海線，現在是比較金字塔的，海線是海邊的鄉鎮，中縣是虎尾區，山縣就是西螺、斗六。他是平衡啦，他每個區都不會讓他太強，不要讓他威脅到我領導者。張輝元的話就是他山線蠻重要的，其他就是鄉鎮長阿、議員。...他山線人就少，沒有像其他這樣勢均力敵，張輝元比較集中，張碩文也當立委，有點獨強，這樣很危險。」YK09

然而，民進黨與蘇治芬的招降納叛對於在地方擁有深厚實力，且具有廣泛的資源基礎的張榮味在 2009 年前並沒有太大影響。在 2005 年的縣長選舉中，儘管張派沒有辦法參選縣長，但是至少沒讓許派選上縣長。並且他又大量地在三合一選舉中取得議員席次，縣議會議長蘇金煌，以及縣議會內部由其栽培的李建志所組成的無黨聯盟（現已分裂）都是長期與其結盟的派系成員，因此可以透過縣議會影響縣府的資源分配（魯永明，2005）。

張榮味之所以能夠在失去縣長資源後仍深具影響力，不僅是因為他的人脈基礎，更是因為他安排派系中的核心成員佔據了許多重要職位，因此能夠持續擁有穩定的政治與經濟影響力。他的女婿張永成擔任省農會總幹事，智囊林啟滄任省漁會總幹事，張榮味本人擔任省商會理事長，他所培養的助手張清涼也擔任台北農產運銷公司總經理。透過這些廣佈的人脈與經濟資源，張榮味即便不具有縣長的資源，仍然可以維繫派系的影響力。因此，在 2008 年的立委選舉中，一方面透過自己的組織動員，一方面也因為民進黨的劉建國與台聯尹玲瑛的相互競爭以及民進黨的支持度滑落，因而讓張派推出的兩位候選人（張榮味織女張家郡與張輝元之子張碩文）取得雲林縣的兩席立委。張榮味還計畫要妹妹張麗善在不連任立委後，準備競選 2009 年縣長。而國民黨許派的許舒博，在爭取立委提名失敗後，則轉任國民黨雲林縣黨部主委等待候補不分區立委。

## 2、縣長的資源與分配的困境

在 2008 立委選舉中，民進黨的得票假如加上以無黨籍參選的尹玲瑛的得票，雖然有將近 46% 的選票(總統選舉 51%)。但是蘇治芬在山線選區支持的劉建國，和海線競選連任的立委陳憲中都無法在單一選區中當選。因此，在 2009 年立委補選導致張派分裂以前，張派的實力不僅相當堅強，內部分裂的隱憂也可能在重新取得縣長資源後被消弭。而相較於張榮味成功地維繫派系，民進黨籍的縣長蘇治芬在 2009 年以前卻面對困境，不僅招納派系菁英的策略成效不彰，其資源分配的方式亦廣受黨內人士批評。在王良新和蘇治芬的訪談中就提到，他對非民進黨人士的招降舉動已經引發黨內的不滿：



「有一次民進黨主席游錫堃到雲林縣舉辦座談會，有黨員就問說，蘇縣長是民進黨縣長還是國民黨縣長?事後游主席還打電話要我小心一點，因為地方有這樣的聲音出來。其實，不只是游錫堃這麼講，這兩個月來，我的樁腳也一直有反映：為什麼要任用張哲誠?為什麼環保局長顏嘉賢還不撤換」(王良新，2005：180)

而在對資源分配的不滿，以及對蘇治芬做事風格不滿與黨內舊怨等因素影響下，縣議會中的民進黨團也出現由李建昇議員領導的次團體。當時的成員包含廖清祥、蔡岳儒、李建昇、李健福、黃耀煌等幾位議員，再加上議會由張派的議員與議長主導，這讓縣政的推動非常不順利(王良新，2006、2009)。

張派在各方面的強勢，以及本身的困境使得蘇治芬縣長在 2008 年立委選後一度決定放棄競選連任，將副縣長交給黨內的李應元準備參選。而在最後因黨內徵召決定參選後(林政忠，2008)，又因為「環美案」收受賄賂的罪嫌被收押(段鴻裕、蔡維斌，2008)，被迫絕食抗議。但是，在張派立委張碩文賄選案爆發後，張派的分裂讓蘇治芬與民進黨再次擴大了政治版圖。不僅取得縣長連任與立委補選的成功，甚至在縣議會、鄉鎮長等基層選舉中都擴大了支持基礎。

### 三、 2009 年之後：張派的分裂與民進黨基層的擴大

2008 年立委與總統選後，國民黨取回執政權，雲林縣的張派也取得兩席立委，而且張麗善也很可能在 2009 年縣長選舉再度取得縣長的資源。然而，2008 年立委選後，張派立委張碩文就因為賄選案被民進黨對手劉建國提起當選無效的訴訟（蔡維斌、李鈺銅，2008）。並且在 2009 年 7 月確定賄選定讞，必須在 10 月份重新補選立委。民進黨在提名過程中雖然有李應元和劉建國相爭，但最後仍由劉建國獲得提名。然而，國民黨的提名過程就涉及到國民黨中央與張派內部張榮味、張輝元之間的溝通協調與權力衝突，最終導致張派內部的分裂。結果不僅失去立委與縣長選舉的機會，甚至在民進黨的策略下，差點因為可能失去水利會而造成派系的瓦解。

提名過程為何會造成張派內部的分裂，新聞報導與各方說法都有分歧。其中一種看法認為，張榮味原本已經和長期盟友張輝元達成共識，由張輝元出來代表國民黨競選。然而，由於張輝元本身已經因為賄選案被判處重刑，極力強調清廉形象的總統馬英九與國民黨中央並不願意讓張輝元出來競選，而是屬意具有親馬色彩的學者吳威志出來代表（唐孝民，2009）。然而，由於張榮味不願坐視最後兩敗俱傷的結果，因此決議自己推出國民黨與張輝元兩方都能接受的人選：張榮味擔任縣長時的教育局長—雲林科技大學教授張良輝。並且承諾讓張輝元家族繼續職掌水利會，甚至以後再競選立委或縣長。然而，張輝元方面不願意放棄機會而直接喪失立委的職位，因此希望張榮味不要派出自己的人選，讓張輝元自己能重新選上立委。而在這背景下，雙方協調的過程中，可能由於彼此之間的言語衝突，而終至形成水火不容、必須在補選中相互競爭的局面。

補選的結果，不僅張輝元與張良輝兩人的選票都不到三萬張選票，兩人在選舉間的摩擦更造成派系的分裂。張輝元打出的「青埔宮」選舉文宣（參考下圖 3-4），諷刺張榮味壟斷縣內所有的選舉（陳嘉宏、曾慧蘋、許素惠，2009），

甚至威脅將競選縣長，讓張麗善在選後兩天就宣布退選（黑白集，2009）。而由於許派的許舒博也不願意放棄即將候補到的不分區立委席次，冒險競選縣長。在無人參選之下，國民黨只好徵召原本即欲參選的雲林科技大學教授吳威志參選 2009 年 12 月的縣長選舉。



圖 3-4 2009 年立委補選中的「青埔宮」文宣

資料來源：張輝元競選網站

在沒有強有力派系參選，加上國民黨在八八水災中表現不佳下，不僅吳威志大輸蘇治芬十萬多票，僅取得十二萬餘萬張選票。民進黨在基層的鄉鎮市長由 2 席增為 6 席，議員席次也增為 13 席，國民黨議員則減為 13 席。這讓雲林縣基層政治的版圖大幅扭轉，甚至也讓許多張派的議員落選，動搖了張派的基礎（鄭旭凱，2009）。而選後的議長選舉中，張派主要成員蘇金煌甚至和蘇治芬聯手選上議長（段鴻裕，2010a）。原本屬於張榮味的無黨籍議員（原本由李建志領導的無黨聯盟）也分裂成兩派。李建志帶領部分議員組成「無黨聯盟」，而支持張榮味的議員則組成「誠信聯盟」，各自擁有 9 名議員。

但對於張派的維繫來說，更為關鍵的問題在於水利會組織的掌控權。2010 年 4 月的水利會長選舉，張榮味和張輝元兩人開始爭奪水利會的組織資源。張輝元和蘇治芬聯手推派曾經擔任過蘇治芬縣長主任秘書的長子張哲誠。而張榮味則推舉前林派大老陳錫章的外甥林文瑞競選，形成雲林縣兩大政治勢力的對決（陳信利，2010b）。最後，張榮味支持的林文瑞仍取得了水利會長的職位，讓張派仍然能夠維繫水利會的影響力（段鴻裕，2010b）。

因此，到了 2010 年中，張派雖然面對派系分裂，但因為取得水利會而能夠暫時穩定派系組織，而民進黨則在基層選舉中取得相當大的進展。但蘇治芬縣長雖然努力地透過「招降納叛」，企圖一面瓦解國民黨派系，一方面拓展民進黨的版圖。而在立委補選中當選的劉建國，也在競選過程中成立「好央甲團隊<sup>27</sup>」，積極培養地方實力基礎（程斐詩，2010）。民進黨在擴大實力基礎下，運用的是吸納派系政治菁英，以及以個人資源的方式培養地方實力。但這樣的方式，很容易產生內部分配的困境。因此，不僅在許多議案上，蘇治芬縣長仍然受到黨內部分議員，以及國民黨與無黨籍議員的杯葛（段鴻裕，2010c；陳信利，2010c）。

---

<sup>27</sup> 「好央甲」的意思是「好請託」，表示劉建國團隊很熱心服務選民。

在黨內，也由於資源分配而形成不滿。一位前任民進黨幹部就表示，在蘇治芬的分配策略下，民進黨內的不同聲音已經被不斷地邊緣化：

「現在雲林民進黨只有三種人，一種投降啦，一種叛逆，一種歸順。投降、叛逆還是歸順的人就是指蘇治芬啦。像我們 XXX 啦，我是把它編入投降的人，但是後來變歸順。歸順是有資源，但你投降就割地賠款了。」 YD12

#### 肆、 小結：侍從主義政治的變遷或持續？

因此，雲林縣的政治現況在政黨競爭的背景影響下有兩大軸線發展：其一是國民黨的內部競爭；其二是民進黨招降納判的策略。然而，民進黨的策略在政黨支持者的擴大下，雖然可能加速派系的分裂，但是民進黨本身採取的手段卻可能仍延續侍從主義的連結模式。在下一章當中，我會利用更多訪談資料，說明民進黨和選民連結的內涵。我發現，不僅國民黨的派系繼續延續著侍從主義的連結模式，民進黨的政治人物在與選民以對政黨理念與情感認同上進行交換的同時，也必須滿足選民對於特殊利益的需求。而為了滿足選民的需要與招納地方政治菁英成為支持者，民進黨政治人物也需求特殊利益的供給，因此政治人物之間可能在資源的吸引下，發展出侍從主義的連結模式。

## 第四章 資料分析：並存與共生的政治連結

在上一章中，我已經把雲林縣派系的背景，以及近年來的政治發展做了簡要的敘述。在政黨輪替以及政黨間競爭越趨激烈的背景之下，國民黨的派系出現派系之間與內部分裂的情況。而 2005 年後，民進黨雖然已經開始在地方選舉中穩健地擴大影響力。但是，積極分化與吸收派系菁英與樁腳的策略卻產生分配上的困境。黨內與派系政治人物對於資源的需求，讓民進黨縣長蘇治芬必須面對縣政上的僵局。同時，民進黨政治人物在擴大基礎的同時，也更重視對選民提供服務，並在黨內建立自己的選舉組織。這些政治現象是否意味著派系的影響力與組織已經在政黨競爭下衰退，而全國性的政治分歧影響是否已經在選舉中穩定地連結政治人物與選民了呢？又或是在政黨勢力變遷與認同連結的強化下，政治人物仍然沒有改變既有的政治連結或資源分配的策略？在這一章中，我將以調查資料和菁英訪談資料回應這個問題。

在第一部分，我將呈現出雲林縣選民的調查資料，說明雲林縣選民已經開始依循兩黨間以族群認同為核心的政黨分歧標籤，作為政黨與選民之間建構政治連結的主要依據，並且有趨於極化的現象。強調族群議題的民進黨支持者明確地在這個議題上選擇其立場，但國民黨支持者在這個分歧中的位置則相當不明確。不過穩定的政黨偏好並不代表穩定的投票行為，尤其是國民黨支持者，顯示其他的「政治連結」模式仍具有重要影響力。不過，調查資料難以進一步說明政治連結的內涵與成因。因此，在後續兩個部分，我透過訪談資料，分別說明兩大黨的地方政治人物採用的連結策略與影響。

在當前的立委和縣長選舉中，即便新的選舉制度強化了政黨對政治菁英和選民在策略選擇上的影響力，以及政黨間主要議題的影響力。但在選民對政治分歧中的立場並不明確下，對國民黨政治人物來說，全國性的政治分歧與制度變遷並非關鍵，派系組織、樁腳和人際關係網絡的維繫和侍從主義連結的操作仍然是穩

定地獲取選票的主要因素。而在第三部分，我將進一步比對在具有明確認同傾向的支持者之下，民進黨的政治人物與樁腳在連結選民時所運用連結策略。

我發現，在強化的認同連結下，民進黨政治人物的連結策略綜合了「政黨認同連結」、「特殊利益分配」與「侍從主義連結」。在連結支持政黨的選民時，政黨認同與特殊利益分配是「共生」的：政治人物以族群認同情感或政策執行力的可信度交換選民的支持，但另一方面仍然以「特殊利益」的形式，以各種服務和鎖定特定群體的建設來分配資源。而對於不具政黨認同的選民，民進黨政治人物則傾向於直接以服務和幫忙，以「人情」與「利益」交換選票；或是利用政黨的「理念」，試圖吸引中間選民。因此，在中間選民的部分，政黨認同與侍從主義連結是「並存」的。但更重要的是，政治人物對於可分配資源的依賴造成政治人物之間侍從關係的發展。在訪談資料呈現的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到派系與侍從主義不僅在國民黨之中延續，他也正潛伏在民進黨的政治連結中。這個「並存」又「共生」的連結現況，正佐證了本文提出的主要論證：台灣當前的政治分歧切割了其他社會分歧，導致政黨競爭中難以出現新的政策主張與連結策略，因此必須同時採用特殊利益為基礎的資源分配，甚至成為侍從主義的連結關係。

## 壹、選民面向：上升的政黨認同與不穩定的投票行為

在這一節，我將呈現的資料主要是雲林縣選民在「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 (TEDS)」2009M、2005M、與 2009L BE&M-T<sup>28</sup>的調查資料中表現的態度資料。我將利用資料說明，雲林縣的選民已經和兩大政黨建立起了一定的連結關係，而

---

<sup>28</sup> 2005M 與 2009M 指的是縣長選舉資料，這兩筆資料是以面訪的方式取得的獨立樣本。而 2009L BE&M-T 則是電話訪問的資料，資料內容包含了 2009 年立委補選（9 月）後所做的電話訪問，以及縣長、議員及鄉鎮市長三合一選舉（12 月）後所做的電話訪問。三合一選舉後的電話訪問中，還有對立委補選後所做的選民做追蹤調查。本文使用的資料全部係採自上述資料，詳細說明請參考附註 20。

且這個政治連結關係是建立在以「族群認同」為其基礎的政治分歧上。具有政黨偏好<sup>29</sup>者的比例在 2005、2009 年的兩次調查中呈現上升趨勢，而且政黨偏好的這個指標也確實主導了選民的投票行為。但是，當我們更進一步地檢視具有政黨偏好的選民在每一次選舉中的投票抉擇，卻會發現自認為藍軍的選民在縣長選舉中非常容易跑票，而綠軍選民在 2008 年立委和總統選舉中，比起其他選舉也更容易跑票。在比對不同選舉的不同候選人後，可以發現藍軍跑票大都是出現在張派沒有候選人，且民進黨派出蘇治芬參選的情況；而綠軍跑票的情況，則是出現在張派在立委選舉中推出大量候選人，以及 2008 總統大選的時候。因此即便在調查資料中出現了越來越穩定的政黨偏好傾向，但是仍然很難判定政治連結的現況。因此，我會在下一部分的菁英訪談的資料分析中，進一步說明兩政黨政治人物的政治連結策略與內涵。

## 一、 穩定上升中的政黨偏好

對於政黨綱領和選民之間的聯繫來說，政黨偏好的指標相當重要，因為這表示政黨和選民之間已經發展出穩定的連結關係（Dalton, 2007）。在雲林縣的調查資料中，選民對於國、民兩大政黨的偏好在兩次的調查中出現增加的趨勢。而由於偏好其他政黨的受訪者出現的次數實在太少（2005 與 2009 年資料中都各僅 11 位），因此在下表 4-1 中，我將這些資料直接分類成「藍」、「綠」陣營進行呈現。並且根據受訪者回答的「偏好強度」<sup>30</sup>把他們區分成「強藍」、「弱藍」、「強綠」、「弱綠」與「其他」五種分類來表示。

<sup>29</sup> 在台灣的調查研究中，通常都是用「對某政黨的偏好」來作為指標。但大多研究者將這個指標和「政黨認同」混合使用。本文中則是只使用「政黨偏好」一詞。主要原因是「政黨認同」和本文主要論證中的「政黨認同連結」容易混淆，但卻仍有概念上的差異。詳細說明請參考本文文獻分析的最後一個部分。

<sup>30</sup> 兩年度調查中政黨偏好題組的細節請參考附錄一。

年度/ 陣營強度	強藍	弱藍	其他	弱綠	強綠	備註
2005M	1.50%	12.40%	69.50%	13.90%	2.70%	N=661
2009M	2.80%	18.80%	47.90%	25.50%	5.00%	N=1,346

表 4-1 2005、2009 年雲林政黨偏好對照表

資料來源：TEDS 2005M、2009M

在兩次的調查資料中，2009 年縣長選後的政黨偏好回應者比例，比起 2005 年選後調查的比例多出將近一倍，而回答沒有政黨偏好的人則自將近 70% 滑落到 47.9%，顯示雲林縣選民與政黨之間的連結有加強的趨勢。然而，由於資料是屬於橫斷面資料，因此只能憑此估計雲林縣選民的整體政黨偏好的趨勢，無法準確推估兩次調查中個體層次的變化。但是 TEDS 調查團隊分別在 2009 年立委補選與縣長選舉後，對 2009 年立委補選後進行的電話訪問<sup>31</sup>中同一群的受訪者，進行了定群追蹤的電訪調查。這個資料可以提供我們進一步分析雲林縣選民在政黨偏好上的穩定程度。下圖表 4-2 一樣是按「藍」、「綠」重新編碼後的結果：

年度/ 陣營強度	強藍	弱藍	其他	弱綠	強綠	備註
立委補選	10.8%	26.20%	32.0%	17.0%	14.0%	N=1,329
縣長選舉	10.6%	26.5%	30.2%	22.1%	10.6%	N=1,329

表 4-2 2009 年立委補選與縣長選舉電訪政黨偏好對照表

資料來源：2009L BE&M-T

從上表中可以看出，兩次的調查結果相當近似，但是和面訪調查的結果相比，則高出很多。這很有可能是電訪調查中，由於只能針對家用固定電話、訪問時間以及不同的戶中選樣執行方式，所造成的偏差導致（洪永泰，1996）。不過，進

<sup>31</sup> 兩次訪問的時間分別是，立委補選後電訪：9 月 27 日～10 月 6 日；縣長選舉後追蹤電訪：12 月 6 日～12 月 15 日，時間約相距兩個月。

一步分析追蹤資料的結果，可以看到個體選民的變動。下表 4-3 是仿照盛杏媛（2008b）的處理方式，將選民的政黨偏好變動製成「穩定的綠」、「不穩定的綠」、「不表態」與「游離選民」、「穩定的藍」與「不穩定的藍」等五分類製作而成。

類別	穩定的綠		不穩的綠		不表態	游離選民		不穩的藍		穩定的藍
	綠	無意見	綠	無意見		藍	綠	藍	無意見	
2009 9 月	綠	無意見	綠	無意見	無意見	藍	綠	無意見	藍	藍
2009 12 月	綠	無意見	綠	無意見	無意見	綠	藍	藍	無意見	藍
次數	337		137		280		36		129	410
百分比	25.4%		10.3%		21.1%		2.7%		9.7%	30.9%
總計	35.7%				21.1%		2.7%		40.6%	

表 4-3 雲林縣選民政黨偏好穩定程度的五種類型

資料來源：2009L BE&M-T

在上述資料中，55%以上的選民在兩次回答中都回答了同樣的政黨偏好，而只有 2.7%的選民變換了政黨偏好。這顯示，在電訪調查的結果中，雲林縣的選民有非常高的政黨偏好穩定程度。當然，電訪調查有其不可避免的偏差存在，但這三筆資料的結果都說明同樣的趨勢：雲林縣選民在政黨競爭的過程中，已經逐漸建立起對於兩大政黨的穩定支持。但是這樣的偏好是來自於什麼樣的基礎呢？下表 4-4 呈現了政黨偏好和族群認同之間的交叉列表。在圖表中，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在 2005M 與 2009M 兩次面訪調查中政黨認同和族群認同之間的相互關係。綠營的偏好者有更高的比例表示自己是「台灣人」，而非「都是」，甚至沒有人認同自己是「中國人」。但是在偏好藍營的支持者當中，則較不願意直接聲明自己是「台灣人」，而更多認同自己是兩種人「都是」。

陣營強度\ 族群分歧	台灣人	都是	中國人	其他
強藍 05/09	20%(2) / 42.1%(16)	70%(7) / 42.1%(16)	10%(1) / 15.8%(6)	0%(0) / 0%(0)
弱藍 05/09	39%(32) / 43.5%(110)	54.9%(45) / 49.8%(126)	2.4%(2) / 6.3%(16)	3.7%(3) / 0.4%(1)
中立或其他 05/09	57.2%(263) / 63.4%(409)	33.7%(155) / 28.5%(184)	2.4%(11) / 2.8%(18)	6.7%(31) / 5.3%(34)
弱綠 05/09	61.3%(57) / 81.6%(280)	35.5%(33) / 15.7%(54)	0%(0) / 1.2%(4)	3.2%(3) / 1.5%(5)
強綠 05/09	94.1%(16) / 94%(63)	5.9%(1) / 6.0%(4)	0%(0) / 0%(0)	0%(0) / 0%(0)

表 4-4 政黨偏好與族群認同的交叉分析

資料來源：TEDS 2005M、2009M

而且在兩次的調查中，我們可以看到態度上趨向極端的顯著變化。綠營的民眾更加認同自己是「台灣人」，特別是「弱綠」的選民認同台灣人的比例大幅增加，而認同「都是」的比例則大幅減少。相對的，在藍營的部份，雖然認同台灣人的部份也急遽增加，但是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比例也增加很多。顯示雲林縣選民受到全國性政治的影響，在認同態度上走向極化。然而，國民黨選民並未在政治分歧上具有特定位置，而民進黨的支持者這個議題上則有明確的立場。這或許解釋了為什麼在後續的各種資料中，民進黨的政治菁英與支持者都展現了更穩定的政黨認同連結。

## 二、不穩定的投票行為

「政治連結」概念探測的標的，是政治人物和選民之間如何進行選票的「交換」。而前述資料中已經說明，雲林縣的選民對政黨的偏好和族群認同分歧的差異相關，且民進黨的選民更明確地認同於這個分歧。因此，另一個觀察的重點是：政黨偏好是否代表了投票的穩定呢？假如選民辨認的是政黨的政策綱領，或是和政黨之間有極為強烈而穩定的情感依附，那麼我們可以假定跨黨投票的情況會非常的低。但假如選民雖然認同政黨的核心政見，但卻又容易受政治人物所提供的人情、個別利益分配等原因左右，那就很可能會出現選票的移轉。

在下表 4-5 和 4-6 中，我分別運用 2009M 的縣長選舉面訪獨立樣本以及 2009 年三合一選舉後的 1,329 份追蹤資料中，訪問<sup>32</sup>選民在該次調查前歷次選舉中的投票結果，並且和他的政黨偏好（在追蹤資料中則是「政黨偏好穩定程度」）做比對。在扣除掉拒答或回答忘記了等等遺漏值之後。欄位中的百分比表示的是該類選民「投票給綠營」候選人的比例，藍營高於 10% 以及綠營低於 90% 的欄位則加上灰底與粗體標記，表示有較多的跑票行為出現。

年度/陣營	強藍	弱藍	其他	弱綠	強綠
2005M	<b>13.8%</b>	<b>37.4%</b>	78.9%	94.6	96.2%
2008L	3.0%	6.6%	45.5%	90.8%	98.1%
2008P	2.6%	1.3%	35.7%	<b>80.9%</b>	100%
2009BL	<b>23.1%</b>	<b>30.2%</b>	73.4%	91.1%	100%
2009M	<b>18.8%</b>	<b>40.7%</b>	85.1%	97.1%	100.0%

表 4-5 各類政黨偏好選民投票給綠營候選人百分比（2009M）

資料來源：TEDS 2009M

<sup>32</sup> 詳細的題目資料請參考附錄二。

年度/陣營	穩定的藍	不穩定的藍	不表態	不穩定的綠	穩定的綠	游離者
2005M	<b>21.6%</b>	<b>56.7%</b>	73.6%	<b>84.3%</b>	90.8%	52.6%
2008L	5.6%	7.0%	35.7%	<b>62.7%</b>	<b>82.0%</b>	33.3%
2008P	0.5%	1.9%	27.4%	<b>58.2%</b>	<b>81.5%</b>	13.8%
2009BL	<b>10.5%</b>	<b>23.1%</b>	54.8%	<b>78.9%</b>	90.5%	80.0%
2009M	<b>23.8%</b>	<b>48.8%</b>	77.6%	91.9%	98.7%	68.0%

表 4-6 各類政黨偏好選民投票給綠營候選人百分比 (2009L BE&M-T)

資料來源：2009L BE&M-T

上述資料顯示依循著認同分歧建立的政黨偏好與投票行為有相當高的關連性，但是對國民黨具有偏好的選民比民進黨的支持者更容易產生跑票的行為。尤其是在 2008 年以外的選舉中，不僅國民黨的全國聲望較低，國民黨的派系之間與派系內部也出現分裂的情況。而民進黨的選民雖然對於當前的政治分歧有更穩定的政治立場，但在 2008 年的選舉中也出現了較多的跑票行為。而由於資料上的限制，我很難在調查資料中分析出不同年度中兩黨支持者跑票的原因。但是這些資料說明政治分歧的影響與政黨偏好雖然能夠解釋選民的投票行為，不過對於兩黨（特別是國民黨）的選民來說，都非單一的影響因素。

在這個部分，我已經透過調查資料說明雲林縣的選民對於政黨的偏好確實依循著主要的政治分歧快速成長，並且對於選民的投票有著高度的影響力。然而在這些資料中也發現，國民黨的選民和民進黨的選民相比，不僅在政治分歧上的位置更不明確，在投票行為上也更加不穩定。為了進一步釐清政治分歧和政治連結現況的關係，在以下兩小節的菁英訪談資料分析中，我將從另一面向分析菁英的連結策略來和調查資料相對應。這些資料可以進一步支持我的核心論證：由於台灣當前政治分歧的困境，政黨與選民之間的連結是訴諸於情感的連結關係，因而使得侍從主義式的特殊利益交換，或是共識性議題的競爭仍有其影響力。

## 貳、新瓶與舊酒：政黨競爭與不變的國民黨派系

在上一個部分中已經發現，對特定政黨具有偏好的選民越來越多、對於政治分歧的回應也隨著政黨競爭而趨向兩極，並且反應到投票的行為上。這表示長期的政黨競爭和政治分歧，對於政治連結的轉移確實產生相當的影響力。但是，政治人物是否也在另一方面回應這樣的趨勢呢？特別是在國民黨方面，具有政黨偏好的選民不僅在政治分歧上的立場並不明確，跑票的程度也遠高於民進黨的選民。因此，在這一個部分，我希望進一步呈現國民黨政治人物的連結策略與成因。

在與國民黨的地方菁英訪談的過程中，我發現國民黨的政治人物也在回應政黨競爭、制度變遷與現代化造成的衝擊：和選民一樣，在既定的政治制度和政治分歧之下，政治菁英也必須回應制度的所施予的誘因。國民黨的政治人物也坦承受到政黨的標籤與政黨形象的影響，並且被迫要回應政黨在全國層次營造的議題。其次，社會與經濟的變遷也在緩慢地改變著雲林縣的連結關係，越來越多的選民不再在乎派系給予的人情、利益與社會網絡束縛，轉而透過媒體與其他網絡獲取的資訊來採取政治行動。這些資料說明，政黨競爭、制度變遷與社會經濟的現代化確實正在改變雲林縣的政治連結模式。

然而，國民黨的政治人物雖然感受到政黨影響力的上升，但是並不認為這是主要的連結策略。最重要的政治連結仍然是平時以利益與人情，對派系組織、樁腳與社會網絡中各種人際關係的維護，並且在選舉時透過樁腳回收選票。因此，在第二個段落中，我將進一步來談政治人物佈建樁腳組織，以及與選民進行連結與交換的內涵。此外，即便現代化因素正在改變雲林縣的選民，但是政治人物仍然企圖透過其他方式維繫既有的侍從關係與網絡。在過去穩固的金字塔體系與動員「系統」之外，政治人物也自行建構更多直屬於自己（而非屬於旗下其他大樁腳）的樁腳。並且也開發出更多的新興團體與組織，企圖在同樣的侍從主義策略

下，吸收更多的新世代成員進入派系的人際網絡來適應社會與經濟結構的變遷。這顯示侍從主義連結與派系的彈性與多變，不只限縮於「傳統」的社會網絡。

這樣的結果，說明長期的政黨競爭、制度變遷與現代化因素，都並未根本改變原本的政治連結模式，但是在下個部分的民進黨資料卻出現顯著的不同。本文認為，關鍵的因素在於國民黨與其選民並未在當前的政治分歧上具有特定的立場，因此也更難以改變既有的連結模式。

## 一、新瓶子：制度改革與政黨競爭對政治人物的影響

### （一）政黨的全國性競爭與新制度的規約

在縣長選舉以及新的 SMD 立委選舉制度下，黨內的競爭被轉換成了兩大黨之間的競爭。因此，不僅候選人會策略式地移向兩大黨，選民也會在不願意浪費選票的心理下投票給最有可能當選的組合（Hsieh, 2009）。政黨的提名權因此變成關鍵的權力樞紐。在以下四段訪談中，第一位的國民黨籍的前任立委就非常坦白的提到選舉制度的影響，他必須投靠一個政黨、並且順應政黨的黨紀要求：

「（現在政黨的）<sup>33</sup>影響很大，沒有辦法不要政黨，整個政黨政治是一個趨勢、是目前的情況，其他的先進國家也是這樣。...政黨剝奪了民眾選擇的權力，把持了提名權，而且政黨要求你為了政黨來做辯護，而不是為政策。...所以政黨政治其實是不健康的，我雖然兩個政黨都不喜歡，但是我非得找一個政黨才能夠選，不然我沒有一個通路去參與。」YK18

提名權之所以成為一個重要關鍵，正是因為 SMD 選制的制度誘因讓政治人物和選民都必須將力量彙整成兩個候選人之間的競爭。在這個誘因結構下，當兩

---

<sup>33</sup> 括號中的文字為作者所加，表示在這段對話中作者提問的大致內容。

大黨提出的政治分歧具有相當影響力下，政黨各自提出一名候選人對決成為地方政治人物被迫順從的規則。以下我分別呈現一位由張派培養的縣議員、一位民進黨幹部，以及一位派系顧問的對話。他們顯然都發現了制度與政黨競爭所造成的上述效應：

「國民黨在單一選區下應該是不敢違紀參選，沒有機會啦。那政黨政治現在在台灣是已經成形了，你要沒有政黨支援，靠派系或個人要跟政黨拼很困難。我之前聽張榮味說，他自己也不敢脫黨，他只有之前縣長那次他敢而已，之後他就不敢了。一個派系要對抗政黨是很辛苦的，所以他們不敢，一定會聽政黨的話。」 YN10

「以前是政黨沒那麼明顯，效應也不強，所以脫黨甚至不用黨選的，是和用黨選的比例差不多的。所以那時候你不提名我，我可以嗆你阿。現在政黨的態勢已經很明顯，是壁壘分明，然後還有一群中間的。雖然決定誰上是中間的，但是假如政黨這塊沒有，你是絕對不會上的。所以以後差不多都要用政黨，不是藍就是綠。」 YD17

「因為席次越多，大家就會覺得不必太計較，你一席、我一席，政黨的意識就不高。但假如只爭一席，那麼政黨就差很多，因為大家知道不是國民黨贏就是民進黨贏。」 YN15

在制度誘因與政黨競爭的重要性上升之下，選民和政治菁英都被迫朝向兩大黨移動。但是政黨競爭當中的核心分歧為何？以及在特定的政治分歧下，政治人物如何選擇連結策略是更為重要的研究議題。以下的訪談內容主要來自雲林縣某個國民黨派系的核心顧問以及一位國民黨前立委，他們在訪談中雖然並不認為國民黨在任何方面展現出的影響力勝過派系組織的動員，但仍然認同政黨在媒體與全國性議題中造成的印象會對地方選舉造成影響。而且，在兩黨對決之下，當對手以其政黨在全國形成的政策爭議加以挑戰時，他們也被迫必須回應，而受到政黨在全國所營造出的政治議題影響：

「政黨競爭在全國普遍造成的影響力，這是在上升，但不是絕對的。譬如馬團隊的執政績效假如很好，那全國對於國民黨的印象就很好。那這個因素是越來越上升的。」 YN15

「其實政黨影響是很少啦，政黨的影響力是在中央黨部還有部會首長，就是中央的部會首長的表現會帶動地方。」YK18

「政策當然有影響力啦，...。假如是 ECFA 這種全國的政策，那當然也會啦，像我就在說這個政策不是不好，但在鄉下地方要找厲害的人來宣傳，大家才能夠接受。在選舉的時候，這個問題一定會被對手提到，民進黨會抓這個一直打，那我們就必須要回應，所以這就變成很有影響力的東西。」YN15

這些訪談的結果搭配調查資料的說法來看，國民黨的政治人物和選民在政黨競爭和制度變遷的影響下，也開始必須改變既有的政治行為模式與連結策略。而以下的資料則進一步顯示雲林縣的社會與經濟逐步變遷對於派系政治人物的影響。

## (二) 社會與經濟的現代化變遷

除了制度和政黨在政治分歧與政策上的競爭，現代化因素也會影響侍從主義連結的維繫。新興的選民在新的教育體制、社會網絡與新的工作環境中脫離了既有的人際網絡，並且能夠透過更多元的媒體與資訊管道獲得採取政治行動所需要的資訊。因此許多受訪者都認為新興世代很難繼續受到派系的影響，甚至連椿腳的自主性也越來越高：

「新的選民，30-40 歲這些人他的獨立自主意識比較強。像老一輩，農會控制的就是老的會員，老化的比較容易控制。新的選民、年輕人，根本不重視派系，他只重視政黨。」YD08

「現在民主意識都抬頭了，你去拜託，人家說好好好，但他心裡想什麼你不能掌握阿，...尤其是年輕人的思想，跟我們也差很多。.....阿年輕人一直出來，會成為一個代溝。那年輕人的想法是依據受教育之後的思想，不受影響的很多。」YN01

「現在重要的是，人的個人主張意識很高、媒體也常常在報，有人就是討厭民進黨或是討厭國民黨。」YN01

「現在的情況就是說大家的自主性都提高了，樁腳的浮動、自主性很大，但還是在。」

YN15

此外，原有的動員組織（或「系統」）也逐漸失去既有的影響力。特別是在農會方面，經過二次金改之後，農會信用部的權限大幅受限。而在失去可以自主分配的財源之後，農會成為受政府監督與補助的機關。在受到財源遭到掣肘，以及農民產品多樣性與商品性提高，不再那麼依賴農會之下，農會的動員能力已經開始逐漸下降，但是類似的情況並未發生在另一個動員組織—水利會身上：

「原本農會可以貸款，那要錢、要動員就很容易，然後還有賣肥料、收購等等。但現在信用部受到中央銀行監督，那農會總幹事說他喊不動了，很難下去動員，事實上也是這樣。」 YN13

「（水利會）這個系統比較鐵票的，像員工、小組長、班長，還有一些地方比較熟、比較死忠的，差不多兩萬票左右。」 YN01

### （三）持續的侍從主義連結策略

上述資料都顯示，在政黨競爭、制度變遷以及現代化因素的影響之下，侍從主義連結的效果正在逐漸下降。然而，雲林縣的國民黨藉政治人物並不認為政黨標籤、政黨的分歧位置和全國性議題是他們連結選民的主要策略。對他們來說，最為重要的，還是以個人和派系經營的組織、樁腳和人際網絡。而在新的立委選制中，雖然選制強化了黨際競爭，但是同樣有誘因促使候選人以自己的經營去努力突破 50% 選票的關卡（盛治仁，2006）。譬如一位前任立委就這麼認為：

「國民黨的部份在兩次（立委）選舉裡面，他沒有辦法讓候選人贏，北部可能有，但在濁水溪以南，政黨只是派系附加的工具而已。」 YK18

「未來假如立委和總統選舉合在一起選，那立委選舉受到的影響會非常的大。那你說選舉制度會不會讓選舉更好選，那也不見得。因為像高雄鳳山市，9 席議員、一個市

長和一個立委的選區都一樣，但立委事沒有資源直接回饋地方，那你覺得說誰的經營會比較好做？」YK18

「以前全縣大範圍的，你靠理念還有，現在沒有這種的...，都要靠人跟人的關係才紮實。其他方式都會怕輸阿，不敢用。」YN13

對於這個情況，一個重要的影響因素是國民黨的政治人物認為國民黨與民進黨選民特質的重大歧異。和上一部分調查資料所呈現的結果相似，政治人物大多認為選民的特質不同，民進黨的選民更為重視政黨提供的意識型態，但國民黨的選民更為重視資源的供給與滿足：

「基本上泛綠選民是看意識形態以及民進黨的旗幟在投票，深綠選民更是明顯；泛藍選民則是候選人傾向就多，選票會跟著候選人移轉」YK06

「（國民黨的）一般選民可能沒有黨籍意識，可是因為地方服務的很好、有資源提供地方選民需要的東西，所以選民很效忠。那民進黨為什麼會崛起，因為他們提供給選民另一個思考的面相，你不一定要選擇國民黨的候選人，你愛台灣就投了。」YK20

而另一個關鍵的因素則可能是現代化因素的影響在雲林縣並不這麼明顯。一位曾經負責執行操盤的無黨籍樁腳就說明，即便是在雲林縣最為都市化的斗六市，較能夠拒絕社會人際網絡影響和侍從主義交換的也只有市中心的住民。而在下表 4-7 中，則顯示近年來雲林縣的職業人口數和相對比例，整體的比例並沒有大幅度的轉變。這些都表示現代化因素的影響相當有限，雲林縣政治連結變遷的出現仍必須仰賴政黨競爭與政治分歧的影響。而當政黨在政治分歧中缺乏明確的位置讓選民辨認時，國民黨和選民之間就很難建立足以取代是從主義的連結關係。

「那你說這種方式會變化，會，但速度很慢。像斗六市，市中心這些可能不必買，他們會自己判斷。但是你看比較邊陲的里，你當然要去買。所以選舉還是要看誰跑的勤，像我們在輔選，就是到處去打探說是哪一邊的人跑的比較多，這樣我才知道該怎麼補。」

YN13

雲林縣就業人口分布表							單位：千人
年度/行業別	農林漁牧業		工業		服務業		總計
2000	85	25.37%	113	33.73%	137	40.90%	335
2001	83	25.46%	101	30.98%	142	43.56%	326
2002	88	26.75%	100	30.40%	142	43.16%	329
2003	84	25.93%	91	28.09%	149	45.99%	324
2004	75	23.58%	96	30.19%	146	45.91%	318
2005	77	23.69%	98	30.15%	151	46.46%	325
2006	70	21.67%	104	32.20%	149	46.13%	323
2007	74	22.09%	112	33.43%	149	44.48%	335
2008	70	21.02%	110	33.03%	152	45.65%	333
2009	68	20.61%	108	32.73%	154	46.67%	330

表 4-7 雲林縣 2000-2009 年職業人口資料

資料來源：雲林縣統計年報（2009）

因此，即便制度和政黨競爭的影響力確實讓國民黨在政黨標籤、政治議題，以及政黨紀律上對選民與政治人物產生相當的影響力。但是在國民黨政治人物的選舉中，樁腳以及候選人平時努力經營的人際網絡，以及透過利益交換在網絡中建立起的侍從關係，仍然是選舉中最重要的連結策略：

「現在立委選舉應該可以說是僅次於總統選舉，是第二高層次的選舉。但是國民黨因素下降是說，立委選舉裡面，候選人對於樁腳和選民的情感連結，他所造成的效果還是比國民黨的影響力大。」YN15

「過去的派系影響力可能百分之百都要靠組織的力量去動員，現在可能是六、七成，只是比較弱，但還是有過半的影響力。」YK09

而且，透過樁腳，國民黨政治人物雖然也在其中包裝了政黨形象與個人提出的政見。但是在下面的訪談資料中，我們可以很明顯的看到最重要的影響力還是

樁腳和選民之間的人際關係。唯有透過人與人之間緊密的人際網絡，其他的影響力才可能發揮。

「立委的話，中間選民、比較難左右的比較多，他會先看人、文宣，但是單純看這個的比率很低，假如有人再來拜託，樁腳有去跑了，那他才會真的認真看。那這樣大概就能掌握3、4成的票了。所以你假如樁腳不夠，那你立委會很難選。尤其是現在選區變小了，對立委就更好跑，你一定要顧樁腳，要有人下去帶，文宣帶著去拜訪。」

YN13

在這個部分，我們已經看到政黨競爭以及新選制的效果。即便是國民黨的派系政治人物，也必須回應制度變遷與政黨競爭激化，以及社會現代化的變遷所帶來的影響。但是當國民黨在政治分歧中缺乏明確的立場，社會、經濟的現代化也並不顯著之下，侍從主義透過樁腳與人際網絡中的人情與各種利益交換的效果仍然具有關鍵的影響力。

因此，在下個段落，我著重的焦點是派系組織內部運作，以及政治人物、樁腳和選民互動的內涵。我將透過對於樁腳活動的資料來說明，雲林縣的侍從主義連結仍然在持續當中。即便現代化的因素正一點一滴地侵蝕依賴傳統社會人際關係建立的侍從網絡，但是在侍從主義邏輯之下，政治人物仍然可能持續適應環境的變動，經營新型的組織來吸引新一代的選民。而假如進一步發展成新的侍從主義組織，則可能會讓現代化論述受到重大的挑戰。因為這代表即便在更為現代化社會中，侍從主義的雙元連結關係仍然能夠在缺乏傳統社會價值與網絡下繼續存在，並且可能發展出新的金字塔型組織，這一點將在第三個段落中繼續說明。

## 二、侍從主義連結：國民黨派系、樁腳、網絡與特殊利益交換

在上一個部分已經透過菁英的訪談說明，即便政黨的標籤形象甚至全國性政策辯論的影響力已經出現，但是雲林縣的國民黨政治人物仍然依賴派系組織和侍

從主義的方式建構出的網絡來與選民連結。在這個部分，我將透過訪談國民黨與派系樁腳或議員的內容，繼續說明這個連結形式的組織與內涵中的侍從主義特殊利益交換邏輯。

在現代化程度仍然不高的雲林縣社會中，透過傳統的社會網絡中的人際關係仍然是重要的連結策略，人際關係的緊密程度往往也決定了投票的穩定程度。下面的訪談資料中，一位農會幹部就說明了人情與人際網絡的效果。透過層層的「關係」與請託，選票的交易是在請託人過去與選民建構的「人情」之下進行。完成了一次交換，也就還了一次人情的「債」：

「我要影響你的選舉行為，我先透過人際網絡嘛，找很多人去請託你。假如三個人都一樣，那支持的可能就比較高。那越地方的選舉，因為關係網絡、交情，越多地方的人會支持。但在總統選舉的時候，因為沒有親戚，我們誰也不會去認識蔡英文還是馬英九，少了一個關係，只剩下朋友請託。然後在加上自己的主見和家裡的影響，那你就會自己抉擇，看哪個因素比較強就去抉擇。」 YK09

「我欠你人情，還一次就還了阿，哪有我欠你一次要一輩子還你的。」 YK09

而在以人情為基礎的人際關係網絡之上，最重要的就是在每個地區都能佈建自己的樁腳。國民黨政治人物和樁腳之間的關係大多是以利益為基礎的。不管是透過地方建設的協助、各種特殊人情請託，或是因傳統喜慶習俗而來的要求。有權力、資源者以其所能支配的各種權力與特殊利益為基礎，去建立其與樁腳之間的垂直關係。Landé (1977) 提出的「二元直接關係 (dyadic direct relation)」概念仍是樁腳組織建構的重要特色：

「打選戰最重要的就是候選人你自己要有系統分出去，這樣才做的出來。像張碩文來到哪一村，那就是要有自己的人，那平常這些人有什麼跟你拜託的，你就要認真去幫他爭取，拓展票源的點越多，要選的時候就越容易。」 YN01

「經營指的是我們要去凝聚大家的情感，把人脈都連結起來，那我們做的方式就是一方面是婚、喪、喜、慶就一定要過去拜訪，表達我們是關懷他的、是有在一起的。那

另一方面就是要有服務，他需要你幫忙什麼，你要幫忙他。然後有建設，像我們安了電燈在誰家門口啦等等，讓他知道，他就會覺得感謝你。」YN15

「XX 會交陪的不只是基層有影響力的仕紳，那些民意代表還有村里長都是非常重要，所以平常就都會走一走，還是說有什麼事情來拜託，那就能夠建立這個關係。那他的團隊，譬如他的秘書、像 XXX，都很認真，平常就把這個關係，組織和社會面，維持的很好、很健全。那他們派系大概就是理念相同，那講難聽一點就是利益，相互照顧。下面假如有什麼需求，他有立法委員，能幫忙他就先幫你忙，這就會成為一個組織。那雲林有縣長就有派系，他資源太多了，像地方建設我就做順水人情，你當民意代表、阿跟我比較麻吉，我當然優先幫你做建設，一方面就是在幫你顧你的選民，有挺你，那你之後當然要幫我。阿另外就是人事的資源，你只要有任用資格，那我當然用我自己的人。這個太多了，你看得到的學校、衛生機關等等，還有人民團體，農會還有其他社團，他都能顧得很好。」YN01

取得具有影響力的職務和擁有經濟資源，是建構上述以利益交換為核心的樁腳體系的關鍵。為了持續特殊利益的分配來維繫交易選票的能力，利用獨自的經濟資源取得政治實力，或是利用政治實力開拓經濟資源都是必然的手段。而在雲林縣，農會、水利會和縣長職務同時具有政治與經濟影響力，能夠透過人事任命和公共政策維繫資源的取得。或許是由於私部門的市場和資源不足，因此在雲林縣，向來被認為選上縣長也就能夠建立一個派系（蘇俊豪，2004）。一旦有了縣長職位，就可以收編追求各種資源分配的各方樁腳，納為自己的人馬。而在縣長之外，最重要的是涵蓋整個雲林縣的水利會組織。由於整個水利會的人事都是由會員直選的會長來調動，因此取得了會長職務也就掌握了水利會大部分職員和家屬的選票。

「（水利會）這個系統比較鐵票的，像員工、小組長、班長，還有一些地方比較熟、比較死忠的，差不多兩萬票左右。」YN01

「雲林的（派系）就很溫和、都是用資源，資源就譬如說你要升官，你一定要找門路。那我做人情給你，你一定要報答，那我之後去找你你就要幫忙。那假如說是用錢買的，他也可能會用一起投資的形式。公家的資源不可能用之不盡、做永遠的，那你就厚植自己的資本、去做事業，像 XXX 就是投資房地產，他官到哪、實力就延伸到哪。

但這些沒辦法跟縣長比，他有行政資源，可以說你不聽我的就不必想升官了，文官也會被影響，然後外面的人就會變他的樁腳。所以派系是這樣生存的。」YN13

「派系差別在於他是國民黨裡面衍生出來的副組織，只是因為他在利益上有君臣關係，所以一般選民可能沒有黨籍意識，可是因為他地方服務的很好、有資源提供地方選民需要的東西，所以選民很效忠他。」YK20

在這個部分，我說明了政治人物佈建樁腳的方式，並且從中說明國民黨政治人物與選民連結的內涵。平日建立起的「人情」、直接的人事與公共資源或經濟利益的交換都是其中的核心內涵，顯見這個連結關係仍然依賴著侍從主義式的邏輯進行。然而，我們在前一段的資料中已經發現，雲林縣傳統的動員系統，以及樁腳所經營的社會網絡，已經開始逐漸在都市化、教育與世代交替等現代化因素下產生轉變。然而，雲林縣的派系也嘗試建構新的網絡，因此下個部分將用來介紹侍從主義在面對社會變遷下，新的社會網絡的建構方式。

### 三、 在同樣的邏輯之下：變遷的社會與新網絡的建構

前文已經提到，雲林縣農會系統在金融制度改革的影响下逐漸失去過去關鍵的影響力，但是對於派系來說，仍然可以透過其他方式彌補。在訪談中，其中一項重要的方式，就是跳脫過去依賴農會總幹事或基層的村里長為核心的正式行政體制所建立的金字塔結構，而尋求其他如理事、鄉鎮代表、或是和該組織親近的人物建立動員的網絡：

「就算總幹事沒辦法跳出來支持他，但不會擋他（指張榮味），他還可以透過很多條線去彌補，看要買票還是用拜託的。那這樣買票是抓不到的，因為不是只在系統裡面買。...他現在複雜是多了很多橫向的聯繫，加上原本直向的。張榮味是平常就有在建構這些。」YN13

此外，為了吸引年輕世代的選票，發展新的組織、舉辦活動以吸納新人納入網絡之中也是非常重要的作法。因此，即便隨著世代的交替以及教育、經濟水平的影響，現代化因素對於政治連結的策略不見得有太大改變。侍從主義策略仍然能做出許多適應性的調整。例如在下述第二與第三段訪談中，這位偏向國民黨的樁腳就說明他正在擔任榮譽理事長的新組織的經營方式，企圖將新的世代納入既有的侍從主義分配體系，繼續透過人際網絡的經營來鞏固選票：

「年輕人的想法是依據受教育之後的思想，不受影響的很多。所以像政治世家就要找接班人，把年輕人拉進來。那組織方面，你也會成立一個青年部，辦一些活動來吸收青少年，這很重要，現在選戰裡要分很多系統來處理。但是現在即便是在水利會裡面，年輕人很多也是很難影響的，所以年齡層的鬆動是有的。」YN01

「那國民黨就是很多組織和社團，會有定期的聚會和活動。譬如說斗六市 XX 會就會吸收年輕人，辦活動，那到選舉時就是透過這些人來動員。」YN13

「所以現在都要轉換方法，變成用青商會、獅子會一樣，用訓練的，找年輕人出來，幫他找錢然後讓他辦活動，讓他累積人脈、讓他們了解國民黨的理念，那之後這些人脈就會很穩固。」YN13

#### 四、小結

在上述的資料呈現下，我們可以發現雲林縣國民黨政治人物當前主要的政治連結仍然是以派系組織的動員，利用平時的人情、服務甚至關鍵時刻的買票，等等特殊利益的交換取得樁腳與選民的支持。雖然在國民黨的派系政治人物與樁腳的談話之中，我們也可以發現政黨在全國競爭所產生的影響力，例如意識型態與政策的辯論，以及年輕世代出現等現代化因素產生的效果。但是，這些政黨在全國性政治中營造的連結內涵，對於雲林縣的國民黨政治人物的影響似乎相當微弱。這雖然迫使派系政治人物必須在提名與某些政治議題上順從政黨的要求，但是並

不妨礙地方派系運用侍從主義建立起政治連結與勝選能力。當我像受訪者詢問到張派目前的思維時，某位前立委就直言：

「他要的是國民黨在地方的代理權，他要不管中央是誰，你到地方就是要文官下轄，其他縣市是不容易做到的。」YK18

這表示即便派系在新的制度框架下已經無法脫離政黨運作，但是透過侍從主義的連結關係中所具備的「直接關係（direct relation）」特性，派系政治人物並不需要擔心政黨的影響。因為當政黨無法透過政治競爭塑造出足以取代的連結關係，在勝選壓力與難以取代的侍從主義連結下，政黨根本無法拒絕派系。

而且，在上述資料中也發現，SMD 選舉制度造成的效果則並不全然是正面的。在缺乏替代方案下，要求過半的制度誘因也同樣要求政治人物必須以特殊利益回應沒有政黨取向的選民。甚至當社會的現代化變遷給政治人物倚賴的社會網絡帶來了許多改變，政治人物也可能順應這樣的變化，採用不同的策略或發展不同的組織，並且繼續利用侍從主義的特殊利益交換邏輯在其中吸納新的成員。因此，正如本文在緒論與文獻回顧中不斷強調的，關鍵的問題在於：以利益交換為核心的侍從主義該怎麼被取代？

總和上述的訪談與調查資料，我發現政黨競爭對國民黨政治人物的影響力有限的原因之一，很可能是國民黨選民在主要政治分歧上的位置並不明確。當政治人物發現選民並不受到政黨所營造的政治分歧所影響，或是影響相當薄弱之下，政治菁英也就選擇繼續以侍從主義的方式確保選票，政黨也更難以對地方派系產生更進一步的實質影響力。而相較於國民黨與選民之間相當不明確的連結內涵，我們從選民的調查資料結果或是政治菁英的訪談，都能發現民進黨政治人物和選民之間存在著以「台灣人認同」為核心的連結內涵。這個比較使得上述的論證更明確，也更能擺脫現代化因素的左右。因此，接下來我將把焦點移轉到民進黨政治人物的訪談內容。

而分析訪談資料的結果發現，民進黨的政治菁英雖然強調「本土」、「清廉」、「愛鄉土」等等，包含了認同「情感」與「共識性議題（valence issue）」的「理念」，但是仍然並沒有建立出具有位置性的普遍性政策來吸引選民。而且無論是在政治菁英之間，以及政治菁英與選民之間，在涉及利益分配時，仍然更偏向選擇以特殊化的利益作為分配或交換的內容。透過這些資料，我更進一步佐證了本文提出的核心論證：正是因為政黨政治中核心的政治分歧，統獨與族群認同分歧，是一個切割了多種社會分歧的政治競爭，因此無論是面對認同於己黨的選民或是沒有政黨傾向的「中間選民」，都難以產出得以替代侍從主義的另一種利益代表與分配模式，而只能繼續與侍從主義共存。

## 參、 認同連結中共生的特殊利益分配與共存的侍從連結

### 一、 民進黨「政黨認同連結」的內涵

在上一節中我呈現了國民黨政治人物與選民間連結的特質。由於國民黨的支持者在政治分歧中的位置並不明確，因此雖然政黨的偏好者持續增加，但是在選民的立場並不明確下（或是政黨的位置也並不明確），國民黨的政治人物仍然運用侍從主義的特殊利益交換策略來連結選民。然而，對於民進黨的選民來說，他們更加依賴政黨在認同上的特定標籤來進行投票，而在訪談資料中的政治人物也傾向透過政黨標籤來和選民連結。民進黨和國民黨政治人物與選民間的差異說明，「政黨標籤」確實在雲林縣的低度現代化下產生顯著的影響。而這個政黨標籤的內涵，正如我們在第一節的調查資料所呈現的，是以認同為基礎的情感因素所建立起的「政黨認同連結」。除此之外，廉潔、勤政、愛鄉土等「共識性議題」，也是民進黨標籤以及政治人物連結策略的重要內涵。

「民進黨有兩個核心價值，一個是清廉，一個是本土意識。」 YD02

「民進黨都是用街頭運動、示威遊行或是大型演講會，這就是用理念，讓你頭腦裡面有這些觀念。尤其是台灣現在還不是一個正常國家嘛，這很多人在關心。所以這是兩種不同的選舉。」 YD16

當政黨開始透過在特定政治分歧上的爭辯吸引選民，選民對於政黨標籤的認識與支持不僅對個別政治人物採行的連結策略發生影響。更重要的是，正如同 Hagopian (2009) 與 Kitschelt (2010) 在拉丁美洲所得到的研究結論：當政黨競爭形成一個顯著的核心主張，並且成為吸引選民的主要連結方式時，政黨內部組織的團結、黨紀的影響力和選民對於政黨標籤的連結，會形成一個不斷強化的循環。在以下的訪談中，我們可以看到民進黨的政治人物在以「本土意識」和「清廉」為核心的政黨標籤之下，已經能夠在某個程度上定義出「政黨的共同利益」，也看到了「選民」和「黨組織內部」的因政黨標籤而產生的課責。

「民進黨就是要靠他的那隻旗子，所以他們平常鬥爭，選舉的時候就沒了，他們厲害就在這邊。他們的選民比較看黨、不看人。」 YN10

「對民進黨來說，假如這是整個政黨的共同利益那就必須要合作，不然事後會被選民和黨內檢討。」 YD11

## 二、 政黨認同連結下「共生」的利益分配：「樁腳」的不同面貌

### (一) 理念的樁腳

然而，即便是在這樣以政黨標籤和全國性政治分歧為核心的政黨認同連結下，民進黨仍然必須佈建樁腳組織。這麼做的必要性在於利用樁腳在重視人際關係，

並且較少吸收大眾傳播資訊的農村中散佈政黨理念。因此，在多數的訪談中，受訪者都認為樁腳的核心工作是成為理念的載體，負責幫政治人物做意識型態上宣傳，進行「政黨認同連結」中認同「情感」和共識性的「清廉」等理念的交換：

「民進黨立委是這樣，假如要選舉的話你在各個村裡都要有自己的人，這些人就是要幫忙宣傳、分宣傳單，不然你傳單不知道要分到哪裡去。假如你要去辦演講會，那他要幫你找人。所以都要有人脈阿，不然你去沒有人聽你講，他就是幫你找人出來接受理念。」 YD16

「組織戰裡面也是這樣，因為你不是要來賄選買票的，所以你也回來空氣戰，用這些東西下去把你做過什麼、做的怎樣，用好的方式包裝出去。樁腳他們就是工具，這樣說比較不客氣，你要先讓他們認同、讓他們會講話」 YD22

由於多數民進黨樁腳倚賴的是對於政黨核心理念與意識型態的認同，因此他們可以不必接受任何餽贈，甚至主動出錢、出力來幫忙。這和國民黨的派系組織中在侍從主義下「以利益交換樁腳支持」的邏輯並不相同。

「民進黨的動員基本上是靠底下的支持者主動，沒有辦法像國民黨有錢可以請車子、發便當，甚至是給鐘點費。其次，在動員的樁腳上，兩個政黨也有所不同。民進黨的樁腳出自於對黨以及候選人的「認同」，會主動幫忙；國民黨則不同，除了候選人跟樁腳交情要夠，還必須要有「樁腳禮」，另外樁腳跟候選人之間也會講條件，雙方存在交換關係」 YD07

而且，在透過認同的「情感」與「理念」交換的政治連結下，即便樁腳受到其他人的影響而有意左右選民的行為，也不見得能夠撼動選民的支持。由於選民和政治人物與樁腳之間是透過情感與理念進行「交換」與「課責」，因此相較於替代性較高的「特殊利益／選票」交易，選民與樁腳擁有更高的自主性：

「民進黨跟地方的關係不是用錢去處理的，所以就是要靠經營跟理念去得到選民的肯定。」 YD14

「國民黨為什麼派系影響力會贏過民進黨，因為民進黨靠的就是這塊招牌。即便你不支持蘇治芬，但你的影響力有限阿，你能影響的就是幾個朋友，但大部分選民還是靠民進黨。那派系就不同，假如我是派頭說不支持你，那我影響力就至少有六、七成。所以同樣反對，結構不同，影響力就不一樣。」YK09

## （二）與政黨認同連結「共生」：資源分配中的樁腳

然而，在政黨認同連結下的「情感」與「理念」的交換並不具備利益分配的內涵，但是政治卻不可避免地處理公共資源分配的問題。而在資源分配的層次中，民進黨的政治人物在族群認同的分歧之下，除了情感上的族群認同外，強調的是偏向共識性的「廉潔」與「勤政」。且在橫跨了其他分歧之下，難以產出具有位置性（position）的特定分配政策，因此仍然缺乏具體策略來取代既有的特殊利益分配模式。當選民有眾多的資源需求必須得到滿足，而這些需求又無法在政黨競爭中整合成具體的政策，或無法在共識性的政策中被滿足時，就很有可能是以個別分配的「特殊利益」方式來進行分配。在訪談的過程中，雖然民進黨的樁腳是在理念上和政治人物與選民連結，但他也和國民黨的樁腳一樣，扮演了特殊利益的中介角色。

下面的說法來自某鄉鎮的民進黨基層樁腳。當我向他問到立委平常和他們的互動時，他很明確地表達這位委員首要的優點：「很好的服務」。而這些服務，不僅是針對中間選民的需求，民進黨的選民也同樣希望立委來跑紅白帖、傾聽他們的需要，來顧及他們的「面子」以及日常生活中的其他需求。為了應付這些需求，這位立委擁有 14 位有給職的秘書，以及各個地方的樁腳。

「他有無形的組織阿，他服務做很好，好事、壞事（紅白帖）都一定會到，尤其他喪事跑很勤，有的會去到兩次以上，有時還會待到晚上。...他很勤快，手機沒在關的，只要有打電話給他他都一定會回。然後他又很有理念，很清廉，很多人說要送禮給他或給他秘書，他們都說絕對不能拿，大家欠他人情就一定會投給他。」YD19

「常常喔，有時候一個禮拜回來兩三次。但平常主要還是他秘書在做服務拉，他有十四個有給職的秘書，我們算是沒給錢的拉。」 YD19

這個資料說明，即便是在透過情感認同而連結的民進黨選民中，也同樣需求資源分配。而民進黨的政治人物所依賴的分配模式，有很大的一部分仍然需要透過個別分配的方式來進行分配。而當這樣的分配需求與供給產生，政治人物和選民之間建立起的交換關係雖然沒有撼動更高層次的政治連結，但是也影響到了黨內的競爭。

當我向這位提問當初競選時的另一位黨內對手時，他很明確的指出，這位候選人的弱點就在於沒有回饋資源給自己的故鄉。我們可以發現，即便在政黨認同連結下，不同政黨依照政治分歧中不同的位置所建立起的政治連結，並不容易受到派系的侍從主義誘因影響。但在同一個政黨標籤之下，由於不再具有理念與情感上的區別，「共生」於情感連結之下的特殊利益分配與交換，成了左右選民與樁腳政治行動的關鍵因素：

「他在中央當官當那麼久，他有服務到、建設到地方嗎？初選那時候他的故鄉的二崙鄉長就帶人出來反他了，說他一個建設都沒做、沒有照顧地方，誰要支持你？...在提名的時候，蘇治芬就在這邊說要提名李應元，我們很不服，當場幾千個人就說你不支持他我們就要翻了，縣長也不會投給你。」 YD19

這些資料顯示，認同於民進黨的選民一樣需求資源的分配。而且這樣的分配模式則隱含著政黨內部因為資源分配而可能形成的衝突，以及內部的侍從主義關係。因此，我們在第三章的背景介紹中可以發現，當民進黨需要擴大其基礎時，必須同時面對內部與外部的資源需求與不滿。民進黨政治人物之間的連結關係這個部分，我會在第四個段落繼續處理。而以下，我將繼續介紹民進黨樁腳組織的建構模式，以呈現出樁腳在「理念交換」之外的「利益交換」面向。

在下列的訪談中，我們透過一位縣府主管的說法，可以看到民進黨政治人物建構樁腳組織的邏輯。這和 Landé (1977) 提出的「二元直接關係」概念有許多

相似之處，但是卻又有所不同。在民進黨的樁腳佈建中，上一級樁腳與下一級樁腳之間有著明確的資源、能力的差異，然後以垂直的方式連結起來。但不同的是，民進黨的樁腳之間建立並不一定是「直接（direct）」關係，而是更多意識型態的影響。樁腳們是以意識型態來聯繫，因此也就可能出現了某種「共同的成員身分」，分享共同的利益，並且有更多的水平聯繫，而非侍從主義強調的「二元垂直連結」。

「樁腳是一個金字塔結構，就像直銷的上下線，或是會員這樣，一個人往下拉幾個，然後一直往下。在操作的時候，我們上面都會有頭，然後下面再在各個村莊找幾個人，裡面會有衝的，也有士紳這樣。然後他會在下面再找種子部隊，跟他宣傳理念。然後每個人下面再找幾個人，變成耳語部隊。再下面就都是出來衝的。那這些都是一層一層的，不可以越級，立委到一個村莊不可以直接下去找下面的人，至少一定要有那個頭在場，不然他會去跟他同級的人炫耀，說我跟委員很麻吉怎樣，那就容易會出事。」

YD22

然而，在另一面，民進黨的樁腳中也有以利益交換進行連結的樁腳。這是為了吸取更多的選票，政治人物也必須依賴依循侍從主義邏輯的樁腳，單純依賴服務、建設或特定的特殊利益的分配建立起彼此的連結，而當資源不復存在，彼此的關係也就隨之毀滅：

「樁腳可以分成三種人，一種是理念型的結合，這裡有的是地方士紳，阿那個都是形象的，他不喜歡跟你衝來衝去，就是支持你。另外的是出來衝的，就是很有行動力，陪你到處拜訪、到處罵人的那種。這種理念型的不大會跑，找到的選票也是最多。第二種是利益結合的，他會跟你要服務、要建設，有餐會什麼的他就找人來插一腳。這種樁腳流動比較快，他看你不給他一次兩次就跑了。第三種是中間選民，他是看你做的好不好或是理念好不好，他再選擇支持你。」 YD22

這樣的樁腳的出現，顯示民進黨不僅依賴認同政黨標籤的選民，也必須追求對政黨沒有既定認同選民的支持。而在以下的訪談中，我發現無論是在 SMD 選制下競選的縣長、立委，或是在 SNTV 制度下的縣議員，他們都必須面對一群

沒有政黨偏好的「中間選民」與樁腳。而為了讓他們投票給民進黨候選人而取得勝選，民進黨政治人物必須讓侍從主義連結「並存」於政黨認同連結之旁。

### 三、與認同連結「並存」的侍從主義連結

#### (一) 追求勝選的策略

對於民進黨政治人物來說，佈建樁腳深入社會網絡的另一個重要理由是政黨競爭所形塑出的政黨標籤的有限性，以及選舉當中擴大政治基礎、追求勝選的誘因。選民並非全然受到政黨競爭的影響，因此當沒有政黨偏好的選民需求利益的分配，而政治人物又缺乏有效的政策作為交換利益的替代方案時，就必須透過樁腳以及侍從主義的特殊利益交換方式，取得中間選民的支持。而尤其是在下述第三位曾任立委的受訪者的說法中可以發現，當 SMD 的選舉制度要求過半數支持時，以樁腳建構出特殊利益交換的連結對兩黨候選人都有著極大的影響力：

「整個基層有政黨取向的大概是各三分之一、中間選民也三分之一，可以被影響的是中間選民。...那當然這中間有人情世故，還有金錢什麼的誘惑影響，所以得票會跑來跑去。那他們買票也是買這裡。」 YD23

「(新選制)<sup>34</sup>對民進黨不利的就是過去因為在立法院問政，因此不能常常跑回來婚喪喜慶的立法委員因此落選。」 YD14

「小選區要改變選舉最重要的就是錢和人嘛，四成的選票下，錢多就可以找到人，錢多也可以改變人，把你樁腳挖走、叫他當閒人你就輸了。...社會裡面很執著的人是少數啦，常態是中央這塊最多，他們都是沒什麼決定的。」 YD02

---

<sup>34</sup> 括號內文字為作者自行標註。

以下的訪談讓我們繼續看看另一位目前正在縣府內工作的局處首長，以及另一位前立委的看法。很明顯地，對他們來說，取得沒有政黨信念民眾信任的重要方式，就是建立政治人物和民眾之間的直接交換關係。一方面是讓他們理解民進黨有能力「做的更好」且能夠不收回饋，另一方面則是透過傳統價值中的「人情」包袱。但無論如何，這些方式都更接近以「特殊利益交換」的方式來和選民構成連結關係，而不再是透過「理念」或是「共識性政策」來進行分配與選票的交換。

「應該是說人情啦，他比較說國民黨執政跟民進黨執政，結果民進黨的服務比較好，不是說什麼錢的往來，尤其是鄉下人很惜情。另外一種就是服務阿，譬如說他去幫你處理什麼事情，或是法律上的問題需要律師阿，他就幫你貼一下，或是勸你一下不要花大錢去打官司，這些都是人情。」 YD22

「真正要能拉攏選民就是要服務啦，那我的服務是真的要幫你解決問題，不是去參加喪、喜事。那國民黨就是抓頭，一大串粽子一樣。那民進黨的困境就是這樣，只能個別服務再把口碑傳出去。所以我一直強調民進黨公職就是要強化他的法律知識，這樣服務才會很廣、實質。」 YD05

而由於必須以特殊利益分配支持者，又必須以特殊利益爭取中間選民的支持。民進黨政治人物在有限的資源下，也就必須面對分配上的兩難。在以下的資料中，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兩難的局面，和民進黨以「情感」為基礎建立的「政黨認同連結」的特殊之處。儘管政黨支持者同樣需求特殊利益的供給，但在利益和認同權衡之下，支持者選擇的是情感面的認同。這不僅凸顯出兩種連結模式的關鍵差異，政治人物也因此具備了更多自主性，來交易特殊利益以追求勝選。

「所以我們挺很多民進黨的議員也很無奈，很多服務案件送上去，他認為說這是自己人的，慢慢來沒關係。...他後來跟我解釋說，阿我就想說你是我自己的阿，自己人。所以我之後選你也是一定挺我的，你跑不掉，一定挺我的嘛，所以我幫他幫忙看他之後會不會挺我。」 YD17

在兩種截然不同的連結對比下，我們可以發現，政黨認同連結是不涉及利益交換的「情感認同／選票」交換關係。政治人物和選民的交換來自「情感」的認

同，而利益分配只是因為連結中缺乏資源分配的內涵而「共生」在連結之下。當問題涉及政黨之間的「理念」差異，情感的認同可能凌駕於利益的誘因之上。但在另一面，和中間選民之間的侍從主義利益交換的連結，則是同時「並存」在政黨認同連結之側，單獨地在認同連結不能及之處行使著交易選票的功能。

這樣的情況也就是在上一章中所提到的，民進黨縣長面對著「分配困境」。在政黨政治分歧使得具體的分配政策難以產生而缺乏其他替代方式下，民進黨要快速擴大政治版圖，除了繼續強調理念與清廉，更必須透過分化、吸收對手在地方根深蒂固的樁腳與派系政治人物來繼續獲取選票。然而，吸收的策略卻也只能透過侍從主義式的交換來進行。而同時，民進黨政治人物仍然必須維持對黨內支持者一定的資源分配。在資源有限下，形成了左右為難的「分配困境」。為了對民眾進行分配與交換以滿足黨內支持者和中間選民對資源分配的需求，民進黨內部政治人物也會和國民黨派系政治人物一樣，有著對於特殊利益的需求。這樣的結果，很可能讓黨內政治人物之間，也形成侍從主義的交換關係。

## （二）特殊利益的需求與民進黨政治人物間的侍從主義連結

在上一節當中，我們介紹了國民黨的派系組織。在派系當中，下層的政治人物為了向樁腳與選民輸送特殊利益，因此必須向上層進行侍從主義的雙元結合，以取得特殊利益的供給。而在民進黨的上述資料中，我們已經發現，即便在選民對於政黨間的政治分歧也具有明確的認知下，民進黨政治人物可以依賴建立在情感層面的政黨認同連結來交換選民的支持。但是，當民進黨政治人物面對選民的資源分配的需求，仍必須分配選民所需要的各種特殊利益來進行服務和建設。甚至，在擴大版圖的目標下，也利用特殊利益來交換樁腳的支持與選民的選票。此時，民進黨內部也會對更具資源分配能力的上層政治人物，形成對可分配的特殊

利益的需求。黨內政治人物之間甚至可能會以侍從主義式的連結關係結合，以資源交換政治支持：

「當然有的有自己一掛的，像劉建國的好央甲，他就有培養自己的議員、代表、村里長一個脈絡，那就是他的樁腳、幫他顧基本盤，他每次選舉都可以操兵一次。這樣有效率，但是會得罪同黨的人，變成全部都是他的。」YN13

「形成派系一定要有縣長、有資源，照顧很多人、有很多人脈才有派系。那你當八年，假如你會選人，不要選到那些給他多少都不會理你的，有這方面的經營，那你八年之後就有一定的力量了，那你就會形成一個系統。假如平常有互相、有照顧到，人跟人情份有到的話就一定相挺，他知道你來做對他有好處，他就一定會挺你。然後他們都要找一個立足，現在兩邊在選縣長我相信現在就在選位子啦，說選完你就來做什麼，這樣大家都有共同的目標才會奮鬥，有資源分享就會有力量。」YD02

在這樣的體系下，擁有更大資源分配能力的政治人物甚至透過資源的連結與交換，建立起以利益交換為核心的「派系」或「山頭」模式的政治聯盟。在尋求擴大支持基礎，但卻缺乏取代個別利益分配的策略下，政治人物之間的侍從關係，成為雲林縣政治發展的隱憂：

「有的人是希望政黨擴大，有些人是希望自己當老大。所以你之前有聽過 XXX，他們的作法就是 XXX 大於民進黨。他們不是民進黨、是國民黨，所以我跟你栽培你欠我人情，你是我的家臣阿。我怎麼要挺黨呢，我挺黨你又不是我的，你還是會被政黨約束阿。」YD16

「阿現在 XXX 也一樣阿，XXX 現在都在建設小公園你知道嗎，鄉村綠美化。對阿，那你和沒關係的人，報上去，他要給你嗎？阿和他有關係的人，你報上去，很簡單就下來了，這也是經營地方、經營派系阿，一樣的意思，這永遠都不可能改變。」YD17

「你其實只要丟一點出來大家就會去形成一個派系。像現在你說 XXX，他有派系嗎？他的派系也很明顯，儘管他的個性是他不想要有派系，但是他坐這位置自然就會有人靠過去、有人跟他討，他不經營也會有人幫他經營阿。」YN13

在上述民進黨的受訪者資料中，我們可以看到兩個因素共同影響著民進黨的連結方式。首先是民進黨本身具有高度的統獨與族群認同意識型態內涵，因此能

夠維繫高度的「政黨認同連結」，並且繼續利用「共生」的特殊利益分配，滿足政黨認同連結下選民對資源分配的需求。但是在另一方面，當民進黨在地方積極尋求擴大政治基礎之下，單一選區制度雖然可能強化了政黨競爭的傾向，制度誘因卻會迫使政治人物必須以服務和其他利益來換取選民支持，而使得侍從連結能夠與認同連結「並存」。

而最重要的是，在整個訪談過程中，我發現到民進黨在「政黨認同連結」下，並沒有建立起另一套合理的分配模式來取代侍從主義的分配效果。選民和政治人物仍然將個別的「服務」與針對地方的「建設」，作為吸引選民支持的核心策略。在缺乏其他政治目標（stake），而台灣當前的政治分歧又傾向於切割其他分歧之下，政治菁英也沒有動機去組織選民進行集體的利益表達。因此也維繫了特殊利益供給的資源分配模式，以及強調優質、清廉的共識性議題。這樣的限制，讓個別利益分配與侍從主義在民進黨的連結策略中繼續持續著。

而且，在服務、建設以及各種人事與特殊利益的需求之下，侍從主義的連結關係甚至也同樣發生在甚至民進黨政治人物之間。因此，問題的關鍵不只在於選民需求的變動，也不僅在於制度或政黨競爭的強度，更在於政黨競爭的政治分歧本身的限制，才足以解釋民進黨與選民連結中出現的特殊現象。

## 肆、本章小結

在本章中，我對於第一章所提出的研究問題與第二章提出的主要論證，在實證上進行回應，並且連結到第三章中提到的現實發展情況。我的策略是先透過調查資料觀察選民是否在政黨競爭所產生的主要政治分歧上和政黨產生連結，其次再透過菁英訪談資料中政治人物的連結策略來和調查資料相對應，並且進一步為我的主要論證提供證據。

在調查資料中，我們可以發現雲林縣具有特定政黨偏好的選民在不同年度的資料中不斷增加，而且在追蹤資料中也顯示這樣的偏好態度具有相當的穩定性。具有政黨偏好的民進黨選民很清楚地在主要的認同政治分歧中，選擇了「台灣人」的認同位置，並且在不同年度的資料中有趨向極化（選擇「都是」者減少、「台灣人」者增加）的趨勢；而國民黨的支持者雖然也出現選擇「都是」者減少的現象，但是確並未在選項中出現明確的分歧位置。因此，在缺乏明確的認同目標與政黨標籤下，國民黨選民的投票行為也相對並不那麼穩定。

而在菁英訪談中，我也確實發現，對於國民黨的候選人來說，儘管受到新選制與政黨競爭的壓力，但是在選民對於政黨間提出的政治分歧態度並不明確之下，透過經營地方樁腳與選民交換好處仍是核心的連結策略。而且即便在緩慢的現代化變遷的壓力下，也可能不斷地適應新的制度與社會條件。即便支持者和政黨提供的政治分歧與標籤產生更緊密的連結，而民進黨政治人物也確實更加強調認同的「情感」與各種「理念」來維繫樁腳與選民的政治支持。但是，民進黨的政治人物在缺乏可取代「特殊利益」模式的分配策略下，仍然無法完全取代侍從主義和特殊利益在政治連結策略中的重要性。

綜合整體資料來看，政治人物與政黨之所以缺乏取代侍從主義的策略，首先是因為政黨沒有在主要分歧上建立明確的位置，使得選民難以透過特定的政黨標籤來選擇政治人物。其次，即便在選民和政治人物之間在族群認同分歧下建立起明確的政黨認同連結，但當政治人物和選民之間的連結關係是以族群情感與共識性政策為基礎，也就仍然必須透過特殊利益分配來滿足選民對於公共資源的需求。因此，當分配普遍性利益的位置性政策難以出現時，特殊利益分配和共識性的政策就一起「共生」於政黨認同連結之下。因此，我們在訪談資料中，看到基層樁腳與選民仍然需求各種服務和建設，來滿足在資源分配上的需求。

第三，由於 SMD 制度的影響，民進黨的政治人物在追求擴大支持基礎與勝選之下，就必須取得沒有政黨傾向的選民與派系菁英的支持，因此必須使用更多的特殊利益交換選票支持，因此形成了與認同連結「並存」的侍從連結關係。而

在這些現象之後，根本的問題在於主要政黨在台灣族群政治分歧之下，無法提出足以取代特殊利益的普遍性分配政策。所以在第三章的敘述與本章的訪談資料中，我們也確實看到，民進黨的政治人物更積極地拓展樁腳、擴大對所有選民的服務以滿足選民的需求，而不是嘗試組織選民形成普遍的利益。甚至，民進黨政治人物之間，為了滿足特殊利益需求的分配，也必須向上連結擁有更多資源的政治人物。這甚至可能在黨內形成類似派系的金字塔組織。

而在第三章呈現的資料中，我們也確實發現民進黨籍縣長蘇治芬目前的政治企圖：他希望能透過資源分配的方式拉攏中間的樁腳與派系政治人物，以擴大民進黨在雲林縣的版圖，並試圖透過吸納派系菁英分化地方派系。但當政黨無法提出足以取代侍從主義的連結策略，縣長的資源分配在既有的特殊利益需求下，只能繼續透過在黨內外分配更多的利益來取得支持。但在有限的資源下，當他面對黨內、外都不斷升高的分配需求時，許多的報導與我的訪談資料都說明，他的分配模式更傾向以特殊利益的分配與侍從主義的連結，來交換黨內外政治人物、樁腳與選民的支持。

這些資料證據佐證了我的核心論證：認同的分歧切割了其他分歧，使得主要政黨無從提出具有競爭力的區辨性（**position**）政策，只能繼續讓特殊利益分配作為意識型態下的輔助策略，甚至成為主要的政治連結策略。

## 第五章 結論

當新興民主國家才逐漸鞏固，但先進民主國家卻遭遇經濟與內政上的困境而面臨新的威權國家典範的挑戰時。民主體制如何導致穩定又具有效率的政府，甚至如何可能產出更好的行政與經濟表現，成為關鍵的問題。而制度化的政黨體系、「負責任」的政府以及有效的課責機制，則是導致有效的政府體制的重要條件。本文研究問題的開頭是源自於這樣的一個關懷：在民主國家中，能夠有效監督政府的課責機制為何？這個課責機制又為何難以產生？

在台灣的民主政治中，地方派系是長期令人詬病的問題。地方派系所操作的侍從主義政治型態，長期利用地方社會網絡與農會、水利會等動員組織，透過人情關係與利益交換的方式交換選票支持。而當侍從主義成為政治人物和選民之間主要的連結型態時，選民對於政治人物的課責就難以聚焦在公共政策的優劣，而是透過政治人物和個別選民或團體之間的利益交換來進行投票（Kitschelt & Wilkinson, 2007）。民主政治在侍從主義的邏輯下，也就很難產出好的政策結果，很可能出現買票、貪汙、黑道介入選舉與公共政策等等問題（趙永茂，2002）。

在既有的侍從主義的研究文獻中，學者大多指出侍從主義關係對於社會網絡（social network）以及某些傳統價值的依賴，因此才能在缺乏制度的保障下，建立與維持政治人物和選民之間的特殊利益交易（Kitschelt & Wilkinson, *ibid.*; Wu, 1987）。因此，多數研究也將解釋侍從主義變遷的焦點，放置在經濟的發展與社會體系的市場化、都市化，以及政治場域的自由化與民主化等等面向。企圖透過對選民在需求面對於利益需求的改變，以及政治菁英在利益供給上的短缺，或是選舉與政府制度的限制來解釋政治連結與課責機制的轉換。

然而，本文認為政治人物與選民間連結關係的建立，除了必須考量上述需求面與供給面的變化外，另一個重要的因素是政治菁英是否能提出取代侍從主義的這種「利益分配模式」的替代方案。而政黨之間的競爭與政治分歧，正是產出新

的政治目標與連結策略的重要政治過程。因此，具有不同特質的政治分歧差異也應該成為研究上的重要變項。而本文的核心論證就在於：當政治菁英之間的政治競爭無法聚焦在分配性的政策上，甚至其競爭是妨礙這類政策的出現時，政治菁英將因此難以擺脫既有的侍從主義分配方式。侍從主義以及以特殊利益進行分配的資源分配與選票交易，很可能在地方上繼續與全國性的政黨政治同時存在。

## 壹、政黨競爭、制度變遷與雲林縣的政治連結

以農業為主，且人口持續外移與老化的雲林縣較不受到現代化因素的影響。但是雲林縣卻從 2000 年以前，一個由國民黨與地方派系完全佔據選舉優勢的縣份，成為民進黨在全國性選舉中重要的支持據點。而我獲得的資料也顯示，全國性的政黨競爭顯然對於雲林縣的選民造成相當大的影響。本文在 2009 年縣長選舉後進行的 TEDS 調查資料中也發現，雲林縣具有政黨偏好的選民比起 2005 年的調查資料有明顯的增加。而雖然國民黨的支持者在主要的認同分歧上缺乏明確的位置，顯示國民黨本身在認同分歧中的模糊特質。但是民進黨的支持者在該年度的資料中，則趨向極化地選擇以「台灣人」做為其族群認同的標的，而政治人物也從本土意識、清廉等「理念」和選民連結。這顯示全國性的政治分歧是影響雲林縣民進黨選民和政治人物之間連結關係的重要因素。

然而，本文取得的訪談資料卻又進一步顯示，在越來越明確的政黨政治發展中，政治人物也並沒有放棄侍從主義的連結策略。即便是民進黨的政治人物與支持者，也是透過特殊利益的方式來進行資源分配。而且，為了擴大與鞏固支持的基礎，政治人物也利用特殊利益和中間選民交換選票。選舉制度的因素雖然強化了兩黨競爭的發展，但並無法促使政治人物改變連結選民的策略。政治人物在這個制度下，甚至使用更多特殊利益追求游離的政治菁英與選民的支持。

整體來看，我的訪談資料顯示，不僅國民黨的政治人物在選民對政治分歧缺乏明確立場下，仍然持續既有的強調人情、社會關係網絡與利益交換的侍從主義交換策略；民進黨的政治人物在缺乏取代特殊利益分配的政治目標與分配政策，以及選民對於服務、建設等種種特殊化利益的需求下，也必須透過服務與建設來滿足選區內選民的要求。在一位立委的樁腳口中，我們得知某位立委級政治人物光在選區內的九個鄉鎮中就有 14 位有給職的秘書協助進行選民服務，這還不包含他在選區中的樁腳和其他活躍的支持者，顯示民進黨政治人物對於透過分配特殊利益來鞏固選民支持的重視。此外，當民進黨企圖擴大與鞏固其支持基礎時，也是透過侍從主義的利益交易來換取地方政治菁英在選舉時的支持。因此，當民進黨政治人物透過以族群認同的情感訴求取得選民支持的同時，特殊利益的分配模式也「共生」在政治連結之中，以彌補情感連結中不足的資源分配內涵。而當民進黨企圖擴張政治支持者的版圖時，侍從主義的交換策略成為主要的連結策略，和族群認同的連結「並存」。

這樣的政治現象一方面可能受限於雲林縣社會與政治結構。雲林縣的現代化程度不僅較為落後，同時也長期受到派系政治模式的影響。就如同民進黨中的一位縣府局處首長說的：「人民的自覺性還不足」<sup>35</sup>，因此無法擺脫以「人情」交換選舉支持的連結模式。此外，在威權體制的長期控制與侍從主義派系網絡的影響下，選民也很難迅速地改變利益表達的組織方式，因此特殊利益分配模式與侍從主義的政治現象也受到歷史遺緒（legacy）的影響。而在另一方面，民進黨出現的侍從主義現象也可能是新當選的縣長蘇治芬，亟欲分化派系以維持民進黨在地方辛苦取得的執政優勢，因此積極地吸納地方派系菁英的支持所導致。

然而，在複雜的諸多變因之中，我們應該注意到當前影響著雲林政治變遷的全國性政治分歧的影響。在政治分歧立場上的差異，使得國、民兩黨的選民與政治人物發展出不同的「政黨認同連結」強度，這足以說明政黨與分歧競爭的效果

---

<sup>35</sup> 訪談 YD14。

的確存在。然而，台灣當前以族群意識與國族認同為基礎的政治分歧，不僅是一種以情感連結為基礎的政治分歧，其特質更切割了社會中的其他分歧，妨礙了在政治上形成具體分配性政策的可能。在這個因素影響下，民進黨難以產出足以取代特殊利益分配模式的具體分配政策。而地方政治人物在面對選民的利益需求時，也無從發展出替代的分配模式，只能依循過去的分配模式，尋求滿足個別選民利益需求的公共資源。因此，當民進黨的蘇治芬當選縣長之後，也必須面對資源分配上的困境。這是因為國、民兩黨的政治人物，以及游離的政治菁英都不斷地索求能夠對選民進行分配的資源。在這樣的情況下，不僅可能會在政治人物之間形成侍從主義的連結，更難以形成有效的課責機制來對政治人物與公共政策進行課責。這個結果，讓民主治理的成果充滿了不確定性。

## 貳、台灣的族群認同政治：比較的觀點與可能的發展

而對於本文討論的核心變項—「政治分歧的特質」來說，族群政治與侍從主義的關係是一個廣受比較政治的文獻討論的主題。然而，討論的主題往往偏重於族群的外在「容易辨識」的特性是否導致侍從主義容易循族群差異建立（Kitschelt & Wilkinson, *ibid.*），或是族群認同的明確特性導致政治菁英對同族選民的分配較容易克服民主政治中資訊不對等的障礙（Chandra, 2007）。然而，這些強調族群之間差異特質的論述，並不適用於台灣的政治背景。吳乃德（2002）的研究發現，台灣的的政治分歧雖然源自於族群分歧，但並非建立在族群間在經濟、社會網絡，甚至種族外觀的差異與分歧之上。因此我們無法簡單地應用國外的研究成果，以族群外部的差異特質來說明台灣族群政治的特性，特別是難以理解國民黨的支持者多數仍然是閩南人，而民進黨內部也仍有外省籍菁英和許多外省籍支持者的政治現象。

吳乃德認為，台灣當前的政治分歧並非建立在社會的隔離與歧異，而是建立在對於兩岸關係與政治信任上。然而，這個政治上的「信任感」在切割了其他社會分歧，而無法形成實質分配政策下，也就成為情感與信念上的支持與否的問題。因此，儘管如同王甫昌（2008）的研究所認為的，台灣的族群政治具有民主政治下，追求各個群體之間平等發展的政治意義。然而，當族群認同分歧妨礙其他分歧時，群體平等的理念也難以擴展到實質的政策上。甚至，由於政治人物無法取代侍從主義下既有的特殊利益分配模式，因此可能也必須延續侍從主義的政治模式。本文在雲林縣的研究，或許也能對目前的族群政治研究，提供另一個思考方向。

然而，如上所提到的，台灣族群政治分歧的特殊性在於族群的認同涉及到了兩岸關係的發展與國家內部的政治信任。但是，當兩岸關係在區域經貿整合下走向越來越緊密的經濟依賴時，外交政策與政治信任的分歧很可能因此逐漸和經濟與分配政策結合。在 2008 年政黨二次輪替之後，民進黨一方面針對國民黨的兩岸經貿政策進行攻擊，另一方面也更加重視國內分配的問題。陳明通（2010）的研究就發現，民進黨在蔡英文擔任主席之後，在階級議題上的廣告與發言有極為顯著的增加。然而，族群認同與階級分歧之間是否能在兩岸經濟問題之下連結，而形成一個在主要政黨間具有區辨特性的議題（*position issue*）呢？而這樣的發展是否又能夠取代地方侍從主義的影響呢？這或許是在本文這個研究題目的關懷下，值得繼續關注的另一個後續問題。



## 參考文獻

### 壹、中文部分

- 丁仁方，1999，〈統合、半侍從與台灣地方派系的轉型〉，《政治科學論叢》，10: 59-82。
- 丁彥致，1994，《臺灣地區選舉與地方派系之研究：一九八一到一九九二年雲林縣之個案研究》，台北市：國立政治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碩士論文。
- 王宏忠，2010，〈政黨議題立場、選民認知以及政治極化之研究（1994-2008）〉，「2010 台灣政治學年會暨「重新思考國家：五都之後，百年前夕！」學術研討會」論文，台北市：東吳大學外雙溪校區。
- 王甫昌，2008，〈族群政治議題在台灣民主化轉型中的角色〉，《臺灣民主季刊》，5(2): 89-140。
- 王良新，2005，《雲林縣地方派系之變遷 1996~2006》，嘉義縣：國立中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王良新，2006，〈簽到不出席 議會流會 府會鬧僵〉，《聯合報》，5月23日，版 C2。
- 王良新，2009，〈雲縣長登廣告 議長批扭曲〉，《聯合報》，5月6日，版 B2。
- 王金壽，2004，〈瓦解中的地方派系：以屏東為例〉，《台灣社會學》，7: 177-207。
- 王金壽，2007，〈政治市場開放與地方派系的瓦解〉，《選舉研究》，14(2): 25-51。
- 王振寰，1996，《誰統治臺灣?: 轉型中的國家機器與權力結構》，臺北市：巨流。

王業立、蔡春木，2004，〈從對立到共治：台中縣地方派系之轉變〉，《政治科學論叢》，21: 189-216。

田弘茂，1989，《大轉型：中華民國的政治和社會變遷》，台北市：時報。

朱雲漢，1992，〈寡佔經濟與威權政治體制〉，蕭新煌（編），《解剖台灣經濟：威權體制下的壟斷與剝削》，頁 139-160。

吳乃德，2002，〈認同衝突和政治信任：現階段台灣族群政治的核心難題〉，《台灣社會學》，4: 75-118。

林政忠，2008，〈雲林縣長選舉蘇治芬拒交棒 李應元好尷尬〉，《聯合報》，9月22日，版 A4。

洪永泰，1996，〈抽樣調查中樣本代表性的問題〉，《調查研究》，1: 7-37。

若林正丈，2009，《台灣分裂國家與民主化》，台北市：新自然主義股份有限公司。

段鴻裕，2009，〈張榮味家族 年底苦戰〉，《聯合報》，9月27日，版 A2。

段鴻裕，2010a，〈蘇金煌 沈宗隆 今對壘〉，《聯合報》，3月1日，版 B1。

段鴻裕，2010b，〈張系勝出 未來政局受矚目〉，《聯合報》，5月16日，版 B1。

段鴻裕，2010c，〈雲縣焚化廠貸款 議員預演杯葛〉，《聯合報》，4月1日，版 B2。

段鴻裕、蔡維斌，2008，〈涉工程弊案 雲林縣長蘇治芬被拘提〉，《聯合晚報》，11月4日，版 A11。

段鴻裕、蔡維斌，2010，〈雲水利會選舉 蘇張3度對決〉，《聯合報》，5月11日，版 B2。

唐孝民，2009，〈國民黨 擺得脫派系糾葛？〉，《聯合晚報》，7月17日，版A5。

高永光，2001，〈“城鄉差距”與“地方派系影響力”之研究—1998年台北縣縣議員與鄉鎮市長選舉的個案分析〉，《選舉研究》，7(1): 53-85。

盛杏媛，2000，〈政黨或選區？立法委員的代表取向與行為〉，《選舉研究》，7(2): 31-70。

盛杏媛，2008a，〈政黨的國會領導與凝聚力—2000年政黨輪替前後的觀察〉，《臺灣民主季刊》，5(4): 1-46。

盛杏媛，2008b，〈台灣選民政黨偏好的持續與變遷：定群追蹤資料的應用〉，「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計畫學術研討會」論文，台北市：國立台灣大學。

盛杏媛、鄭夙芬，2009，〈台灣民眾的藍綠認同與紅衫軍運動的參與：一個框架結盟的解釋〉，張福建（編），《公民與政治行動：實證與規範之間的對話》，臺北市：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頁131-181。

陳明通，2001，《派系政治與臺灣政治變遷》，臺北市：新自然主義。

陳明通，2010，〈五都選舉與民進黨轉型——一項社會分歧動員的觀察〉，「2010台灣政治學年會暨「重新思考國家：五都之後，百年前夕！」學術研討會」論文，台北市：東吳大學外雙溪校區。

陳信利，2010a，〈批蘇治芬操控黨團 民進黨鬧內訌〉，《聯合報》，4月9日，版B2。

陳信利，2010b，〈雲林水利會長選舉 兩強相爭〉，《聯合報》，4月10日，版B2。

- 陳信利，2010c，〈蘇治芬 退席抗議誠信盟：逃避監督〉，《聯合報》，11月24日，版 B2。
- 陳陸輝，2000，〈台灣選民政黨認同的持續與變遷〉，《選舉研究》，7(2): 109-141。
- 陳嘉宏、曾慧蘋、許素惠，2009，〈張派保留元氣 徐圖東山再起〉，《中國時報》，9月29日，版 A4。
- 黑白集，2009，〈張麗善退選〉，《聯合報》，9月29日，版 A2。
- 黃國樑、王良新、段鴻裕，2003，〈張榮味喊話：雲林要贏 5 萬票〉，《聯合晚報》，12月28日，版 4。
- 黃德福，1992，《民主進步黨與台灣地區政治民主化》，台北：時英出版社。
- 黃德福，1994，〈政黨競爭與政治民主化：台灣地區政黨體系的新挑戰〉，《選舉研究》，1(2): 199-220。
- 程斐詩，2010，〈好央甲團隊超夯！ 劉建國：好央甲是台語發音〉，《NOWnews》，6月10日，  
<http://www.nownews.com/2010/06/10/11470-2613595.htm#ixzz1HogIuqKe>
- 趙永茂，2002，《台灣地方政治的變遷與特質》，台北市：翰蘆出版社。
- 魯永明，2005a，〈雲縣張派 選戰關鍵 藍綠拉攏〉，《聯合報》，10月3日，版 C2。
- 魯永明，2005b，〈張榮味交保 議會龍頭之爭浮出檯面〉，《聯合報》，12月31日，版 C2。
- 蔡佳泓、王鼎銘及林超琦，2008，〈選制變遷對政黨體系之影響評估：變異量結構模型之探討〉，黃紀、游清鑫（編），《如何評估選制變遷：方法論的探討》，台北市：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頁 197-222。

- 蔡佳泓、徐永明及黃綉庭，2007，〈兩極化政治：解釋台灣 2004 總統大選〉，  
《選舉研究》，14(1): 1-31。
- 蔡維斌、李鈺銅，2008，〈立委賄選案 劉建國提當選無效之訴〉，《聯合報》，  
2月26日，版C2。
- 鄭夙芬，2009，〈族群、認同與總統選舉投票抉擇〉，《選舉研究》，16(2): 23-49。
- 鄭旭凱，2009，〈藍大綠小 雲林政治版圖首度扭轉〉，《自由時報(電子報)》，  
12月6日。
- 鄭東來，2009，《雲林縣政黨與派系之變遷(1981年~2009年)》，嘉義縣：國立  
中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蕭怡靖、黃紀，2010，〈政治課責與投票抉擇：2009年雲林縣長及鄉鎮市長選  
舉之分析〉，「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 2010 國際學術研討會：基層選舉  
與基層治理」論文，台北市：國立政治大學。
- 蘇俊豪，2004，《雲林縣地方派系變遷及其與選舉關係之研究》，台北市：銘傳  
大學 公共事務學系碩士論文。

## 貳、西文部分

- Batto, N.F. 2009. "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the Personal Vote after Electoral Reform  
in Taiwan." *Issues & Studies*. 45(2): 99-123.
- Bosco, J. 1994. "Faction versus Ideology: Mobilization Strategies in Taiwan's  
Elections." *The China Quarterly*.(137): 28-62.
- Campbell, A. 1980. *The American voter*. Chicago, [Il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Carey, J.M. and Shugart, M.S. 1995. "Incentives to cultivate a personal vote: A rank ordering of electoral formulas." *Electoral Studies*. 14(4): 417-439
- Chandra, K. 2007. "Counting Heads: A Theory of Voter and Elite Behaviour in Patronage-Democracies." In *Patrons, Clients and Policies*, ed. H. Kitschelt and S. Wilkins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84-109.
- Dalton, R.J. and Weldon, S. 2007. "Partisanship and Party System Institutionalization" *Party Politics* 13(2): 179-196.
- Grofman, B.N., et al. 1999. "Introduction." In *Elections in Japan, Korea, and Taiwan under the Single Non-Transferable Vote: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an Embedded Institution*, ed. B.N. Grofman, et al..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22.
- Hagopian, F., Gervasoni, C., and Moraes, J.A. 2009. "From Patronage to Program: The Emergence of Party-Oriented Legislators in Brazil"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42(3): 360-381.
- Horowitz, D.L. 1985. *Ethnic Groups in Conflic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Hsieh, J.F.-S. 2009. "The Origins and Consequences of Electoral Reform in Taiwan." *Issues & Studies*. 45(2): 1-22.
- Hu, F. and Chu, Y.-H. 1991. "Electoral Competition and Political Democratization in Taiwan." In *Democratization in Taiwan*, ed. T.-j. Cheng and S. Haggard. Boulder: Lynne Rienner.
- Kitschelt, H. 2000. "Linkages between Citizens and Politicians in Democratic Politie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33(6-7): 845-879.

- Kitschelt, H. 2007. "Party System."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Politics*, ed. C. Boix and S. Stok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522-554.
- Kitschelt, H., et al. 2010. *Latin American party system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Kitschelt, H. and Wilkinson, S. 2007. "Citizen-Politician Linkages: an introduction." In *Patrons, clients, and policies : patterns of democratic accountability and political competition*, ed. H. Kitschelt and S. Wilkins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49.
- Landé, C.H. 1977. "Introduction: The Dynamic Basis of Clientelism." In *Friends, followers, and factions : a reader in political clientelism*, ed. S.W. Schmid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xiii-xxxvi.
- Lin, J.-w. 2006. "The Politics of Reform in Japan and Taiwan." *Journal of Democracy*. 17(2): 118-131.
- Mainwaring, S. and Scully, T.R. 1995. "Introduction: Party Systems in Latin America." In *Building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Party Systems in Latin America*, ed. S.M.a.T.R. Scull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34.
- Mainwaring, S. and Scully, T.R. 2008. "Latin America: Eight Lessons for Governance." *Journal of Democracy* 19(3): 113-127.
- Rigger, S. 2001. *Taiwan's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 from opposition to power*.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 Schattschneider, E.E. 1960. *The semisovereign people*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Stokes, D.E. 1992. "Valence Politics." In *Electoral Politics*, ed. D. Kavanagh. Oxford: Clarendon Press.

Wu, N.-T. 1987. *The politics of a regime patronage system: Mobilization and control within an authoritarian regime*. Ph.D. dissertati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olitical Science Department.

Yang, D.D. 2007. "Classing Ethnicity: Class, Ethnicity, and the Mass Politics of Taiwan's Democratic Transition." *World Politics*. 59: 503–38.

Zaller, J. 1992. *The nature and origins of mass opin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附錄一 TEDS 縣長選舉調查政黨偏好題組

### 一、TEDS 2005M 政黨偏好題組

題目編號	題目	Code
L1	目前國內有幾個主要政黨，包括國民黨、民進黨、親民黨、新黨、建國黨，以及台灣團結聯盟，請問您是否偏向哪一個政黨？	01 有 02 沒有 90 訪員漏問 95 拒答 98 不知道
L1a	那相對來說，請問您有沒有稍微偏向哪一個政黨？	01 有 02 沒有 90 訪員漏問 95 拒答 98 不知道 99 跳答
L1b	請問是哪一個政黨？	01 國民黨 02 民進黨 03 新黨 04 親民黨 05 建國黨 06 台灣團結聯盟 90 訪員漏問 95 拒答 98 不知道 99 跳答
L1c	請問，您偏向這個政黨的程度是很強，普通，還是有一點？	01 很強

		02 普通 03 有一點 90 訪員漏問 95 拒答 96 看情形 97 無意見 98 不知道 99 跳答
--	--	--

二、TEDS 2009M 政黨偏好題組：

題目編號	題目	Code
P1	目前國內有幾個主要政黨，包括國民黨、民進黨、親民黨、新黨，以及台聯，請問您是否（台語：咁有）偏向哪一個政黨？	01 有 02 沒有 90 訪員漏問 95 拒答 98 不知道
P1a	那相對來說（台語：那安捏比較起來），請問您有沒有稍微偏向哪一個政黨？	01 有 02 沒有 90 訪員漏問 95 拒答 98 不知道 99 跳答
P1b	請問是哪一個政黨？	01 國民黨 02 民進黨 03 新黨 04 親民黨 05 台聯

		<p>07 泛綠</p> <p>08 泛藍</p> <p>90 訪員漏問</p> <p>95 拒答</p> <p>98 不知道</p> <p>99 跳題</p>
P1c	<p>請問，您偏向這個政黨的程度是很強，普通，還是有一點？</p>	<p>01 很強</p> <p>02 普通</p> <p>03 有一點</p> <p>90 訪員漏問</p> <p>95 拒答</p> <p>96 看情形</p> <p>97 無意見</p> <p>98 不知道</p> <p>99 跳題</p>



## 附錄二 TEDS 縣長選舉面訪調查投票選擇題組

### 一、2009M 投票選擇題組


題目編號	題目	Code
F2a	請問縣長您是投給誰？	01 蘇治芬 02 吳威志 90 訪員漏問 91 忘記了 93 未領票 94 投廢票 95 拒答 98 不知道 99 跳題
F2b	那請問您記得是投給哪一黨的候選人？	01 國民黨 02 民進黨 90 訪員漏問 91 忘記了 95 拒答 98 不知道 99 跳題
F4c	請問上一次2005 年的縣長選舉，您投給哪一位候選人？	01 林佳瑜 02 許舒博 03 蘇治芬 90 訪員漏問 91 忘記了 92 無投票權

		<p>93 沒有去投</p> <p>94 投廢票</p> <p>95 拒答</p> <p>98 不知道</p>
F4d	<p>在2008年一月的立委選舉中，每個選民可以投兩張票，一張投給選區候選人，另一張投給政黨，請問：在選區候選人的那一票，請問您投給哪一黨的候選人？</p>	<p>01 國民黨</p> <p>02 民進黨</p> <p>03 無黨籍</p> <p>06 台聯</p> <p>90 訪員漏問</p> <p>91 忘記了</p> <p>92 無投票權</p> <p>93 沒有去投</p> <p>94 投廢票</p> <p>95 拒答</p>
F4f	<p>請問2008年三月的總統選舉，您是投給哪一組候選人？</p>	<p>01 謝長廷、蘇貞昌</p> <p>02 馬英九、蕭萬長</p> <p>90 訪員漏問</p> <p>91 忘記了</p> <p>92 無投票權</p> <p>93 沒有去投</p> <p>94 投廢票</p> <p>95 拒答</p>
F4g	<p>請問2009年九月份舉行的雲林縣第二選區立委補選，您是投給哪一位候選人？【雲林縣第一選區跳題；斗六市、斗南鎮、大埤鄉、荊桐鄉、西螺鎮、古坑鄉需問此題】</p>	<p>01 張輝元</p> <p>02 張良輝</p> <p>03 劉建國</p> <p>90 訪員漏問</p> <p>91 忘記了</p>

		92 無投票權 93 沒有去投 94 投廢票 95 拒答
--	--	---------------------------------------

二、TEDS 2009L\_BE&M-T 年投票選擇題組

題目編號	題目	Code
8a	請問縣長您是投給誰？	1 蘇治芬 2 吳威志 91 忘了 93 沒有投 94 投廢票 95 拒答
12	請問上屆（2005 年12 月）的縣長選舉，您把票投給哪一位候選人？	1 林佳瑜 2 蘇治芬 3 許舒博 89 當時戶籍不在此 91 忘了 93 沒有投 94 投廢票 92 無投票權 95 拒答
13	請問今（2009）年九月份舉行的雲林縣第二選區立委補選，您是投給哪一位候選人？	1 張輝元 2 張艮輝 3 劉建國 89 當時戶籍不在此 91 忘了

		<p>93 沒有投</p> <p>94 投廢票</p> <p>92 無投票權</p> <p>95 拒答</p> <p>99 跳題</p>
14a	<p>請問去年（2008 年）一月的立法委員選舉，您把票投給哪一位候選人？</p> 	<p>1 國民黨（張嘉郡、張碩文）</p> <p>2 民進黨（陳憲中、劉建國）</p> <p>3 無黨籍（蔡桓生、尹伶瑛）</p> <p>4 綠黨（黃山谷，一選區）</p> <p>5 制憲聯盟（黃國華，二選區）</p> <p>6 大道慈悲濟世黨（張昆煌，二選區）</p> <p>7 第三社會黨（廖珪如，二選區）</p> <p>89 當時戶籍不在此</p> <p>91 忘了</p> <p>93 沒有投</p> <p>94 投廢票</p> <p>92 無投票權</p> <p>95 拒答</p>
15	<p>請問去年（2008 年）三月的總統選舉，您把票投給哪一組候選人？</p>	<p>1 謝長廷與蘇貞昌</p> <p>2 馬英九與蕭萬長</p> <p>91 忘了</p> <p>93 沒有投</p> <p>94 投廢票</p>

		92 無投票權 95 拒答
--	--	------------------

